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编者按：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 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 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 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 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 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 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 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 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 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访组：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 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 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也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 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 县文安驿镇）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 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

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 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 个，其中四个女知青，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 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 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 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 生有两个

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 村里。

四十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 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 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 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九个人，在村子的 前面；二队六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 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 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 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 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 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米访组：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的社 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 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 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 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 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 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 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 机都没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 拉话(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 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 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 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 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 我带过来的。”我恍

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 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 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 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 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 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 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 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 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 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 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 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 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 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 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 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 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 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 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 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 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 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 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 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 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 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 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 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 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 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 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 "黑子"。1970年9月的

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 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 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 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 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 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 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 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 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 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 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我们还聊 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 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 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 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在干农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的。比如怎么锄地， 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 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

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 劳动吧？

王宪平：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 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 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 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 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 (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 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 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 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 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 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 紧密起来，这

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 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 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 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 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

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坐 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 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 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 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 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 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 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 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 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 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 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 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 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 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 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 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 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 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 的子弟，想到部队当

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 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 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 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 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 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 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 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 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 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 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 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 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 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 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 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 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 “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 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 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 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 ”我说“嘿， 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 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 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 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 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一一读 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 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 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 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

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 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村来说，“地、富、 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 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 一一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 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 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 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 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 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 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 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 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 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 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 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

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 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 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 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 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 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 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 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 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 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 正沟一一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 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 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 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坝 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 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 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 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 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 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 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 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 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 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 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 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 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 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 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 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的很

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 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 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 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 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 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 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 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 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 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 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 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 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 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 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 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帮忙，村 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 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 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 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 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 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 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 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 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 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 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 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 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

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 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 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 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 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 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未完待续）

“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 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 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 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米访组：我们去看了淤地坝，感受了当年造地的不容易，您 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事情呢？

王宪平：要说印象深刻，不能不说近平带领村里人办沼气和 修路这些事。

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面貌， 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 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 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

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后就建沼气池。 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 很大，大家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们这 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不久之后，办沼气在我们周边就普及开了，全县大多数村 都开始向梁

家河学习。陕西省的沼气现场会议，也是在我们村召 开的。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气的同时修建的。 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 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 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好处。

这些事说明，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往往会带 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 间，都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让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 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 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

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 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辉，经常跑 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 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辉这样 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 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 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 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最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 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 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 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 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 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 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 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也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 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 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 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 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 他每次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情况。此外，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

王宪平：近平离开村里，上大学走了以后，还一直惦记 着梁家河的乡亲们。除了和村里通信联系以外，他还回来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工作虽 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 户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跟他 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 是阴历八月，有人就说："哎呀，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 的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

村里人在他来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他，早早就开始张 罗做饭，还杀了两只羊。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他，他跟乡亲们 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 亲热。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 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七十年 代初，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 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 了一遍，走了几里地的路。

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满满一大碗羊 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 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石春阳说： "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 吃光了。我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哎，可 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笑了起来。

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个北京知青联 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 年的知青都联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就是 不知道都在哪个单

位。”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 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 了。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英国工作，没 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事，没来成。

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他打电话说：“近 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 了，打算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

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回来，但是实 在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说:“黑子来了，你先替我掏3000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几天， 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 好好招待他，不要让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 拿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你的钱。”

2009年11月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 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 紧，还有市、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就没 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 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个晚饭、叙叙旧。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动。 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 友，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 还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开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说：“黑子！你比上 次见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说：“是啊，我是胖了，咱现在生活水平都 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

近平说：“前些年听说你身体总闹毛病，现在好了没有？” 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又是高血压性心 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

越好了，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近平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岗位吗？”

我说：“2003年我就离岗了，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之 后一直在家养病。”

近平说：“你现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我没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退休的老职 工很关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够了。”

近平点点头，说：“你家里人还好吗？孩子结婚了没有， 有工作吗？”

我说：“家里都很好，我现在住在县城，孩子们都成家了， 也都有工作，只有儿媳妇还没有工作。不过生活各方面都挺好 的。”

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他 说：“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 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 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我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 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 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近平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后，近平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工作了几十年， 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 河多出点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

我说：“近平，你放心，我会的。之前村里的同志经常和 我联系、交流，遇事共商，今后会做得更好的。”

席间，我们聊到陕西的方言和饮食，近平就问陪同的陕 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乐际同志，你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 东西？”

赵乐际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 馒头，是延川县的土话。”

他又转过来问我："黑子，咱们梁家河现在能吃上'酶酶'

了吧？"

我说："现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这 些细粮，偶尔吃些粗粮。"

近平又问："'团子'（"团子"在延川当地特指一种在贫 困时期用谷子皮、玉米皮掺到玉米面里做成的充饥食物)现在还 吃不吃了？"

我说："早就不吃了。"

他问："那现在种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说："少部分当粮食，大部分做饲料了。"

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咐我说："黑子， 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 代我向村里人问好。"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转告你对村里人的关心，你也要 保重身体，也替我向你母亲及家人问好。"

近平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 看望乡亲们，那时您也在场，请您讲一讲那天的情形。

王宪平：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来，距离他1993年回 来，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 来，只是说："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 管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

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字，村里人反而 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 就都涌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

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近平， 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媛老师。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 就有人喊："真是

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

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去，把近平给围 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 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大家都很激动，这时候，近平身边的随行 人员过来“解围”了，他们说：“乡亲们，大家让一让!你们的心 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总书记挤在外面进不去吧！ ”大家一听 是这么回事，于是挤在门口的村民就闪开了一条路，大家簇拥着 近平走进院子里。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见了面，还 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 次回来，能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联系的 人，就是那些四十多年没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 名、小名也都能叫出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 么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媛、石春阳、吕侯生、张 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几个人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 平给彭丽媛老师介绍了我们五个人。彭丽媛老师也跟我们一一问 好。

梁玉明提议说：“近平，今天你回家来了，喝两杯酒吧！”

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的！快过年了，我 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 每人倒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菜”。近平给彭 丽媛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 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说：“这些菜，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了，平时我们就经常 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 东西，而且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炖的，味道比现在可差远了。”

大家都感叹说：“是啊，那个时候，吃‘团子’能填饱肚 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问石春阳“随娃，村里现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吗？”

石春阳说："有四百一十人，快过年了，大家都在家。"

近平又问："村里养殖的情况怎么样?还种地吗？现在吃水 的情况怎么样?水质如何？"

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鸡的都有，但是 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不种地了，就河条地和坝地种一些 玉米。现在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大口井还在用，现在 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 水很好，各项指标都合格。"

近平又问："现在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怎么样？大米，肉类， 能经常吃上吗？"

大家说："老人们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没问题，吃的都

挺好。"

近平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那时我在梁家河插队七 年，只吃过一次大米饭，是乡亲送给我的，那碗米饭真是香啊！"我说："是李印堂家给你送的。你跟我提起过，说那碗大 米饭有多香。"

近平说："对，对，就是印堂妈送给我的。"

席间，近平问张卫庞："你去过北京吗？"

张卫庞说："我去过，去年就去了一次北京。"

彭丽媛老师问："你们都去过厦门、福州吗？"

梁玉明、石春阳和吕侯生都说"去过"。

梁玉明还对彭丽媛老师说："有一次，我带儿子去厦门， 到你家里，还是你亲自给我们做的饭。"

彭丽媛老师说："噢，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来了。黑子， 你没有来过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哪里也没有去过。"

近平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转转，看看外面 的发展，开阔眼界。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了，离得也远，但咱们也 要经常联系，你们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他还说："我看，咱梁家河的干部年龄偏老化，这样不行 啊。像张卫庞，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当队长，咱们要重视培养年轻 的村干部。"

午餐快结束的时候，我给近平敬酒说："近平，请你放心， 全村的乡亲一定尽快发展产业，大家伙儿都更加富裕起来，给你 争光添彩。"

近平对大家说"黑子说得很好，希望全村都过上好日子。 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就放心了。"

采访组：最后请您谈一谈，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那七年 对他有什么影响？

王宪平：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特别是知青生活 对他性格的磨练，对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这些与他后来在 各级领导岗位上所做出的成绩，肯定是有重要联系的。

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偶然性，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命 运"。但是，人内在的意志力，人对精神世界的积极追求，又蕴 含着很大的必然性。我们讲一个杰出的人物甚至一个伟大的人 物，应该重点讲他的成长过程，讲他遇到的困境，讲他付出的努 力，看看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只有过程才能真正给人启迪， 给人感悟。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 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从走上社会之初就 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由此培养了他一 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 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 心里一一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 东西。

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你能积极地面 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 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者国家干部，都能为人 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 理想，恰恰不

是当多大的官，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实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 话：“当年我离开梁家河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将来我有 机会从政，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当时我听到这 句话，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掉 下来。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 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 点，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 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梁家 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 上，还是和四十年前一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平去上大学的 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说：“当年我人离开了梁家河，但是我的心一直留在 这里。”其实我所理解的“这里”并不是单指我们梁家河，而是 指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每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兴能通过你们的采访来回忆一下四十多年前的往 事。我本人就是一个纯粹的老百姓，我从参加工作到离岗，一直 都是一名普通职工，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荡年代，但是对 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 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当年同我 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他产生的潜 移默化的影响。

这其中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融合，是精神上融为一体，是 近平扎根黄土地，成为我们农民兄弟中的一员，由此所形成的与 我们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期望。

近平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人 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实是这样，同样的这条山沟沟，我 们村里人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七年以后，我们又把他从这 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山沟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 七年。

2002年5月，我听说习仲勋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各方 面的条件有限，我就到县上的邮局给近平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哀 悼。几天后，近平给

我回了话："电报收到了，非常感谢！ "要知 道，在近平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仲 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 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并 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 的身份，都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

事，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气.....干就是七年!村里的人都

说："真没想到近平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真没想到国务院副 总理的儿子能给咱建沼气池、打淤地坝！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 了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是受苦受难的七年，是 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七年。在这七年里，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 付出诠释了他说的那句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上）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 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 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 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 退休。

采访组：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 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 北去的原因。

戴明：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 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 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 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 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 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 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 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 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 不上山劳动。"我父亲之所

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 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 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

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 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 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 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 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 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 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 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 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 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 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 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 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 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 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

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 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 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 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 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 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 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 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 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 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 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 都是土，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 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 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 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 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 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覃“啪啦啪啦”

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

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 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 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 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覃、棉帽子都“武装”上 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 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 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 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 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 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 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 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 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 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

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 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 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 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 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 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 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 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 小件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 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

力---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

背在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 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 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 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 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

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o

采访组：你们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顿下来的? 又是如何适应的？

戴明：到了村里，我们十五个知青就分组了，其中九个 知青分到一队，也叫"前队"。近平和我们五个人，分到二队， 也叫"后队"。他们前队有几个女生，都在一起。我们后队六个 男生，没有女的。梁家河的

生产队长就觉得，男女比例不均衡， 人数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们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烦，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 要女的！"

队长说："你们不要女的，谁给你们做饭？"

我们就说："队里给我们派个做饭的嘛！"

队长说："做饭的工分谁给？"

我们就说："你们队里给出工分嘛！"

队长也不跟我们计较，就应下了。就这样，我们后队的 六个"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团支部书记张太平家里。张太平人很 聪明，有文化，而且能说能干，所以村里让他当我们的房东，这 样跟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太 平就住在我们隔壁窑洞。他没事就跑过来跟我们聊天，也给我们 讲团的知识。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面临 生活中实际的困难。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 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 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 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六个人在一个炕上 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 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 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 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 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 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 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 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 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 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

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 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 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 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气转暖之后，我们六个人一起到沟里的 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 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 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 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 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四两 粮票和两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 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 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 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 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 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 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 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 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 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 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

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 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 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 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 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 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 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 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 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 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 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 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 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 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 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

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 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经常煮不熟，是因为柴禾不够烧。打柴对于我 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老乡有时候到山崖边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砍 那种硬邦邦的酸枣刺。老乡能上去，我们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 也对付不了那种到处是刺的灌木。这种柴很好，耐烧，不需要烧 太多就能把一锅饭做熟了。我们只能到山上去搂茅草，一搂就是 一大捧，看着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里，一点火，那火"呼隆隆" 地响，几分钟就烧没了，结果锅还没烧热，茅草已经烧光了。我 们一看，这不行啊，今天没烧的了，做不成饭就要挨饿了，于是 就六个人一起去打柴。结果，我们六个人打来的柴还不够做一顿 饭用的。因为山上确实没有柴，都是那种很细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们不起床了。队长来问我们："为啥都在 这儿躺着不起来？"我们说："我们是饿得起不来炕了。"队长问： "那你们怎么不做饭吃？"我们说："因为没柴烧。"队长说："这 可得想个办法，别把娃饿坏了。"于是他就批准我们去用大队冬 天储存下来的玉米秸，那个很好烧。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 用，我们一没有柴禾了就到那儿抱，解决了烧柴的难题。

在那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陕北很苦，延安更 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

"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下）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 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 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 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任上 退休。

采访组：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 劳动，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您还有哪些记忆？

戴明：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有学农 课程，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是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大部分也 都会用。但到了陕北农村，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我们北京的孩 子就没见过。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镐。 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有一种“老镬”，比普通镬头要宽很 多。劳动力越强的人，用的镬头口越宽，受力面积越大，翻出的 土越多，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

陕北的扁担，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陕北的木材 很少，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了，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 于是，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起到加固的作用。 这样的扁担就更沉。

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但 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使用的时候，人把连枷悠起 来，借着惯性打粮食，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在这里，婆 姨用它来打麦子比较多。她们打麦子时，排成队，动作一致，一 排连枷同时打下来，非常整齐，打谷场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 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 场景呢？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活儿实 际上非常辛苦。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持一致，否则就把一队人的 速度给拖慢了。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 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 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 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 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 光了。老乡很关心

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 不多吧！ "老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垫吧 垫吧。"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 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 "我们面面相 觑，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 你们是狗！ "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够"的 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 乡们一起哄堂大笑。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 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 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 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 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 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 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 儿"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采访组：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戴明：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就是闹洞房。

我们在张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妇了。他家里办喜 事，村里人都来祝贺。当时因为生活贫困，婚礼也没有现在这么 热闹。村里人到张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贺完就都走了。

我们以为热闹就这样过去了呢，结果村里的一个叫"石

头"的小伙子到我们窑洞来，跟我们说："晚上还要闹洞房咧！"

我们就问："咋闹洞房啊？"

石头说："晚上要到他们新房去'听房'听他们夫妻俩 说什么悄悄话。他们被搅得烦了，就要给听房的人好吃的，就这 样闹。"

我们当时合计着，晚上要是不困，我们也去闹一闹洞房， 要是睡着了也就算了。结果，到了晚上，村里人都来闹洞房了， 他们在太平的窑

洞外面抠窗户纸，“呲啦”一下，把窗户纸抠一 个大洞，太平就在窑洞里面喊：“谁呀!谁呀！ ”外面的人们就嘻 嘻哈哈地笑，起哄。我们就住在旁边窑洞，这些闹洞房的吵得我 们睡不着。杨京生就怂恿我们说：“你们也去闹洞房吧!给东西吃 呢！”我们半夜正好肚子饿，一想起有吃的，就有点兴奋了，说:“那得去试试。”结果我们出了自己的窑洞，到隔壁一看，张太 平那个窑洞的窗户纸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张太平没 办法，翻出一个蚊帐来挡住窗户。窑洞里面黑乎乎的，连个煤油 灯都没有。我们在窑洞外面跟着起了一会儿哄，也没要到吃的， 就算是闹过洞房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们刚到梁家河 的时候，生产队跟我们商量：你们对干农活毕竟不熟练，但是无 论干得怎么样，只要努力干了，不看结果，每个人都给你们8分。

当时，村里的婆姨平均给8.5分，我们比婆姨都低，就 不服气，去找队长据理力争：“毕竟我们都是大小伙子，技术虽 然不行，但力气还是有的，比婆姨都低0.5分，实在没法接受！” 队长很好说话，就说：“那好，你们也是8.5分。”

但我们每天实际拿到手的，还只是6.5分。不过，这就 不能怪队长了，只能怪我们自己懒。每天的8.5分里面，早工占 了 2分。但早工的时间实在太早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要上工，那 个时候我们都起不来炕。

但我们还是想挣这两个工分，队长就说：“你们又不出早 工，这两个工分咋能给你们嘛？”

我就说：“你又不叫我们，以后早上你叫我们去上工，我 们要挣工分。”

队长说：“那好，明天就叫你们。”我们在北京上学时， 即使家住得远，早上也就是六点半起床，住得近的，七点起床， 基本上睡眠都够。这一下四点钟起床，我们实在适应不了。当时 是冬天，本来就睡不醒，四点多钟，天还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 还都有呢。

采访组：队长来叫你们上早工了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队长就来叫我们了，他和我们窑洞 隔着一条河沟，要是绕过河沟走过来，路很远，要很长时间。于 是，就站河沟对岸朝我们窑洞喊：

“京生儿一一喔一一”

“戴明儿一一喔一一”陕北的这种地貌，黄土高原，经 流水冲击，河沟纵横交错，所以人们经常隔着一段距离喊话。喊 话的时候，乡亲们会带儿化音，会用高音，又会拉长音，所以显 得嗓音很嘹亮。陕北的信天游，大概就是脱胎于此。而且，他们 在长音后面还会加上一声“喔一一”，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队长喊了一阵子，我们的窑洞里没有反应。当时 我们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会儿，队长又喊：

“近平儿一一喔一一”

“燕生儿 喔--”喊完了，队长站在那儿愣了一会

儿，我们窑洞里还是没反应。队长又喊：

“家宁儿一一喔一一”

“平生儿——喔——”“……”

队长憋足了劲，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挨个儿喊了一遍， 声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强，我正在做梦呢，就被喊醒了。

我睁开眼睛，一片漆黑，我说：“哎呀，什么动静？”近 平也醒了，他说：“好像是队长喊。”我说：“这是叫咱们起床呢？” 王燕生说：“几点了？”

杨京生说：“三点多。”我说：“睡睡睡！不理他！”

我们就继续躺下睡了，队长还在沟对岸扯着嗓子轮流喊 我们的名字，我们就用棉被继续蒙头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时候，我们见到了队长，队长一脸铁青。 我就故意说：“哎！队长，你怎么不喊我们？早工误下了吧！”

队长用沙哑的嗓音气愤地说：“还说没喊你们？我都快喊 岔气了。”

这位队长对我们知青非常好，带我们劳动，教我们生产 技术，也对我

们的生活非常关心，可惜他早已经去世了。后来， 我们这几位知青互相联系，回忆起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时， 也感慨当年我们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 京娃娃的诚恳和宽厚。

还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翻一个大梁，再下一 个沟，到了依洛河村。这个村的知青有十几个，因为男女比例差 不多，就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 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 唱得很好听，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们对唱。可是这些 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就会唱《两只老虎》一一“两只老虎，两 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 这首歌应对。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们，就开玩笑损他们说：“你 们这些土包子!不会唱歌，就会唱《两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们 对歌了！”

那天，我们六个全体出动，就去支援这些男知青了。近 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 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 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于是，她们就拿出真功夫， 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听。这一下，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 “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书就交给依 洛河的男生了，我说：“你们学习一下吧!你们识谱吗？”他们说: “哎呀，这个可是宝贝！我们识谱！识谱！”这本书，我们经常翻， 所以那里面有几首歌我们非常熟。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 了《灯光》《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就这样，一 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采访组：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

戴明：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 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 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 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

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一一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 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 力，也面

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 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 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 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 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 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 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 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 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 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 ”但是，近平不去， 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 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 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 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 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 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 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采访者：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 那段时间，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戴明：人的经历不同，想的东西不同，对人的影响不同， 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给他对 社会、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通过劳动，理解了 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那时，农民的希望和诉求，就是 吃饱肚子。而农民生活的困苦，我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 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很难认 识到农民的生活现实。我在梁家河插队是一年半的时间，而近平 待了七年多时间。农村生产队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 是巨大的，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青下乡，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凭着一腔 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听毛主席的话”。下去 之后就发现，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我们真的 要依靠他们。他们教我们劳动，帮助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如 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就会生活得很艰难。因此，我们在农村 插队期间，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要依靠老乡，要与老 乡好好相处，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否则，在农村插队就 没有价值，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

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别的地方不接纳他，陕北接 纳了他，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在近平插队期间，当地的干部 和老乡们，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 家河的这些年，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 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入党，当村支书，被清华大学 录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 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 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在插队期间，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反过 来看，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书本，我

们的科学文化，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 这对农村面貌的改

变，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 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 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 点，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 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所以， 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村里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动

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 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 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 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 了解了 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 有批判。可以说，他的执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 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

从实践层面说，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 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毕业之后依次在国务院、军队工作了一 段时间，又主动回到基层，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几十 年这样脚踏实地干下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基层群众想什么， 渴望什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需要 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 河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群众需 要什么，群众想要怎么办，干部就要带着大家怎么办。近平当选 党的总书记以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对 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

经过知青岁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以后的日子 稍微过得好一点，都会觉得很知足。

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石春阳（小名：随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 生。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 记。2016年，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采访组：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 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 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石春阳：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 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 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 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 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 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当时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 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 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采访组：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

生活吗?

石春阳：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 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 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 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 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 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 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 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 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 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 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 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 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 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 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 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 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 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

没那么严重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村里人也越来越熟悉了吧?请您谈谈他 平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石春阳：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 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无 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 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 特别是晚上，我们

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 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 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 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 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 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 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 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 8分、9分、10分 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 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 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

石春阳：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 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 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 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 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 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 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 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 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 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 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

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 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当村支书以后都做了 哪些事情？

石春阳：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 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 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 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 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 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 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 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 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 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 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点。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 一趟，一来一回七十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

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 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 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 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 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 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 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 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

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点 办起来了。这

个代销点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 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办铁业社和代销点，起到了方便群 众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政策上允许这种小规模的集体 产业吗？

石春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 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 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 副业，并不那么容易。

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 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 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二十岁，他这个人，心里装 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 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 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 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 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 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点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 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 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 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 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 也不用下地干活。

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 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 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 挣10分工，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 所以，近平办的代销点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 多。

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 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 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 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 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 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 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 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 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 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 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 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 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苕帚往里面扫，费 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 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 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 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 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 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 近平当

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 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 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 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 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 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 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的特点？

石春阳：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 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 他的每一个行动

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 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

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 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 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 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 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 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 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 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 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 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 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 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 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 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 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 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 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 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 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 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 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 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采访组：习近平到北京上大学，为什么把梁家河村党支 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你？当时是怎么交接的？

石春阳：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 能吃苦，办事

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 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 长、支部委员。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 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 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 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 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 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 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 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 不下，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 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 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 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 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 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 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 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 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 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 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 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 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 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 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 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

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 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 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 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 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 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采访组：您当了村支书以后，心理压力大吗？

石春阳：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有近平这个标杆在那里 竖着。我要想保持住这个水平，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 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 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 像没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 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如果粮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 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 真正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 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 进典型。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 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 人交代。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 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 察时都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 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 候能达到零下20°C，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 能冻裂，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

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 沼气池。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 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

我们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 了十几年。到

1987年，我们村通了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石春阳：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 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 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

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 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 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 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 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 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 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 “随娃，你来了！ ”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 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 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 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 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 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 “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 “路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 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

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 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三 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 1点半， 饭还没吃呢。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 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 村里走。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 天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近平问我："随娃，种 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我说："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 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 没什么问题，他就放心了，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 季的土地安全。

近平又问我："咱们山上现在有啥？"我告诉他，这几年， 陆续都栽上了果树，有的开始挂果了。近平很高兴，就说："那 咱们上去看看。"我说："路不太好走。"近平说："没关系，咱们 慢慢上。"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园，问："现在咱们种果树效 益怎么样？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我说："效益还不错，只要有 销路，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近平又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 不高？"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 本，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一千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几年时间 树开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等树越长越大，到了盛果 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咱们这边土 地肥力不够，每年能产六百多斤粮食，也就收入几百块钱。"

近平很关心村里老人的保障，问我："现在梁家河的老年 人每个月都有补助吗？ "我说"有。咱们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一个月一百二十五元；随着年龄增加，补助也会增加。"近平又问 我："合作医疗覆盖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保障吗？"我说："都 有，所有人都在合作医疗保障范围内，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里 人到延川县去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区看病， 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六十。"

那天，我们和近平站在山顶的果园，往四周望去，是一 道道沟和一座座岭，一派黄土高原的冬日景象。近平隔了这么多 年，又回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心里肯定有很多回忆和 感想。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种亲切和高兴。但他在梁家河 只能待那么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抒怀和感慨。他张口说的、问 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收入、医疗、养老……从这 里，我们能看出他的务实和诚恳，看出他心里一直惦念的是什么。

无论近平当年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还是现在是全党的 总书记，他的心一直都在我们老百姓中间。

"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王燕生，1951年生。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 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 窑洞。当年底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1993 年出国留学。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

采访组：王燕生同志，您好!很高兴采访您，请您讲一讲 当时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大背景。

王燕生：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 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 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 指示。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大家熬着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

我是人大附中的，家在农科院。原本我想年底征兵的时 候去参军，但毛主席指示一下来，我考虑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 去当知青。我们那一批知青里面，大部分人去插队都是因为听了 毛主席的指示，可能还有家庭、个人所处的环境等因素。

采访组：您还记得离开北京去插队的情形吗？

王燕生：北京知青是从北京站坐专门的列车走的，来送 行的人特别多。我记得自己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我父母没来，

是我的兄弟姐妹来送我的。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忘记 自己是否哭了，来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 车厢里面是一个个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面坐七八个知青。

那时候坐火车可到不了梁家河，连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 都没有，我们是从河南绕过去的。我记得是在陕西铜川下的火车， 在附近住了下来，住的地方没有床，我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睡 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安，在那里住了一个晚 上。第三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文安驿公社在 公社大院请下乡知青吃了一顿饭，用大笼屉蒸的白馍，还有猪肉 炖菜。知青们围成一圈，蹲在院子里吃。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 子觉得这些饭菜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经历了插队的 艰苦生活，回想起那顿饭来，真是了不

起。当时公社为了招待我 们知青，拿出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东西。

我们知青在文安驿公社大院里吃饭时，很多老百姓都趴 在墙头上看。当地老百姓很淳朴，一听说北京来的知青，都说是“中央来的知青”“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吃完饭以后，开始集 合，念名单，各村来接各村的知青，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被分到了 梁家河。梁家河的人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就给人家递烟。农民 看到我们给的是过滤嘴香烟，都是双手接烟的。当时，我们给的 烟都是牡丹、中华，也有大前门。大前门虽然在北京属于很一般

的烟，但在农村算是非常高档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从文安驿到梁家河的？

王燕生：来接我们的梁家河村民，帮着把大件行李和箱 子放在毛驴背上和平板车上，很快就堆满了。剩下的都是小件行 李，村民们就帮忙拎着。行李堆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棕箱，一位 叫张太平的社员觉得这个箱子比较小，拎着就行了，不用放在平 板车上了。谁知，他拎起来之后就大声说：“这个小箱子看着不 大，咋这么沉啊？ ”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后来才知 道是他的，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书。

就这样，梁家河的社员和我们一起走到了梁家河村。到 村里时，天已经快黑了。

到了梁家河，由于我们知青的灶还没开起来，晚饭就到 各家各户吃派饭。村民家里都点着煤油灯，让我们上炕吃饭。我 吃派饭的那户村民给我做了铪铬面。我吃的时候，在铪铬里发现 了一丁点儿羊肉沫儿。我当时还觉得肉少，后来才知道，农民过 年才能吃这个。

我从村民家里出来，村民说送我回去，我说不用送了， 结果一出门，外面没有路灯，黑咕隆咚的，我两眼一抹黑，还真 找不到我们住的窑洞了。等我找到了窑洞，近平他们吃饭也都回 来了，我们一交流，各家各户的派饭都做得挺好，有高粱面的铪 铬，有馍馍片。

我们六个人要在一铺炕上睡觉，当天晚上分铺位。杨京 生爱干净，离灶台远一点，住在靠窗户的第一个。雷平生的母亲 在延安待过，她告诉雷平生离灶台近的地方暖和，他就睡在离灶 台最近的铺位，结果那个地方太热，把被子都给烤糊了。近平没 有刻意选，就在雷平生旁边

的铺位住。

采访组：当地有的社员说，你们到梁家河之后，拿出面 包来喂狗，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他们有些不理解。您了解具 体情况吗？

王燕生：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可 能随身带一些吃的、用的。有人带了面包，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几 天，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霉了。发霉的面 包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随便 乱跑，跑到我们院里的时候，我们就把发霉的面包拿出来喂狗了。 刚到梁家河时，我们和村民彼此还比较陌生，接触少，互相不了 解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小误会。后来，我们和村民渐渐熟悉 起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误会。

采访组：你们几位知青，初次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生 活，经历了哪些困难?后来是如何适应的？

王燕生：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 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 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 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 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 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 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 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 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 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覃的， 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

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

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 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 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 跳蚤和虱子，窑洞里

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 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 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 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 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 ”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 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采访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们的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 决？

王燕生：我们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一月份 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 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 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 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 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 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

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 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像我，在北京从小就住公寓楼，家里有卫生 间，能洗澡，虽然当时北京的条件也不好，没有热水器，但我家 的楼房，一个星期能供应一次热水，所以每周至少能洗一次澡。 然而到了陕北，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 凉。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那个 井旁边有个跨沟的小桥，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后来发现过 桥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那些年纪大一 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 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 在村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 ”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 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都穿着游泳裤呢！ ”她们都 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 ”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像城 里那种游泳池，她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不在井 边冲凉了。

采访组：你们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弄柴、做饭。 不久，我们知青就得自己做饭了。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 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 本上，以为只要拿

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 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 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 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 烧柴发愁。

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但还要靠自己 劳动，不仅要去拉粮食，回来还要自己加工粮食。我们费很大劲， 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 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 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 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 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 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 粮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玉米，碾一碾 就能吃了；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

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 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 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 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 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 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 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 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 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 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 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 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 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 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 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 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 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 山上挑粪，这

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 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 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 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 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 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 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 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 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 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 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 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 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 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 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 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 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 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 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 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你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平时业余生活 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王燕生：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 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说话。我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 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 没打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 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天，唱《外国民歌200首》， 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

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 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 认认真真、从头

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网络上看 到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我们知 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 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 央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 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 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 新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 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 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 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 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 ”张卫 庞的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 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梁家河了，后来听说， 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 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 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 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 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近平给咱们照的！”

采访组：您觉得插队生活艰苦吗？这段知青岁月，对你们 有什么影响？

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队生活， 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们像 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 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 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们这一拨北京插队知青，八一学校的学生居多，干部 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体到我们几个知青里面，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级别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国务院副总 理。其他人的父母，级别都不是很高。我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司局 级干部，在“文革”时期，我的家庭遭遇的冲击和我在精神方面 遭受的压力就没有近平他家那么大。

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 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

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 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 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 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 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 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 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 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 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 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 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 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 是非常好的 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 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 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 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 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 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 七年。在这七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 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 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砺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 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五关”当中的“思想关”。

采访组：能谈谈您对习近平说的“思想关”的理解吗？

王燕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插队下乡这一代人，亲 身体验过农村艰苦日子，亲眼见过中国最贫困、最原始的生活。

对近平来说，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文革” 期间，父亲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视，被困在陕北穷山沟里， 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 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成为 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这就决 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来返回北京上学，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 却放弃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层、沉至社会实 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 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

能做出的选择。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帮忙安排一个好工作，选择又清 闲又待遇优厚的公职，或者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享受高福 利……做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岂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 的基层呢?近平选择走这条路，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抱负 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一批近平这样的人一一未必 都是领导干部，可能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无论是不平凡 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这个国家， 愿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所以，中国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 快的发展和这么大的进步，而且有这么美好的未来。

“近平真是个好后生”（上）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1973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 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当年11月离开。在 赵家河8个月时间里，习近平不仅负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 整顿、生产队干部配备等行政工作，还和村民一起修梯田、打土 坝、植树造林。他的这些工作，受

到赵家河村民的充分称赞和冯 家坪公社的高度认可。当年的公社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 队当支书，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你们想得美，我们 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 ”社教结束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后的1974年 1月，文安驿公社党委决定不到21岁的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 党支部书记。

这次访谈中7位赵家河村民回忆的当年几则故事，只是 习近平8个月农村社教经历的一点一滴，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志 存高远的青年，如何在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卧薪尝胆，一步一个 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第一站。

“近平教我写名字”

图片赵家河村民：高小梅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当年叫您“铁姑娘”，是为什么？ 高小梅：那时候我们有十四五个女孩子都在那劳动，我 年纪小，个子也小，但劳动起来是最突出的一个。我管做饭和送 饭，手脚最麻利，很快就把所有人的饭都做好，送过来了；干活 的时候，我比男劳力差不了多少；到了春天，给田里送肥，人家 送7担，我也能送7担。近平注意到我了，就叫我“铁姑娘”， 后来叫习惯了，见到我就说：“铁姑娘，你来啦？”他这么一说， 我身边一群女孩子就笑，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

采访组：他也和你们一起劳动吗？

高小梅：是啊，一起劳动啊，近平到我们赵家河来，组 织动员我们全村人到山上去打坝。那时候，寒冬腊月，土都冻得 硬邦邦的，镐刨不动，铁锹铲不动，只能用炮(指开山用的炸药) 打下土块，再用独轮车推走，整平。这活很累，很多社员想在家 “猫冬”（指北方农村冬天农闲时期的休养生息），不想上山去受 苦。近平就给大家鼓劲儿说：“大家加把劲！锅里有了，碗里也有 了；锅里没有，碗里也没有（陕北该语，这隐含的意思是：集体富 裕了，大家也能过上好生活）。”其实，近平都是为了村里人好， 打坝，增加耕地，多种粮食，村里人就有更多的粮食吃，但当时 这种话不能明着说(指当时不能宣扬小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

近平发现，大家每天中午从山里走回家去，做饭，吃饭， 然后再走回山里干活，又累又浪费时间，一个中午来回“赶场”， 忙忙叨叨的，还白

白浪费了一两个小时。这么多人，完全可以中 午好好休息一下，剩下的时间还能多干很多活。

为了节省时间，近平就跟我们商量着定下：每天中午不 回家，留在山上，专门派几个人做饭送过来，吃完饭以后可以休 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干活。

这样一来，我们中午就能在山里休息一会儿，生一堆火， 大家一起烤火，拉拉话。近平当时也都是跟大家坐在一起，穿着 大棉袄，一身黄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但是一说话，就能看出 他不一样了。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国内国外的大事，听的我们可 高兴了。那个时候村里有报纸，大多数人不识字，很少有人看， 但是近平都会看，他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了解得很清楚， 再加上他平时看很多书，懂得很多知识，所以他拉话时说的那些 事，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那时候天很冷，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 零下十多度。饭送来时已经凉了，我们就围着火，把饭烤一烤， 烤热了再吃。有时候也把红薯放在火堆上烤着吃。近平平时吃饭 都细嚼慢咽的，但是这时候就吃得快了，还催促我们："咱都吃 快点啊！要不一会儿饭就凉了。"

吃了饭，我们休息一小会儿，就接着干。等到快收工的 时候，大家都累了，近平还是那么有劲，一直卯足了劲头干。他 还给大家鼓劲说"同志们!加把劲!好好干这一气儿！马上快收工 了。"

我们那时候早上六七点就上山去劳动，一直到晚上才回 来，近平是社教干部，带领我们干活，每天都要管这管那，干的 活儿却跟我们一样多，甚至比我们更下力气。我们村里年纪大一 点的人私下里都称赞他说："近平这娃，别看是大城市来的，真 能吃苦，真厉害！"

采访组：除了和你们一起劳动，他还带你们学习吗？ 高小梅：有啊，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这个夜 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叫"赵家河村 青年夜校试点"。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生

产会是打铃集合，我们是吹哨集合的。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 人，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青年夜校"，都在随娃的窑洞里集 合，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就像现 在的会议桌一样，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每天晚上，点 起煤油灯，近平就给我们讲课。

我是文盲，没念过书，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近平就教 我们认字，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就帮 我们写下来，再一笔一划地教我们自己写。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高 小梅”，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

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却 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可高兴了。年轻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 每天都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识字，还教我们唱歌跳舞。近平那时 候经常说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火车跑得快，全靠 车头带。”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他还常说：“打铁 还要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 己首先要做到。

“近平让我当队长”

图片赵家河村民：武刚文

采访组：武大爷，您的小名也是叫随娃吧？

武刚文：是的！

采访组：您当时在赵家河是队长吧？

武刚文：我在赵家河最早是当基建队队长，主要是管那 些修梯田、打坝的事情。当了三年之后，村里又派我当生产队的 队长。当队长期间，我也没忘了基建队的活儿，除了生产，我还 领着社员在山上打坝开荒，这样我们队的粮食能多打些，我们还 能年年领先别的队。可是因为这个，我却惹下了麻烦。

采访组：什么麻烦？

武刚文：有一天，县委书记骑个自行车到我们村来视察， 他翻过一座山，正好看到我们生产队在开荒，他就不让，说我们 生产队不应该干基建队的活儿，而且我们开荒没跟县里请示，是 违规的。我说：“我们为了多种粮食，开荒没啥不对的，为啥不 让？ ”我就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我就赌气不当队长了，反 正当队长受苦受累最多，我也当够了。

从那以后，我就给村里放羊，放了三年。放羊我干得也 挺好，我把队

里的羊教育得非常规矩，不吃庄稼，只吃庄稼下面 的草。那个时候，我上午劳动，下午放羊，放羊之后又去打坝， 每天也很累，但是不当队长，不用操那么多的心，还是挺高兴的。 采访组：那后来您为什么又重新当队长了呢？

武刚文：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 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

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 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 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 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他 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 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最后 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 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三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 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 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 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 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 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 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 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二十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 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 时候不可能都一

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 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 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 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 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 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近平是个外来的知青，不是我们本村的人，还比我小那 么多，还是个娃娃，但我就服他，他说啥我也听。我这个人脾气 倔，县委书记的话我都不听，我都敢跟他吵，但我就听近平的， 因为近平这人处事公道，说话在理，他从不为自己考虑，都是为 大家考虑。

现在我七十多岁了，老了，耳朵也背，眼睛也花了，现 在我还听近平的，近平是国家主席嘛，如果他现在让我当队长， 我还当。

"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

图片赵家河村民：聂瑞兰

采访组：您好，听说习近平到赵家河吃的第一顿饭就是 在您家里，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聂瑞兰：记得，近平到赵家河来，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 饭。他来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赵家河这穷山 沟了，第一顿饭，算是接风，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

当时，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 面我一直没舍得吃，攒起来了。近平来的那天，我就把这些白面 拿出来，擀了面条，给他煮热汤面吃。煮面的时候，我又在锅里 打了个鸡蛋，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我把热汤面煮好，盛 在一个白瓷碗里，给近平端了过去。

近平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 要不然，娃娃站在旁边看，大人看娃娃可怜，给这个分一点，那 个分一点，饭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那顿饭， 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饭很慢，细嚼慢咽的。

近平边吃边说："嫂子，你做的这面条真香！"我说："你 吃着香就好，

多吃一点，吃完再给你盛。”

近平吃完这一碗，我又给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问 他：“吃饱了没有？”

近平说：“吃饱了！”

采访组：接下来他还和您聊了什么吗？

聂瑞兰：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我说什么 也不要，他拗不过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 拿起碗后，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那时候， 这些粮票和三毛钱，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又轮到我家吃派饭(派饭：由大队干 部指派社员家为外来客人做饭，之后由大队分配工分作为报酬） 了，我一边做饭一边跟他拉话。

我说：“近平，咱做派饭挣工分，你不用给粮票和钱嘛！” 近平说：“这我知道。我有，嫂子你就拿上嘛。”

这次我给他做了烩豆面，我特意用好豆面给他做的。近 平吃得可香了。

“可把近平急坏了”

图片赵家河村民：赵福有

采访组：您好，您当年也参与了打坝工作吧?请问您还记 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吗？

赵福有：1973年，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开春的时候， 天还很冷，黄土冻得很结实，还要用炮炸开冻土。谁料，突然有 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时候，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把 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说：“哎呀， 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先放到窑洞的 炕上，让他休息。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让县上派人来接 这位受伤的社员。出去联系的人，先到镇上，再到县里，需要很 长时间。这段时间，近

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我们说:“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摆摆手说：“不用。”

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 回来。近平是又着急，又心疼。

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 长时间，足足有几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坏了。

米访组：后来怎么样了？

赵福有：好在，这个社员及时得到了救治，腿完全治好 了，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后来我们村里人议论这事说：“近平这 娃心眼好呢。”当时，近平是我们村的驻队社教干部，是村里的 领导，但社员受了伤，咱同村的人也没有他那么着急。他把咱群 众的安危放在心上，咱不能忘。

“近平真是个好后生”（下）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近平帮我找猪”

赵家河村民：赵秀全

采访组：请问您记得习近平当年在你们村的一些事情

吗？

赵秀全：近平给我上过课，也在我家吃过饭。不过我记 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是近平帮我找猪。

有一天，我在喂猪之前，先清一清猪圈，就把猪放出来 了，等清完猪圈，那猪在院里待得挺老实，我就松心（陕北方言， 疏忽）了，我想，一会儿我把猪食往圈里一放，它自己就回去了。 结果，这家伙趁机就跑了！

我端着猪食盆子到院里，一看，猪咋没了？急得我呀， 把盆子往地上一搭，跳着脚儿地跑出去找，一边找一边骂：“这 缺德的猪，你要是丢了，这得是多大的损失啊？ ”找了一圈，我 也没看见猪在哪儿，这么大个村子，这么多山，要是猪顺着路跑 到别的地方去，我咋也找不到了。这个祸就算是闯下了。

我正垂头丧气往家里走呢，刚到家门口，我一看，近平 从对面赶着那只猪回来了，那个猪也是垂头丧气的，没跑成嘛， 它心里可能也气。

近平一看见我，就说："你咋不把猪圈好嘛！"

我说："哎呀，我没留神，就让它跑了。近平，你咋找到 的这猪？"

近平说："我一看这猪，就是你喂的那只，就给你赶回来 了。你咋不看好嘛？猪要圈好，可不能让它随便跑。咱们要把自

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可不敢粗心大意！"

我连声答应："是！是！"

虽然近平把我批评了一顿，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一是 他说的在理，我应该接受；二是猪找回来了，我们家也不会受损 失了。

"近平开会时我们不瞌睡"

赵家河村民：赵勋功

采访组：您好，请问习近平到赵家河做社教工作时您印 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赵勋功：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是村里的会计。我对 他的印象可好了，一有时间，总跟他拉话。有时候，近平也在我 家吃饭。

近平来了以后，经常组织我们开会，还办夜校，组织我 们这些年轻人识字，还有唱歌、跳舞，我们都很感兴趣，一听说 近平开会，都赶紧过去。原来我们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我们去 的时候都磨磨蹭蹭，就是到了也不好好听，底下拉话的拉话，纳 鞋底的纳鞋底，瞌睡的瞌睡。但是近平跟我们开会，我们都听得 可认真了。因为啥？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讲路线教育，讲咱 农村的这些事，特别实在，都是跟我们社员密切相关的。除此之 外，他还讲一些国内国外的大事，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讲得特别 有意思。我们很佩服他，对他说："近平，你这个脑瓜子，真是 了不得！"

近平在赵家河一直和我们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也跟 我们吃一样的东西，那时候能吃顿白面馍馍都是很困难的，他轮 流在我们社员家里

吃饭，也没吃到什么好的。近平干活很能吃苦， 和我们干一样的活，比我们还下力气。

他要回梁家河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送他。我们也不想他 走，但他是梁家河的知青，还是要回到梁家河去。当时我们都觉 得，近平是个好后生，都不舍得他走。他在我们赵家河，给我们 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打坝、修梯田、开会、办夜校，教给我 们很多东西，教会很多人写自己的名字……直到今天，村里人还 一直惦记着近平，我们拉话的时候也经常提起他。

“近平帮老汉拉车”

赵家河村民：赵胜利

采访组：赵胜利同志，您好！习近平作为社教干部到赵 家河“蹲点”期间，您和他在工作和生活上接触很多，一起相处 了几个月。请您讲一讲，他到赵家河来工作的起因是什么？

赵胜利：1973年，我们延川县的县团委班子换届，北京 知青陶海粟当选了县团委书记，县团委当时负责安排到各村进行 路线教育的人选。近平当时在梁家河插队，劳动非常积极，生活 上和当地社员相处得非常融洽，群众反映很好，政治上也积极要 求进步，像他这样的优秀知识青年就很适合搞农村的政治宣传。 于是，陶海粟就委派他到我们赵家河来“蹲点”（指驻扎在生产 队主持工作），负责路线教育工作。

我和近平第一次见面就是在1973年的上半年。近平来到 我们赵家河村，大约是三四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柳树刚开始发芽。 近平从县上搭车到了冯家坪公社，再步行走到我们这里。他来的 时候，先是给我们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他说：“同志们好，我 是咱们文安驿公社梁家河的插队知青，我叫习近平。”我们大家 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就这样，近平就成为我们的驻村干部，留 了下来开始工作了。

采访组：你们和他熟悉了以后，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 点？

赵胜利：开始，我们跟他还不太熟，倒是也没觉得哪方 面有什么特别之处。等到相处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就发现近平 这个人有很鲜明的特点。

近平来之前，我们村上开会，搞社教，大家都没什么兴 趣，也懒洋洋地不愿意去。那些政治啊，口号啊，路线啊，斗争

啊，批判啊.....你说那些神仙打架的事，跟我们山高皇帝远的庄

稼人有啥关系嘛？社员们对“社教”都没兴趣，去“受教育”的 时候也东拉西扯，不认真听。两三百人，一乱起来，会就没法开 了。原来的社教干部和村干部经常要维持秩序：“大家好好听啊! 别瞌睡了！别在下面开小会！ ”但是这也没什么用，大家就是提 不起兴趣。

但是，自从近平来了，只要他开会搞社教，大家都准时 去，会上秩序也特别好，大家不仅认真听，还能充分地跟近平交 流。当时，我们队里有个“俏皮话大王”叫任厚成，他说：“近 平讲话，能把人听憨了！（意思是“听傻了，听呆了”，形容人听 的时候投入、忘我的状态）”

采访组：这是为什么呢？

赵胜利：就是因为近平讲话特别实在，特别有意思。他 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说，待人很随和，亲和力很强，而且知识丰 富，记忆力非常好，他和我们社员有很多共同语言。而且，他对 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得都很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 都了解。他搞路线教育，也从来不是枯燥地说教、喊口号，而是 寓教于乐，像拉家常一样和大家交流。而且他说的话题，都是我 们普通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事。

近平给我们讲过，他四五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见到了 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慈祥又亲切，拉着他的手，还抚摸他的头。 当时我们听了，都羡慕得不得了。毛主席、周总理，都是我们崇 敬的伟人，能够跟他们见上一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历。

我们村里的社员，大部分都没出过远门，那时交通不便， 村里人甚至到镇上、县上的次数都不多，更别提了解外面的世界 了。近平就常给我们讲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把我们这个国 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地的风土人情， 简要概括地介绍给大家。

同时，他对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了解也非常广泛。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都有什么大洲，有什么国家，各个国家的 首都是什么.....包括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民族、气候情况、地 理环境.....还包括著名

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他都能说给大家 听。

具体到一些历史事件，近平讲的就更有意思了。有一次， 他给我们社员讲当时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的“水门事件”我们 这些山沟里的农民，对“美帝国主义”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水 门”是啥，完全都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近平就非常耐心细 致地给我们讲，甚至把相关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点、 美国两党之间的“驴象之争”等相关的知识都给我们普及了一遍。 一晚上讲不完，近平就来个“且听下回分解”，第二天晚上接着 给我们讲。还有一次，近平把他看过的一部名叫《三笑》的电影 讲给我们听。这部片子的情节比较复杂，但是他看了以后，却一 直记得非常清楚，把整个故事给我们从头到尾讲出来，讲得又生 动，又有趣。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有的社员手里夹着 一支香烟都忘了吸，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

近平把这些亲身经历、政治常识、国内国际的具体情况、 文化艺术，还有北京的一些新鲜事等有趣的内容，结合他的社教 工作一起讲给大家，这样他的工作开展得就非常顺利。那时候， 我们社员也特别爱听近平给我们“讲课”，跟他拉话，和他交流， 学政治，学文化，学文艺，读书，看报。从中开阔了眼界，学到 了很多的知识。

自从近平来到我们村，我们村就变得特别红火：白天我 们一起劳动，“战天斗地”；晚上开会，聊得热火朝天，大家笑声 不断。散会以后，我和赵志功还会和近平拉话，说说劳动的事， 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制订接下来的生产计划，经常拉到深夜。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作为赵家河的社教干部，除政治教 育工作以外，基建、生产等方面也是他主要负责吗？

赵胜利：是的。作为驻村“蹲点”的社教干部，近平当 时负责的工作一方面是宣传党的政策，做社员的政治教育工作； 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政府下达的任务来安排工作，领导社员生产建

设

你别看当时近平还没有入党，但他已经担负起了村党支 部书记的很多职责，他不单是在青年中间主持团委的工作，而且 党支部的工作他都参与，都安排，都领导，并且都做得很好。这 是很不容易的。

近平来了以后，面对的首先就是基建方面的一个决策。 我们赵家河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神车沟。这个山沟， 我们一部分社员想要打坝，增加土地；另一部分社员反对，认为 打坝不妥。当时对干不干这个工程，大家的意见一直不统一。

近平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立即组织我们村里开会， 探讨这个问题。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有的说："打坝行不通， 一到夏天，山洪如果下来，就把庄稼都淹了。损失怎么办？"有 的说："洪水如果不来，打下的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你要不打 这个坝，等于神车沟年年荒废着，每年都损失几百亩的粮食！" 我和老书记赞成干，很多人不赞成干，大家各说各的理，争执不 下，有人看近平一直听着不说话，就问他："近平，你是什么看 法？你觉得应不应该打这个坝？"近平说："应该打。"

一锤定音，全村社员没有一个人再争执了，第二天，近 平带着我们就开干了。白天大干，晚上夜战，不到三个月，我们 就把神车沟平平整整地填好了，打好了坝，赵家河这一下就增加 了近百亩的土地。而且坝地易于灌溉，是高产地。现在，这块坝 地还在大量种植玉米，每年的产量都很高。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知青林"的故事。

赵胜利：知青林的位置在麻花沟，其实它和神车沟的这 块坝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块坝地打得很好，县团委书记陶海 粟在1974年的春天，组织全县各公社、大队的团委书记到我们 赵家河村来参观学习。当时，团委书记们都是步行来的，一人扛 着一捆县团委统一购买的树苗。上午参观神车沟坝地、开会、学 习。中午吃完饭，大家就都到麻花沟去植树造林，种好树，浇了 水，大家各回各家。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几尺高的小树苗，现在已经 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村里人给这片树林起名叫作知青林。这片 树林就在我们村口的必经之路旁边，我路过那片树林的时候，经 常会在那儿站一会儿，风吹起来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铺天盖 地的，很有气势。那里的景色很美，特别是金秋时节，就像一幅 油画，有人或车辆路过那里的时候，都会多望上几眼。

近平在赵家河的半年多时间里，像政治教育、办扫盲学 习班、农田基本建设、粮食生产、培养基层干部等工作，他都安 排得非常紧凑，非

常有计划性，一件接一件地干，在他回梁家河 之前，也都扎扎实实地完成了。所以，他在赵家河待的这七八个

月时间，看起来非常短暂，但是给我们村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

采访组：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您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 他还有一些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请您回忆一下。

赵胜利：有两件小事。一件事是近平自己修了一个厕所 的事。他住的窑洞外不远处，有个厕所，这个厕所是公用的，住 这排窑洞的人，还有路过的人都会用这个厕所。但是这个厕所非 常小，也非常简陋。当时陕北农村，生活很艰苦，对于上厕所就 更不讲究。挖个坑，周围随便用木头、秸秆、土坯一挡，上面盖 个草棚子，就当厕所了。所以俗称“茅厕”。男人站在里面方便， 有时外面路过的妇女都能看见。

近平来了不久，就动手修了一个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 他把旧的厕所拆掉，重新用砖和石头砌，扩大了面积，又加高了 围墙，一间男厕，一间女厕，都是分开的，宽敞多了，而且隐秘 性比较好。大家一看，这样确实很方便，就纷纷效仿，在他的带 动下，村里的社员们也都纷纷改造自己家的厕所。不久之后，赵 家河的厕所基本都改成了砖石结构的。

还有一件事，是近平帮助一位老汉拉车的事情。有一次， 我和近平一起到冯家坪公社去开会，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位年过 七旬的老人，弓着腰很吃力地拉着架子车。我一看，这位老汉我 认识，他是冯家坪人，名叫冯俊德。我跟冯俊德打了个招呼，接

下来，还没等我说话，近平就走上前对他说：“老大爷，您这么 大年纪，还能拉得动车？ ”冯俊德说：“能成！”近平说：“来， 我帮你拉一段！”冯俊德也确实累了，一看这个年轻小伙来帮他， 就很高兴，说：“好啊，多谢你了。”近平就把车接了过来，拉起 来就走。

我说：“冯大爷，你这车上拉的是什么？”

冯俊德说：“这是我从自留地刚刚采收的旱烟叶，拉回家 烤一烤。”

冯俊德又问近平：“后生，你是哪里的？我之前没见过 你。”近平回答说：“我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在赵家河搞路 线教育，我们现在到

公社去开个会。”冯俊德说：“北京的娃，这 架子车拉得倒好哩。”近平说：“经常干，就熟了。”冯俊德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近平回答：“我叫习近平。”

冯俊德说：“你姓习？这个姓可不多见。我老汉活了七十 多年，就知道一个姓习的，就是我们陕北闹革命的习仲勋。” 近平说：“老大爷，你知道习仲勋？”

冯俊德说：“那咋能不知道嘛！那时候刘志丹、习仲勋在 我们陕北闹革命。刘志丹管军队，是军委主席；习仲勋管政府， 是政府主席。他像你现在这样的年纪，就当上了‘娃娃主席' 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

近平说：“我就是习仲勋的儿子。”冯俊德吃了一惊，喜 得大声说：“哎呀，好后生，原来你就是习仲勋的儿子！”我们三 个一路走，一路拉话，很快就到了冯家坪。冯俊德和近平拉了一 路的话，两个人仿佛成了忘年交，到了冯俊德的家门口了，他请 近平和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喝口水。近平说：“不了，谢谢， 我还要去公社开会呢。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拉话。”

从这以后，冯俊德逢人就讲“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车” 的事情，每次讲起的时候都很兴奋，很自豪，当然还免不了让我

当见证人。他说：“这事，赵家河的赵胜利看见了--习仲勋的

儿子帮我拉过车。领导人教育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近平很喜欢读书学习，也喜欢写东西”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赵华安张春富（曾用名张春福）二人均为北京 市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赵 华安，1953年生，1970年底入伍，退休前在海淀区市政园林局 工作。张春富，1952年生，1971年在延川县永平镇政府参加工 作，2012年退休。

采访组：赵华安、张春富同志，你们是和习近平同一批 到梁家河下乡插队的知青，对当年的情况有不少了解。请讲一讲 当年知青下乡的情

况。

赵华安：知青下乡是毛主席当时一个战略部署。“文革” 时期，很多单位都无法正常工作，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当时城 市青年学生的状况是，毕业生特别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那时 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插 队，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去。

我们与习近平同一批从北京去的梁家河。当时习近平、 雷平生、戴明、王燕生、杨京生被分到二队，他们这个队是“后 队”。我和张春富被分到一队，是“前队”。当时梁家河村子很小， 总共就两个生产队。

张春富：是的。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中有崇高威望，他 老人家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回过头看，知青下乡对广大农村有很多好处：我们知青 给农村带去了新鲜事物，有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文化 知识。另外，知青返城后对插队的地方念念不忘，经常给予一定 的支持和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乡们的生活水平。

下乡对我们知青自身也有很多好处：我们在农村锻炼了 生存能力和认识社会的能力，更加深入理解了国家的现实状况和 最基层农民的生存状态，这对我们的人生有着深刻影响和启迪。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到梁家河，一路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赵华安：我们在北京火车站乘坐知青专列离京。那是一 列绿皮火车，还是那种烧煤的蒸汽机火车头。火车上的知青很多， 车上的知青和站台上送站的亲友们都掉眼泪。

我们坐火车一路到了陕西铜川，在铜川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晨起来，又坐军用卡车往延安去。卡车路上开得很慢， 时速也就40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当时路况不好，车斗里坐了 很多人。到了延安，我们又休息了一个晚上，再坐卡车经过延川 县到了文安驿公社。我们一下车，就看到当地来接我们的老乡。 梁家河来了差不多二十个人，帮助我们背行李，领我们回村。

采访组：从北京大城市到陕北农村生活，你们一定有很 多不适应的地方吧？

赵华安：从首都到农村，生活差异很大，一开始确实很 不适应。窑洞里到处都是虱子、跳蚤、臭虫，我们在炕席下面撒 66粉、敌百虫等一些药粉，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被 咬得全身都起包。

有时候窑洞里面还会进来蝎子、蛇之类的东西。我被蝎 子蜇过一次，小腿肿了好几天，后来还是老乡告诉我一个偏方才 治好了。老乡特别真诚朴实，他们也充满智慧。我们当时有个什 么头痛脑热的，老乡就告诉我们偏方，帮我们治病。我有一次上 火，嗓子又红又肿，都说不出话来了，老乡教我一个偏方，把煮 熟的鸡蛋在水井里冰一夜，第二天吃下去，还真治好了这个病。

采访组：我听别人说起过，有一次习近平晚上去挑水， 回来煮饭吃完之后发现里面有一条蛇？这个事情你们知道吗？

赵华安：具体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但这样的事情在窑洞 里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我们住的窑洞里面有时候会进来蛇，这是 因为当时的窑洞都是土窑，冬暖夏凉，蛇就喜欢往里钻。我记得 有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房东的孩子王新平来叫我们："你们赶 紧来帮个忙，我们家进来一条蛇，就在我们炕上呢！ "我跑上去 一看，好长的一条蛇，有一米五长，还是一条红色的花蛇，正在 他家炕上盘着，蛇头伸在外面，吐着信子，十分吓人。王新平的 家人都吓得躲在了灶台后面。我当时什么也没想，就赶紧拿了一 条被子给蛇给捂住了。我想把它打死算了，省得再跑出来吓人。 王新平的家人说这东西有灵性，不要打死它，还是把它放走吧。 我就冒着大雨拎着蛇走了好久的路，把它扔到了一个沟里头。经 过这一件事情，老乡和我们的感情更亲了。王新平一家人把我当 成自己家人，对我们特别好。那时候农村都很穷，吃不上什么东 西，他们平时有什么吃食都会叫我去。王新平现在还和我们保持 联系，仍然像一家人一样来往。他来北京玩，我都是请他住在家 里。

采访组：请你们讲一讲在梁家河生活和劳动的情况吧。

张春富：我们刚开始吃农村食物，真的很不习惯。当地 人用糠做的糠团子，黑哩吧唧的。一开始，我们觉得挺新鲜，就 想尝一尝，结果吃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吃了。这糠团子非常干，难 以下咽，噎得人吃不下去。当时，国家给我们知青有专门的供应 粮，我们比老乡吃的稍微强一点。

赵华安：在农村插队，我们这些半大小伙子都要自己料 理生活，像缝

补衣服，之前都没干过的活儿，现在都要自己干了。 衣服破了，我们都不怎么会缝，就学着缝，穿针引线，补得歪歪 扭扭，也不在乎好不好看，补上窟窿就行了。我见过近平有一次 缝自己的一件衣服，针脚挺长，不过好歹缝得还挺整齐。

后来，很多知青离开了梁家河，村里就把前队、后队的 知青合在一起，都住在一排知青窑里。文安驿有集市，我记得是 十天有三个集。近平去赶集的时候，从我们窑洞门口路过，就给 我们打招呼，问问谁愿意一起去，就结伴同行。近平不是那种话 很多的人，他性格随和，对人友善，喜欢交朋友。通过接触，我 们也发现他这个人性格直率，说话直截了当，讲什么事情很清晰、 很明确，也非常入情入理。

我们一般去文安驿买牙膏、牙刷、肥皂等日用品，还有 像信封、信纸一类的文具。买煤油也得去文安驿，不过要凭票购 买，最多只能买半斤。因为每次去文安驿买东西花费的时间比较 长，我们临时需要买什么东西都觉得很不方便。这也是近平后来 在梁家河搞代销点的原因之一。有了代销点，大家买东西就方便 多了。

张春富：刚开始时，我和近平一块在基建队打坝、修梯 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时候，看见近平用架子车拉土，他干活非常 卖力。砸夯是很累的体力活，四个人用石头拽着石头夯的四个犄 角，中间一个人扶着把，往下砸。近平打坝时，我就在半山上掏 土。虽然打坝很辛苦，但一场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坝冲垮，我们 只好反复地打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 鸡一叫就要起来，那时候天还不亮，我们就一担一担地把猪粪、 羊粪、牛粪往山上送。我们那时候挑担子都不会换肩，实在累得 不行了就把担子放在那儿，歇口气再重新挑起来。

采访组：请你们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学习情况。

张春富：插队期间，农村经常搞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 我们晚上经常在一起学习，通常一两天就要学习一次。我们知青 都在一起开会、学习。有时候，我们还要去文安驿开会。去文安 驿开会的时候，都得早起，走很远的路才能走到。并且那个时候 开会可不像现在有会场、有座位，大家都在公社大院里面，都是 站着听，通常都要站一两个小时。

社教运动的时候，我们就都聚集在一间窑洞里面，点着 马灯，学习毛

主席的最新指示，有的时候念念老三篇，有的时候 念念报纸，讲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那时候，我们学这 些东西一点都不烦，还是很有积极性的。

赵华安：在窑洞里的时候，近平就在炕桌上、炕沿上写 字。天气暖和的时候，他就搬一块石头，坐在石头上，趴在磨盘 上写。他写字的姿势挺有意思，把纸斜着放，手也顺着纸的角度， 斜着写字。后来我也试过一次那样写字，感觉是比较顺手。近平 写字很规矩，一笔一画地写，每一个字都整整齐齐，清清楚楚。

近平很喜欢学习，平时也很喜欢看书，喜欢思考，喜欢 写东西。他带来不少书，不仅自己经常看，也把书借给别的知青 和村里的老乡看，他也从别的知青那里借书、找书看。

“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上）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曹谷溪，笔名谷溪。中国作协会员。1941年 生于陕西省清涧县农村，曾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山花》 文学报和《延安文学》主编、路遥文学院院长。1975年曾采访 习近平，写成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1月23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安市谷溪书馆

采访组：曹老师，您好！习近平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当 年在延川县梁家河的插队经历，也曾提到过他与您和路遥的交 往。在您看来，以他为代表的这些“老知青”，为什么对那段岁 月念念不忘？

曹谷溪：非常感激诸位来延安采访我。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我先是担任延川县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知青一来，县里 让我当“知青专干”，以后又调任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与全县 插队知青有了更广泛的交往。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与包括习近 平在内的许许多多北京知青结下了深厚友谊。

对这一代知识青年而言，“插队”的经历，是从相对优越 的城市到贫困农村的生活转变，从无忧无虑的学生到辛苦劳作的 农民的身份转变，这几乎是所有知青始料未及的巨大蜕变。一个 个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下到农村来，与最底层的农民朝夕相处， 了解了农民的生活、愿望、喜怒哀乐和人情世故，势必要经历非 常艰难的心理与情感磨砺，由此深入了解我们复杂的国情，了解 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魂之所在。这段经历，正发生 在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于是，他们的担当精神、责任 意识，在中国西部的黄土高原上萌了芽、扎了根；“振兴中华” 的理想之火，在心灵的土地上点燃。

在和知青的交往中，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 人民共和国的未来。

1997年，我曾在《延安文学》第2—3期合刊的一篇文章 中，情不自禁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不知道亲爱的读者是否曾关注“老三届”们的命运和 成长过程？这是一批特殊历史境遇中造就的一批特殊胆略、特殊 气质、特殊品行的人们。他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继而又成群结队地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 的“再教育”。以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被招工、招干或当兵， 一些人被推荐上了大学，还有的到国外留学。总之，该走的都走 了，真正当了农民的寥寥无几。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茬人过早的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所 以，只要他们取得读书的机会，便拼着命往书里钻。有一位当了 省委副书记的北京插队知青，在上大学前就三遍通读《资本论》， 写了厚厚十八本读书笔记。这一代人，与其父辈们相比：少保守， 少教条；与比他们年轻的一代人相比：更具有使命感，多思考， 多实干。在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民族 的希望，是世纪交替的桥梁！

习近平，就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1969年初，他还不满 16岁就来到延川县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个小山 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是在陕北艰苦的农村度过的。这 段插队经历，虽然使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这段人生历 练，却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他念念不忘曾经养育他的 黄土地，念念不忘陕北的父老乡亲，说明他既是有情之人，也是 有心之人，是黄土地忠诚的儿子。

采访组：作为当时下乡知青中的“热血青年”他有什么 不同之处？

曹谷溪：那批知青大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新中国成 立后教育出来的第一代青年，普遍有理想有抱负，普遍具有以天 下为己任、为了国家兴盛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情怀。

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都努力拼搏、积极奋进，为改 变陕北老百姓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和好 事。由于受其父亲“问题”的牵连，他的这些热情最初并未得到 支持和肯定，甚至还受到漠视和怀疑。

知青刚进村不久，习近平到下驿村去看一个朋友，有人 给知青组长石焕南反映：他是不是来搞什么“串联”？

以后，习近平多次申请入党，却迟迟得不到批准.....“彭高习反党集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这是一把看不见的杀人利剑，谁不害怕？！

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零”开始，习近 平却要从“负数”开始；别人可以平地建塔，他却还得垫平脚下 的坑，夯实基础，才能开始建塔。然而，残酷的现实没有使他消 沉，反而使他形成更为稳重顽强的性格，比同龄人更具有刻苦的 学习精神和拼搏奋进的顽强意志。

要说习近平与其他知青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一是生于高干家庭，具有开阔的视野；二是生于革命家庭，具有 坚定的政治理想；三是在“文革”中插队当知青，使他更具有百 姓观念、法制意识。在没去赵家河之前，默默做事，不多言传， 积极要求进步，刻苦学习，首先要争取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地位。

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干一样的农活。每一位知青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不同，对农村生活 的适应程度自然不尽相同。最初来到梁家河的时候，对艰苦的农 村生活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但他能够调整自己，很快就在农 村扎下根，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在陕北黄土高原 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同时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他 是真正脚踏实地融入农村的知识青年。

延安人民像当年慷慨接纳那支精疲力竭的红军队伍一 样，又慷慨接纳了将近三万名北京知青。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 这些知青中有不少人受不了农村的苦，只待了几个月就想尽各种 办法离开这里。

有一回，我写了一篇贾家坪公社刘家沟大队“二十六朵 葵花向阳开”的稿子送到县广播站。哪知稿子还没播出，一夜间 就有25个知青“开了小差”，队干部连夜赶到绥德，说了许多好 话才接了回来。有的坚持一两年，还是打通各种关系离开了。

1973年，公社和县上都推荐习近平上大学。由于家庭背 景的原因，这一年习近平和王汉光都没有被录取。

习近平上大学落了空，在梁家河却非常意外地好事连连。 先是公社团委批准他入了团，紧接着又批准他入了党，延川县委 抽调他为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他和团县委书记陶海粟 编为一组，分配在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陶海粟也是知青，他 是清华附中的高中毕业生，1970年被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招收 为正式干部，后来担任了团县委书记。他和习近平是来往很多的 朋友。

1973年初春的一天，陶海粟、习近平和另外两名知青来 找我，让我给他们照相。就在延川县革委会大院二排的一道矮墙 前面，我用县里仅有的一台价值180元的上海牌相机给他们拍了 照。当时通讯组还有一间暗室，配有一台“浦江牌”放大机，只 我一个人有这间暗室的钥匙。原照片是6cmX6cm的小方块，我 亲自裁剪、扩印为5cmX7cm的长方形照片后送给陶海粟。他后 来又把这张合影制作成生日卡片，送给习近平。

社教分组名单出来以后，陶海粟对习近平说“我是队长， 你是队员；我是挂名，你是常驻;搞下的成绩都是你的，出了什么

问题全部由我承担。”

其实，习近平的才华初显，不是在他插队落户的梁家河， 而是在他搞社教的赵家河。

采访组：您说习近平才华初显是在他搞社教的赵家河， 请您谈谈他当年在赵家河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曹谷溪：的确，赵家河是习近平初展才华的地方。能去 搞路线教育就不是一般知青了，就对所在队的工作有了话语权， 对这个大队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有了影响。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以 身作则，要求群众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榜样，产生了巨大 的力量。

习近平在赵家河蹲点搞路线教育时间并不算长，只有八 个多月，但业绩非常突出，凸显了他非同一般的组织能力、协调 能力，充分展示了他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工作精神。他不仅负 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的整顿和生产队干部的配备等行政工 作，还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他坚持与农民一起修梯田，打 土坝，植树造林.....

我在赵家河采访时，与村里上年纪的农民聊天。他们说， 习近平开会和其他干部不一样，其他干部开会，讲话的时候老百 姓在下边抽旱烟的、说闲话的、纳鞋底的，基本上没有人听。每 次开会，都是乱哄哄地开始，稀里糊涂地结束。唯独习近平开会，

他讲话的时候大家都静悄悄地听，积极参与讨论。

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老汉说："近平一满（陕北方言，从来，全部的意思) 不说空话，不说大话。他说的，都是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他做的， 都是我们想做的贴身事。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讲话。"

赵家河有个农民叫武刚文，小名叫"随娃"，和习近平关 系很好，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好后生。比如放羊，这个活儿技术含 量不高，但他干得就比别人好，他把这些羊训练得非常听话。他 放的羊，只吃地上的野草和那些散落在地里的豆粒和糜谷穗子， 即使赶着羊群从庄稼地旁走过，哪只羊也不敢吃一口庄稼。春种、 夏耘、秋收、冬藏，样样农活，随娃都是打不下台的"好把式" (陕北方言，能手、行家）。他一身虎气，参加集体劳动从不耍奸 溜滑，拈轻怕重。他有谋略，会计划，又能拢住人（陕北方言， 有领导才能），在群众中人气很旺。

六十年代初，十几岁的随娃就当了生产队长，把生产抓 得红红火火，深得村里人拥护。1965年春天，县委书记带另外 两个干部扛着自行车，从清平川翻山来赵家河视察。不巧，刚进 入赵家河村地界，就看到随娃带着社员在开垦一片荒地。在那个 年代，生产队干部领着社员集体开荒，是违反政策的严重错误。 县委书记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撂，厉声问："谁是队长？"并批评随 娃"胆大包天"，竟敢"带头开荒，大搞资本主义！ "一堆大帽子 扣了过来。

随娃性子犟，他根本就不认为开荒种地、多打粮食、吃 饱肚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说啥也不服气，竟跟县委书记高喉咙 粗嗓子地吵了一

架。不久，随娃这个队长被公社免掉了。

随娃被“免职”了，赵家河的粮食产量马上就降下来了， 连续多少年都没达到随娃当队长时的水平。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这对赵家河村民来说，是 一件不小的事情。但随娃就是个倔脾气，他死牛顶墙，发誓这辈 子再也不当生产队长！

1973年，习近平来到赵家河驻队，得知随娃八年前被“免 职”的事，就决定去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重新当生产队长。习 近平第一天去找他谈，没有说通。第二天习近平又去找他谈，随 娃还是摇脑袋。第三天，习近平又把随娃叫到他办公的窑洞，整 整谈了一个通宵。他反复对随娃讲：“为了多打粮食，是对的， 但开荒增产的办法，就违反了政策。因为免职赌气，哪里还像个 男子汉！”

习近平的耐心与真诚感动了随娃，他终于愉快地说：“能 成！我同意再当一回生产队长。”

当时，村里有人开玩笑说：“习近平这后生的火真旺，要 不怎能煮熟随娃这颗‘牛筋圪蛋’（陕北方言。牛头，很难煮熟。 这里是顽固不化的意思）！”

随娃当了生产队长，队上的面貌立竿见影发生了变化。 前不久，我去赵家河还拜访了随娃。他现在住的窑洞，还是四十 多年前习近平住过的那个老窑洞，也就是与他通宵谈话的那个窑 洞。

陶海粟和我既是县革委会政工组的同事，又是交往三四 十年的朋友。2013年，我曾陪他重访赵家河。我们聊起当年习 近平在赵家河工作的往事。他说，有一回他到赵家河去，见习近 平正在翻修一个旧厕所。

陶海粟说：“近平，这个活儿你干不了。”习近平说：“这 个厕所年久失修，总得有人修！”在陕北，许多农村的厕所不分 男女，合用一个厕所。上厕所的人在里面，听见外面有人来了， 就咳嗽一声，来的人知道里面有人，就避开了，很不方便，常常 使人遭遇难言的尴尬。习近平不仅把这个“年久失修”的厕所翻 修一新，而且把它建成了赵家河村有史以来第一个男女分开的厕 所。

当年，习近平搞路线教育时住过的窑洞现在成了随娃的 家，只是土窑

的墙壁被随娃用白灰重新粉刷，后窑掌那根顶梁柱 被随娃拆掉了，用柳椽箍条所取代，并增添了冰箱和彩电。习近 平和群众一起修筑的大土坝，已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我亲眼 看见坝里的玉米长势喜人。他们栽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 村民们在林前立了一块“知青林”的青石碑。遗憾的是那个“男 女分开的厕所”，在拓宽公路时被推土机铲掉了。

习近平搞路线教育工作的业绩受到赵家河村群众的称赞 和公社的认可。路线教育结束时，冯家坪公社党委书记赵廷璧要 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

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人 才怎么能给你！ ”社教一结束，文安驿公社党委就决定习近平担 任梁家河村的大队支书。

陕北黄土高原，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对他而 言，这既是新的考验，又是提高自己、锻炼自己的新机遇……

采访组：习近平在插队期间一边劳动，一边拼命读书。 请您讲讲，他是怎样读书的？都读了哪些书？

曹谷溪：这个问题问得好。习近平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 是酷爱读书。

在我多年、多地、多人的采访中了解到，习近平几乎视 读书如吃饭、饮水一样必不可少，是同样重要的生活内容。干农 活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田间地头休息，男人们或聚在一起抽旱 烟，或去山洼里砍柴禾、拔猪草。女人们抽空儿纳鞋底、做针线。 习近平总是利用这些零碎时间埋头读书。他在山上放羊，把羊赶 到山坡上吃草，自己就坐在地畔上读书。每天晚上，他都要在煤 油灯下，读书到深夜……

据我了解，当时在知青中，读书最多的就是他。每次他 到延川县城来，我见到他总是背着鼓鼓囊囊的一挎包书。他随时 随地都在想尽办法找书、看书。他的读书面非常广，中国的、外

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哲学的、文学的、自然科学的 尤其

是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他涉猎的更多。

我有一个大学毕业回乡当了大队支书的朋友，叫鲁北江。 他说：“1975年5月，我参加了延川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 会，看见习近平的挎包里装着许多书，想借一本。他不假思索地 给我从书包里抽出一本，是沈括的《梦溪笔谈》。”

听说，他为了找到歌德的《浮士德》，跑了三十几里路才

借到手。

更令我惊奇的是，他不仅阅读古今中外经典名著，连我 和路遥等文学青年创办的《山花》文学报，也列入了他的阅读范 围。

我非常赞赏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仅次于选择益友的， 就是选择好书！”

通过对习近平在延安七年经历的采访和调查研究，观察 他的成长历程，我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成功，是成功者主体的 成功。但没有成功的机遇或者成功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成功依 然是一句空话。然而，机遇不会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它只为那 些有准备的人提供。”

习近平就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在插队期间，面对特殊历史 时期的苦难和磨砺，习近平没有抵触，没有怨言，而是迎难而上， 努力奋进。他在插队期间刻苦读书，充实知识，提高文化修养。 又通过身体力行的劳动，担任村干部，带领乡亲们改变村庄的面 貌。这样的插队经历，使习近平在知识上有了充分储备，实践上 有了丰富经验。

《孟子》里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的， 没有“独善其身”，又怎能“兼济天下”？

采访组：您1975年写过一篇通讯《取火记一一延川县人 民大办沼气见闻》，发表在当年9月20日《延安通讯》的头版头 条。这篇报道真实反映了习近平当年带领群众克服困难建设沼气 池的事迹。请您谈谈，为什么他当年要在陕北建设沼气池？

曹谷溪：现在说“沼气”利用，年轻人很难理解。为什 么不用电灯照明？为什么不用天然气或者电磁炉做饭？的确，现在 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习近平当年为什么要大办沼气。

历史上，陕北一直多旱少雨。口耳相传的“祈雨歌”令

人心碎。

大沟小河断流了，山山峁峁着火了，五谷苗子晒焦了……

女人们哭，男人们喊，老汉、娃娃跪下一河滩，龙王爷 哟，降甘霖，龙王爷哟，救万民！

多少代，多少年，山民们虔诚祈祷、隆重祭祀都无济于 事。春天把希望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播进黄土，然而收获的往往是 肆虐不羁的秋风.....

我清楚地记得，到了上世纪60年代，陕北还流传着这样 两句顺口溜：

穿得好，走得快，肚子里装些酸白菜.....

在习近平插队的年月里，他目睹陕北群众不仅口粮严重 不足，连煮饭的柴禾也非常困难。

牛拉屎了，赶快用手一掬，撇在土墙上，晒干当柴烧。 每年夏季山洪暴发时，男人们都会挥动一柄两三米长的捞河柴 “勺子”冒着生命危险在洪水中打捞从山沟里冲来的柴禾。一 勺勺捞出来，一筐筐提上河畔，在石板上晒干当柴烧。我五十八 岁的父亲就是在捞河柴时坠身洪流而亡，乡亲们追了十五里路程 才找回他的遗体.....

曾任我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和中联部副部长等职的艾平 同志，是延川县关庄公社二八甲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与习近平 插队的梁家河一山之隔。他在一篇回忆文章写到：“印象很深的， 吃饭真不容易。那时候，水要到河边井里去挑，到了雨季，井被 洪水漫了，多少天吃水都是问题。柴要到山里去砍。砍一天柴烧 不了几顿饭。当时村里没有钢磨，用队里的牲口磨面还要排队， 排不上队就得人推碾子人转磨盘。”

这里，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更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年，一个干部下乡在农民家里吃“派饭”。面条煮进 锅里了，突然无柴可烧，连牛粪、羊粪都没有了。那女人赶快脱 下自己的布鞋置入灶火口，用力紧拉风箱，终于煮熟了锅中的面 条。我不知道习近平在延安插队时，是否听说过这个“烧鞋煮面” 的故事，但我深深理解他试办沼气的良苦用心。

我在1975年9月21日的《延安通讯》上发表了《取火 记》。报社对这篇通讯很重视，主编李彬同志亲自撰写“要大力 推广利用沼气”的社论，整整拿出两个版面，详细介绍了习近平 在梁家河发起的那一场“沼气革命”。文中写道：

火，是被人类征服的第一个自然力。从远古钻木取火的 神话传说，到煤、油、天然气和太阳能的利用，人类为了火的利 用，燃料的来源，曾用几十万年的艰辛斗争，不断换取人类的文 明、进步！今天，正在陕北黄土高原、黄河之滨展开的沼气推广 利用，正是这个斗争的一个新的回合.....

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 的报道，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思。夜里，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延川 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小油灯下， 仔细地阅读着这篇报道，他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入睡。心想：我 们这交通不便、少煤缺柴、尚未通电的山区，能够像四川一样利 用沼气煮饭、照明该有多好呀!他步行五十多里山路来到延川县 城，把自己想到四川学习制取沼气的事告诉了北京支延干部、县 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张之森同志，老张呵呵一笑：“小习， 咱们都谋到一条路上了！”

4月1日，县委根据老张等同志的建议，决定派有关部门 的六名同志前往四川“取经”，小习也是其中的一个。

五月初，全体常委听取了赴四川学习办沼气同志们的汇 报，根据延川的不同地理情况，选定县农场和梁家河等四个点进 行沼气试验。

正在习近平他们破土施工之际，有人说风凉话：“要是沼 气能点灯煮饭，除非母鸡叫鸣，公鸡下蛋！”有人甚至断言：“沼 气过不了秦岭！”习近平鼓动他的战友们说：困难面前有我们， 我们面前无困难！

建池需要沙子，可是梁家河没有，习近平同志就带领几 个青年到十五里外的前马沟去挖。建池的水泥运不进沟，他又带

头从十五里外的公社背了回来。没石灰，他们又自己办起烧灰 场.....

(未完待续）

“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下）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曹谷溪，笔名谷溪。中国作协会员。1941年生于 陕西省清涧县农村，曾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山花》文 学报和《延安文学》主编、路遥文学院院长。1975年曾采访习 近平，写成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

采访组：建设沼气池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习近平是 怎样克服的？沼气池建成之后，带来哪些影响？

曹谷溪：在建设沼气池过程中，习近平既是指挥员又是 技术员，遇到的困难都由他来解决。在那个年代，建筑材料的质 量、施工精度，都和现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气池因为有裂缝， 沼水从裂缝渗入地下，就不能和粪便这些原料产生化学反应，也 就无法产生沼气。为了维修沼气池，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把沼 气池里面的水、粪便，全部挖出来。然后下到沼气池里，打着手 电筒找裂缝，用水把裂缝冲洗干净，再用水泥仔细地修补。在炎 热的夏天，沼气池里臭不可闻、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过气来。 这种又脏又累的活计，恐怕许多人是不愿意去干的。

排除了这些故障，沼气池很快就可以正常产气了。1974 年7月中旬，沼气池顺利点火，梁家河亮起了陕北高原的第一盏 沼气灯，一举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当时，整个延川 县都轰动了。对于当地山区的农民来说，切实感受到了建沼气池 的好处，纷纷到这里来“取经”。一时间，梁家河这口沼气池， 变成了沼气宣传站，从早到晚挤满了从其他村赶来看稀罕的人。 习近平和参加建池的几位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介绍沼气制 取的办法和利用沼气的好处。每天都不厌其烦地给参观的群众示

范沼气使用的方法--把沼气灯的开关一扭，划根火柴一点，灯

泡的光芒比60瓦的电灯还明亮。把灶膛里的沼气点燃，蓝色的 火苗呼呼地烧着锅底，那火很“硬”，几分钟工夫，半锅凉水就 “咕嘟咕嘟”地烧开了。

习近平建成的陕西第一口沼气池，在延川县掀起一场轰 轰烈烈的沼气

革命。延川县革委会在梁家河召开“沼气现场会”。 8月16日，延川县委在第8期《延川情况》上，通报表彰了习 近平和他所领导的梁家河大队党支部。

1975年8月23日，共青团延川县委9号文件将他树立为 “先进青年”，号召全县青年向他学习。

1975年8月22日，陕西省沼气推广利用现场会在延川县 召开。会议代表参观了梁家河和上驿沼气池后，在上驿知青大院 的一棵老槐树下搭戏台作为会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 作“沼气要大办，政策要落实”的经验介绍。

在那次现场会上，文安驿上驿大队政治夜校的学员，为 与会代表表演了陕北说书《四个老婆夸沼气》、小演唱《山村盛 开沼气花》和陕北大秧歌等文艺节目。公社团委副书记、上驿大 队团支部书记、“铁姑娘战斗队”队长柴富华告诉我，她当时编 写了快板《大办沼气就是好》：

全省沼气现场会，定在延川文安驿。

省地县领导来视察，欢歌笑语满沟飞！

北京知青习近平，他和咱老百姓心贴心。

亲自到四川去取经，山村点亮沼气灯。

文安驿公社把令下，以点带面把沼气抓。

白天修梯田又打坝，夜晚建池搞粉刷。

过去做饭太麻烦，如今做饭拧开关。

自从咱把沼气办，解放妇女搞生产。

人人动手办沼气，自力更生最便宜。

点灯煮饭省力气，沼气肥料送集体。

沼气灯、夜校挂，

社员们灯下学文化。

技术培训首先抓，全县盛开沼气花!

柴富华说，她亲自登台表演，还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 公社和县上的表扬。

1975年7月15日至21日，延安地委召开全区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表扬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 个人。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被评为先进个人，他和 延川县的北京及本地知识青年20余人，光荣出席了这次大会， 并受到隆重表彰。

习近平克服重重困难带领村民修建沼气池，或许就这件 事本身来说，这只是他人生中的一次小小历练。但就这件事产生 的后续效应来看，对当时整个陕西省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一 定不要轻视工作中的那些小事。做大事的人，都是从全心全意做 好一件件小事中成长起来的，而人的情操也是从这些看似平凡的 小事中培养起来的。当时的习近平，修建这个沼气池，他心中所 想的，或许是为梁家河的老百姓带来温暖和光明，不再让婆姨女 子为了烧柴煮饭熬煎（陕北方言，意为受煎熬）。这种精神，在他 后来担任各级领导的施政实践中不断升华，最终成为“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情怀！

采访组：您到梁家河采访后写出了《取火记》，对习近平 当年在梁家河村带领村民建设沼气池事迹作了最早报道，在陕西 全省推广沼气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请您讲讲当时采访过程中让 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曹谷溪：当时，我已经调到延安地区革委会通讯组。延 川县委书记申易知道我对县上情况熟悉，掌握的资料多，特意把 我从延安叫回延川，让我报道习近平在延川县掀起的这一场沼气 革命。

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申 易书记给我派了一辆吉普车去梁家河采访。在梁家河村口，吉普 车涉水过一条河，河对岸是一个土坡，吉普车轮胎上带了很多水， 上那个土坡的时候轮胎空转打滑，怎么也上不去。这个时候，来 迎接我们的习近平喊来了几个后生，一起在后面推车，几个壮小 伙子“呼”地一下就把吉普车推进知青住的院子里了。这是一件 小事，过了很多年以后，我逐渐也就忘记了。

2012年，我看到了一个报道：8月21日，时任国家副主 席习近平出席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 28届大会开幕式。当习近平致辞结束时，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 席罗伯特•威廉姆斯上前，准备握手祝贺，这个时候，他不慎将 眼镜掉在地上。习近平主动俯身蹲下，捡起眼镜，送还给威廉姆

斯先生，两人再次亲切握手，现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看到这个报道和相关新闻图片时，心情非常激动，猛 然就想起当年他帮我推车的事情。

多少年过去了，习近平还是这么朴实，这么平易近人。 无论是1975年的大队书记，还是2012年的国家副主席，他待人 真诚、为人实在的品格始终没有变。

我想，一位官员甘于为普通人弯腰屈膝，必然会被更多 的人翘首仰望。正如西汉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一句 话："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那一天，我在梁家河采访习近平，和他谈了很多。采访 中，他讲到群众的"功劳"就滔滔不绝，但是一讲到自己就讲得 很少，很简单。我心里就想："这个年轻后生，功成不居，谦虚 谨慎，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不久之后，北京给延川县一辆130工具车，一台三轮摩 托车。县上决定把工具车奖给孙立哲的合作医疗站，把摩托车奖 给梁家河党支部书记习近平。

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唯有习近平不高兴。他说"这 个摩托车对咱有啥用！拉不了多少东西，又不能下地干农活，难 道我天天开着它去兜风吗？"他当即就委托梁家河的老支书梁玉 明，到延安农机公司把这辆三轮摩托换成手扶拖拉机等农机具。

在那个年代，你们知道这些农机具对一个生产队是何等 的重要、何等的金贵吗？

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支书丁爱笛也是一位北京插队知 青。当时，一台手扶拖拉机售价3000多元，可是队上没钱。他 领了几个壮实后生，到十五里外的杨家坪小煤窑去当临时的"炭 毛子"。这个煤窑设备极为简

陋，八十多米深的垂直矿井只安一 台五马力的柴油机接送工人上下和吊出井下的煤炭。挖煤工没有 矿灯，在布帽上挂一个麻油灯壶，在八九十公分低矮的巷道里爬 行和劳作。井下穿不成衣服，躺在掌子面下挖煤，全靠屁股扭动， 细皮嫩肉与岩石摩擦几个小时就血肉模糊，疼痛难忍；不仅挖煤 苦，往出运煤更苦，一根粗麻绳套在肩膀上，后面缒几百斤重的 煤拖子，全靠手掌、膝盖、脚趾相互配合，像一只硕大的蜗牛奋 力爬行……

“他们咬着牙，苦干了十几天终于挣够了买手扶拖拉机 的全部费用。”丁爱笛告诉我，“一个叫王汉生的女知青也要去挖 煤，我说，煤窑里不准女人进去。她偷偷地到小煤窑来了一回， 看见我们的样子，回去难受得哭了三天三夜。王汉生以后入了党， 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前两年不幸病逝”。

这就是人们说的“知青岁月”！

这就是我在那个年代所结识的知青朋友！

采访组：习近平曾在延安插队七年，他与这方土地，与 这里的老乡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曾说自己是“黄土地的儿子”。 2015年2月13日又回到梁家河，他喊着乡亲们的名字，与大家 坐在一起拉着家常。他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 这里。”您能否用您的所见所闻，给我们诠释这种深厚的情感？

曹谷溪：1975年10月，习近平被推荐上大学。像当年乡 亲们送亲人上前线、去打仗一样，梁家河村民们家家户户请他到 家里吃饭;张家送一碗南瓜籽、李家送一包大红枣；还有好几个婶 娘、大嫂给他送了精心绣制的花鞋垫……离村时，全村男女老少 把他送到梁家河沟口，还选了梁玉明、石春阳等十三位代表一直 将他送到县城。

离开延川前夕，延川县委书记申昜把习近平请到家里， 让老伴亲手给他做陕北过大年吃的“红条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自己是“黄土地的儿子”他的 “根在陕西，魂在延安”。我想，恐怕很多人难解深意。

我曾在许多个场合讲过，陕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 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黄河、长城 和黄帝陵，非常奇

妙地在陕北这块黄土地相聚。所以，在她赤裸 裸的大山之中，弥漫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色彩。海内外的华

人都将这块土地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论是土著的陕北人， 还是投身于这块土地的异乡人，只要他的心脏与这块土地同步震 颤，这块土地就会给他智慧，给他胆略和勇气，不管是政治家、 军事家还是文学艺术家，都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

习近平说自己的根在这里，其实中华民族的老根就在这 里！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 央所在地，曾经是中国解放战争总后方。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 导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敌人的飞机、大炮，新中国大踏 步从延河河畔走进了天安门广场！

延安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我从一篇关于习仲 勋的文章中得知，他曾经背一个生病的老汉去医院，曾经给产妇

买药，曾经帮助一个清洁工人推垃圾车 做过数不胜数的这样

那样的事，只要见到群众有困难，他一定会伸手相助。可见，习 近平的这些特点，就是传承了父辈的高贵品格。

我曾在一首写刘志丹将军故里的诗中如是写道：

山丹丹花，灿烂在，老将军的马蹄印里；

那个时代的篝火，正燃烧在，红军子孙的心灵深处！ 想必在习近平的工作生活中，面前总会有一棵挺拔的树， 那便是他的父亲。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延安之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曹谷溪：习近平离开延安之后，我们保持着联系。习近 平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厦门出差，顺 路去看望他，可惜他当时没在。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概内 容是：“谷溪同志，我在延安得到了锻炼，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离开延安之后，我非常怀念延安，常想回来走走看看。”

1993年，习近平回到了延安，我俩整整18年之后久别重 逢，非常高兴。在延安宾馆，他双手握着我的手问我：“身体还 好?”

在延安枣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小礼堂”旧址前，他们 和时任延安行署专员张志清、纪检委书记申昜（原延川县委书记) 合了影。

2003年6月，我已从《延安文学》总编岗位上退了下来， 参与《绥德文库》编纂工作。抗战时期，习仲勋同志曾任中共绥 德地委书记，在《大众报》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因为将习老作品 收入《绥德文库》的事，我6月9日致函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 近平。同年7月19日，他给我复了信。

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也曾给我写过一封信，邀请我 到福州去参观访问。但那时我在《延安文学》杂志社工作，每天 都很忙，一直没去成，很遗憾。之后，我还给他邮寄过自己创作

的两本书《与文学朋友谈创作》和诗集《我的陕北》。

采访组：2015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与上海代表曹可 凡聊起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全国热播时说：“我和路遥很熟， 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办《山花》的时候，还只写诗歌， 不写小说。”您能讲讲他当年与路遥的交往情况和住过哪个窑洞 吗？

曹谷溪：1969年，路遥由于“文革”问题，免去他革委 会副主任的职务，他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回到了刘家圪 崂大队的郭家沟。

路遥家住的郭家沟与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都是文安驿 川里的两个小山村，两个村子只不过一山之隔。

要说习近平和路遥，必须先说另外一个人，他就是在冯 家坪公社段家圪垯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陶海粟。他原是清华附中 的高材生，1971年被招干到团县委（当时为县革委会青妇组）， 和习近平是来往很多的朋友。习近平每每进城办事，必然到陶海 粟那儿落脚；那时候，我已将路遥招聘为“农村通讯员学习班” 的学员，长期脱产学习，和我一起写通讯，办《山花》。

应该说，那时候陶海粟是《山花》的骨干作者。他发表 在《山花》上的政治抒情诗《每当我打开〈共产党宣言〉》《生命 不息，战斗不停》和《国庆抒怀》等诗作，其思想深度、艺术水 平都在我和路遥之上。

我以为，在那个特殊年代，《山花》文艺报为习近平、路 遥和陶海粟等几个有才华、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架起了友谊的 桥梁！

那个年代，习近平与路遥、陶海粟接触得多，他们都是 爱读书、善思考、有抱负的青年。土生土长的路遥，一直渴望走 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以实现自己干一番大事业的理想。路遥 着魔似的让京都文化与乡土文化在自己的心中融汇与碰撞。因 此，只要习近平一来，他总是主动去找他交谈，有时竟彻夜长谈。

习近平和路遥交谈的范围很广，谈农村，谈城市，谈社 会，谈时政……他俩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路遥惊叹: 他年龄比我小四岁，知识面比我广得多，志气比我高得多。

习近平说，先贤们的思想结晶，许多人的智慧和成功的 经验都在书里，无须经其同意便可拿来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呢? 只有愚蠢的人才不去读书。

也许，路遥受习近平这番谈话的影响，1988年9月，延 安大学50年校庆时，他在校友座谈会上语重心长地讲道，我劝 亲爱的同学们，千万不敢把书本当作自己的“敌人”！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说他和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

个窑洞。之后，就有好几家媒体记者问我，他俩住过哪个窑洞?

我说，当年延川县革委会住房非常困难，所有的干部都 是宿办合一。我和路遥住在一个窑洞办公。那时候，不管谁有客 人来，哪个同志的窑洞有空位，就可借宿。当时，习近平是一位 插队知识青年，后来才当了大队支书，他一年要有几次到县城办 事，县上不会为他安排一个固定的窑洞住宿。

我以为，现在考证习近平曾和路遥住过哪个窑洞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与上海代表曹可凡谈这个话题？这个谈 话，向我们传达了怎样的信息？

我以为，习近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的谈话，凸显党中央对文艺工作 的重视和亲切的关怀，鼓励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像柳青那样长期 深入生活，与人民大众

同呼吸共命运，去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创 业史》；鼓励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像路遥那样在《平凡的世界》 里，用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去完成历史交付自己的神圣使命，“像 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鼓励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像《山 花》那样，植根于人民大众，创作出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向上 向善的优秀作品。

采访组：您对习近平在延安插队时还有什么鲜为人知的

故事要讲吗？

曹谷溪：习近平在延川插队的七年里，不仅在大队和公 社交了很多朋友，而且在县里、地委也有许多朋友。延安地区知 青办副主任高鸣池同志就是其中一位。他从赴京迎接知青到延安 安置知青，做了许多具体而繁杂的工作，在多次的交往中，他与 习近平建立了深厚友谊。

1975年10月，习近平上大学前专门到延安高鸣池家中辞 行。他知道高鸣池家中生活非常困难，临别时硬将50斤全国通 用粮票送给高鸣池。在那个困难的年代，50斤粮票是何等金贵 呀！为这事高鸣池感激不尽，习近平上大学后，他专程去北京看 望。2007年8月24日他致函习近平，汇报自己的家庭情况与延 安的变化。仅11天，便收到了习近平9月4日那封热情洋溢的 回信。

高鸣池同志：

你好！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来信勾起了我对延安的回 忆。

我离开延安已有30多年了，但我始终不曾忘记延安，不 曾忘记在那段岁月里关心、支持过我的人们，我非常感谢您当年 对我的无私帮助。

得知延安变了，山绿了，水清了，交通发达，群众生活 改善，我感到十分高兴，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我相信延安 的未来会如您所期盼的那样：“一个更加美好的新延安将屹立在 陕北的黄土高原上”

衷心祝愿您的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顺颂

秋安！

习近平

2007年9月4日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16日我专门 邀请原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和高鸣池两家在延安虹桥饭店的“乾坤 湾”餐厅吃饭。

饭后，高鸣池给了我一封不久前他写给习近平的信和习 近平给他的回信，要我在合适的时候找个媒体发表。连说：“拜 托，拜托！ ”3年前，高鸣池因病逝世，我想借这个机会了却老 友高鸣池久埋心底的夙愿。

2015年2月13日，农历乙未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到陕西 考察调研的第一站，就来到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他在同梁家 河父老乡亲谈心的时候，深情地说：“当时我离开梁家河，人虽 然走了，但是心还留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今后如果有条件、 有机会，我一定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

是啊，他早已将信仰的种子播种在那片渗透父辈血汗的 黄土地上。早在2002年，他就在公开发表的《我是黄土地的儿 子》中写下了“为人民做实事”的誓言一一 “15岁来到黄土地 时，我迷惘、仿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 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 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梁玉明（小名：王栓），1942年2月出生，陕 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人。1965年入党，1968年至1974年担任梁 家河村支书，1974年1月至1975年1月担任梁家河村委会主任。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时，您是村支部书记。 他到梁家河以后，您与他朝夕相处，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很多接 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插队期间的情况。

梁玉明：近平他们来下乡的时候，我是梁家河的村党支 部书记。那个时候，农村以粮为纲，村支书就是大队长，主要的 工作就是带领社员

苦干，大干，多打粮食，一切工作都是以粮食

生产为中心。

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是1969年的元月17号到的我们 文安驿。那天，我们村派了两个生产队的社员，还带着毛驴，赶 到文安驿把他们接了回来。

知青都带了很多行李，大包小包大多装的是衣服、被褥，虽 然看着挺大，但分量并不重。近平有两个箱子，不算大，有个社 员看他的箱子小，以为很轻，过去一拎，结果死沉死沉的。社员 说："呀，这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重！里面装了金元宝吗？" 当时我们梁家河大队有两个小队，一个前队，一个后队，也 叫一队、二队。回来以后，我们就把这15个北京知青分到两个 队。一队住了 9个知青，5个男的，4个女的，两孔窑洞就分别 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二队是6个知青，其中包括近平，全都 挤到一孔窑洞里，在一铺炕上睡觉。

他们这些北京来的后生，连我们山沟沟里的灶台都没见过， 更不会烧柴做饭。我们队上就派了一名社员负责给他们做饭。过 了两个月以后，他们学会了做饭，以后就都是自己做饭了。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村里人和这些北京知青都熟悉了， 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近平那两个沉甸甸的箱子里装的全都是书。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慨：近平当时是个十五岁的娃娃，虽然个 子高，但是挺瘦的，这两大箱子书，我们干惯了体力活的社员都

觉得太沉了，他竟然从北京一路给搬到千里之外的山沟沟里来， 真是太不容易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观察这个知青里 面年纪最小又爱读书的娃娃。　采访组：知青刚到村里的时候

遇到什么生活上的困难吗？　梁玉明：知青首先遇到的障碍

是语言交流上的困难。我们陕北的口音很重，知青刚来的时候， 语言跟农民不通。刚开始时，知青说了一句话，农民听不懂，就 说"害怕"。知青就懵了：跟你说句话而已，你害啥怕？其实农 民说的是延川本地的方言："害不哈"，是"听不懂"的意思，知 青也听不太明白，就听成了"害怕"。知青就问我："我们一说话 老乡就害怕，这是咋回事？"我跟他们解释说，他不是害怕，他 是说"害不哈"，意思就是"听不懂"。我

就跟知青说，你们要学 老百姓的语言，学会陕北方言，这样才能方便沟通交流嘛！慢慢 地，知青就学着说我们本地的方言，与社员交流起来就没有语言 方面的障碍了。　采访组：尔们是怎么和知青们熟悉起来的？

梁玉明：那个时候，我们社员经常和知青在一起学习。我记得当 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比较多，《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 白求恩》等等。我是村党支部书记，组织给他们上课，但是实际 上，我也是和他们一起学习。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毛主席 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

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这句 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衡量对错的标准，应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我们始终要坚持好的，坚持对人民有益的，改正那些错的，那些 对人民无益的。这篇文章不咋长（陕北方言：即不怎么长），我 见近平反复地看，反复地读，爱不释手。我当时还在心里想：这 个娃娃咋这么爱学习呢！

在梁家河插队的这段时间，近平还阅读了大量书籍。政 治、经济、哲学、文学方面的书，他看得真是太多了！只要有一 点点空闲时间，近平坐下来就看书，有时候一直看到深夜才睡。 那时候在我们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近平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上 山劳动，想学习只能硬挤出一点时间，晚上看书只能就着昏暗的 煤油灯，但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他却对学习有着浓厚的热情。 我们都说，社员抽烟有"烟瘾"，近平读书有"书瘾"。

今天我们总是跟孩子说："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 这条路，对于当时的近平来说，几乎就是不通的。他父亲习仲勋 当时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近平本人被划分为"黑帮子弟"，他 就算刻苦学习，一般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实际上，近平读书并 没有明显的功利性，也不是为了考大学，而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 他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我就没见他离开过书本，没见他放弃 过读书。尤其是他当了我们村的村支书之后，他每天不仅要和社 员一样劳动，还要处理村里的大事小事，在那么忙的情况下，他 仍然坚持读书。社员到他窑洞里去，都说：你看这炕头上的书堆 得满满的！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热爱知识，他怎么能在那么艰苦的 情况下坚持读书？怎么能七年都坚持读书呢？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除了劳动和读书外也参与村里的工

作吗？

梁玉明：过了一两年，近平就成了我们梁家河的自家人。 他有文化，办事有条理，说话有道理，村里人都跟他关系很好， 也很信服他，所以他开始参与村领导班子的各项工作了。

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二流子”，五十多岁的人，不务正业， 偷鸡摸狗。我就教育他说：“你不改正这毛病，你就不是一个好 社员！ ”可是这个人就是屡教不改。有一次，他偷队上的葱被抓 住了，就被定为“管制分子”。那个时候，对这样的人是很严厉 的，要把他关起来，还要开社员大会，给他头上戴个帽子，轮流 对他进行批判。我们农村批判人，其实就是轮流骂他，骂他个狗 血淋头。批判会上，近平和雷平生也参与了，但是对这个“二流 子”，没有说一句侮辱人格的话，而是以平和的态度，给他讲道 理，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社员上去骂“二流子”的时候，“二 流子”低着头，闷着声不吭气。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地 给他讲道理，教育他改正错误，“二流子”听了直点头。在批判 会上，被批判对象是没有权利说话的，见他点头了，近平和雷平 生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二流子”就高高兴兴地唱了一 曲，唱得又高亢又嘹亮。批斗下来之后，“二流子”说：“我老汉 以后要向北京的娃娃学习，可不敢再偷了。”经历了这件事，村 里人都竖起大拇指说：北京来的娃娃行！

后来我跟近平聊起这件事，他跟我说：“他只是犯了一些 毛病，完全可以改过来，还是可以团结的人嘛。咱们应该以教育 为主。”果然，这个屡教不改的“二流子”，经过近平和他几次谈 话，很快就有所转变。从那以后，这个人再也没有偷鸡摸狗，不 务正业，而且开始好好劳动，成了我们村一个好社员，跟近平也 成了好朋友。

从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习近平，懂得做工作说到底还是做 人的工作。你想想，这个“二流子”已经五十多岁了，屡教不改， 一直犯错误，村里人都讨厌他。但是近平做工作的出发点很公平， 也很平等，他不是出于主观情绪，也不是出于成见，而是给予别 人必要的尊重，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人心里去。近平尊重人，团 结人，有很好的工作方法，很了不起。

还有些社员，偷奸耍滑的，生事打架的，近平都能帮忙做思 想工作。

有一次，村里两个婆姨闹架了，闹架以后开始没完没了 地互相骂仗，两个婆姨见面就骂，隔着沟也骂，隔着路也骂，骂 的那个话多难听就别提了。骂得不可开交，就闹到我这里来了。 我说，让近平来给你们调解一下吧！近平来了之后，分别找她们 两个谈话，后来不知道又谈了多少次。最后，这两个婆姨的关系 好起来了，还成了好朋友。我当时就觉得，近平这个人真会做工 作。村里的事情特别多，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近平来帮忙， 他每次都能把事情办得稳稳的，社员都很满意。

采访组：习近平入团和入党都是在梁家河，您了解具体

情况吗

梁玉明：1972年，近平追求进步，要入团，但他这个事 情却是一波三折，费了很大的劲。他先后写了好几份入团申请书， 交给公社的团委书记，直到那一年秋天，他才正式被批准入团。

到了 1973年，我们县上招聘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就把近平 调到贾家坪公社的赵家河村去主持社教工作，他在赵家河把社教 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带领村民造坝地也造得很好，跟村里人的关 系也处得非常好。赵家河人一看近平这么能干，群众关系又好， 就想把他留下，不让他回梁家河。我们梁家河不同意，坚持要他 回来一一近平是我们的人，咋能去你们那干了几个月就成了你们 的人哩？后来问近平的意见，近平说："我还是回去吧！我从梁 家河出来的，我还回梁家河去。"就这样，1973年的7月份，近 平又回到了梁家河。

回到梁家河以后，村里想让近平在村里主持工作，但他还 不是党员，申请入党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近平写好了入党申 请书，我和梁有华当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我就组织开了一个党员 会。党员会上，大家都同意近平入党，之后我又开了支部会，同 意接收习近平入党。支部通过以后，我就把这个材料拿到公社， 但是公社当时的书记不批。他还批评我说："你这个梁玉明这么 胆大，你敢把黑帮子弟介绍入党！"我跟他说："近平是不是黑帮 子弟，现在还没有结论。况且，考察青年入党，还有一项是重在 个人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好，就可以入党。"书记说："你哪里看 到这一条？ "我说："红头文件有，中央发的。"虽然我把书记说 得哑口无言，但是顶撞得他很不高兴，所以那次也没有批。

我回来把这个情况跟近平一说，近平也在意料之中，他 说："唉，我知

道公社不会批。”我说：“那也不是你的错，公社 不批是不对的，他没理由不批。”

就这样，近平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好多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 庭的原因都没有得到批准，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后来，公社换 了新的书记白光兴，他比较看好近平的能力，公社党委认为不能 因为当时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影响习近平入党，于是将他入党的问 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当时的县委书记也很重视这个问题，经过县

委研究讨论，1974年元月批准了近平入党。近平入党的时候， 正好赶上村领导班子换届，我们村上就召开了党员会，推举习近 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则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采访组：当时习近平那么年轻，又是一名外来的知青， 为什么大家都推举他来当村书记？

梁玉明：因为近平年轻，公道正派，头脑灵活，又肯干， 他在入党之前就已经参与很多村里的事务了。大家相信他肯定能 把我们村里的工作做好。

后来事实也证明，近平当了书记以后，处事公道，工作 扎实，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群众对他非常满意。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 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 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 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 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 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

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 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 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 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 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采访组：习近平当了村支书后在梁家河做了哪些事情？

梁玉明：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 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 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 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 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 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 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的指导 下，我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 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 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 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 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 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 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 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我 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 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 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 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镢头挖出泥土、石块， 再装到筐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 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 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 深，才开始见水，这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 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 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 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三十多米深， 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 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镢头， 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 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 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 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 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着水，把那个土浇起来，冲到山下来， 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水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 样的坝地，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五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 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 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点，方便村里人购 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 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点，还搞 河桥治理，打了五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 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当年离开梁家河上大学的情 况。

梁玉明：1975年，给县上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额，我 们延川县委会议推荐近平去上学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没有任 何人组织，我们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窑洞门口，准 备送他。

近平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近平起 床后，一推开窑洞门，看到大家都来送他，先是吃了一惊，接下 来就非常感动。他说：“我没想到大家这么早都来送我！”村里人 说：“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远，我们肯 定要送你呀！ ”说着说着，有几个婆姨掉下了眼泪。忽然，人群 中有个人喊了一声：“哎呀！你咋来了？”原来，我们村上有一 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双腿行动不便，平时不怎么出门，他拄着 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送近平。近平赶忙走过去拉住他的手，

当时就下泪了。我和近平朝夕相处几年时间，流血流汗，再苦再 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没见他下过泪。这次，是我见过的他唯 --次下泪。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远，他一再让大家回去，大家才依 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别。我们都记得，近平给村里人说：“大家都 回去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最后，我和十多个社员一边走，一边拉话，一直把他送 到县城。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人叫吕能胜，他在县城工作，我们 十几个人就在他

的住处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 就拉话，聊家常，近平就嘱咐我们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 么安排。他跟我们说，要大搞农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 山洪问题、口粮问题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解决……各个方面他都 讲得很细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说留个纪念吧，就你三毛、我五毛 地凑了五块五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我还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着他，把他从延川送到 了延安。谁也不会想到，当年送出去的村支书，现在是咱们党的 总书记。

近平虽然不能经常回来，却没有忘记梁家河，经常写信 回来，询问梁家河的情况，挂念梁家河的乡亲，也给我们讲他自 己的情况，还给我们寄他的照片。我们也都很惦记他，男女老少 都念叨：近平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终于回来了一次。听到风声的人，都赶来了， 见到近平都亲得不行，握手的拉话的，就像是亲人回家一样。

2015年2月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没想到，时 间过得这么快，转眼之间，距离我们送他去上大学已经四十年了。 看着近平挨家挨户地看乡亲们的身影，看着乡亲们围着他拉话的 场景，我想起了四十年前他离开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这么围 着他，拉着他的手。我心里默默地想：四十年过去了，近平这次 回来，实现了他要回来看梁家河父老乡亲的诺言。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之后，与梁家河，与您本人 有哪些联系？

梁玉明：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带我们公社的书记 杨世忠到厦门去找过他一次，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 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 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 示，离的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我说，不好解决，我们就不难 为你了，以后再说吧。近平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当时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了，但是没想到，近平后 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 这个情况，希望他

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 20 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五个村都通了电。

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的时候，我又去找了他一回。那次 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通过 朋友关系，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有九个教室，100多学生。

我到福建去的那一次，跟近平闲谈，我就向他请教，当 时咱们国家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是怎么回事？近平 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有这种想 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 那号人！"

"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上）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2017-01-16 07:14:34分享复制打印

m_8b747684a1ba1a95e492fca6179de6e3.jpg

采访对象：武晖(小名：铁锁），1954年12月出生，梁家 河村民。1971年成为民办教师，1973年进入延安师范学校学习， 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2015年退休。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和他交往比 较多，互相之间也比较熟悉。请您具体谈一谈，最初你们是怎么 认识的？

武晖：北京知青刚到文安驿公社的时候，队里派了一些 壮劳力去接他们到村里来，但是没有派我去。因为那时候我才十 四岁，刚从学校回来，长得又矮又小，咋看都是个小娃娃，算不 上壮劳力。

我家就住在村里的后队，近平他们一共六个知青也被分 配在后队，我家离他们知青窑不到二十米的距离，他们把行李往

窑洞里搬的时候，我就远远地站着看他们。

知青住下之后，我有点时间就跑到他们那里去。这些北 京知青，个子

又高又瘦，穿的戴的比我们这个穷山沟里的小娃娃 好得多，我虽然也上过初中，有一点文化，但是对外面的世界一 无所知，对这些北京“大世界”来的青年充满了好奇，经常小心 翼翼地躲在窑洞门口从门缝里“呲”（陕北方言，偷偷地看)他们 的一举一动，偷听他们说笑，但是不敢进去，更不敢跟他们打招 呼。

有时知青们看到我，就说：“来，小朋友，进来进来！”我也不进去，其实我哪是小朋友，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是习近平， 我只比他小一岁而已。但是因为长得矮小，他们就把我当成小孩 子了。当时我在他们面前确实有点自卑，一个农村孩子，啥也没 见过，也不知道跟他们说啥，不敢搭话。但我还是愿意到他们那 里去，因为我没有地方玩，又不喜欢在家做家务。

北京知青刚来的时候，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他们住在 冰冷的窑洞里，又不会烧炕，我们农村娃娃都会烧，于是知青就 叫我帮他们烧火。这样，我就进了他们的窑洞，跟他们也慢慢熟 悉了。我是个初中生，在当时村里算是高学历了，因为在学校学 的都是普通话，虽然也有口音，但是知青们能听懂，互相之间能 沟通，因此别的社员到窑洞来跟知青说话，我可以在中间给他们 当翻译。

一开始，他们几个知青的名字我都分不清楚，后来慢慢 接触多了，听他们互相之间叫名字，我也就把他们都认识了。他 们也知道了我的小名叫“铁锁”

采访组：北京知青从首都北京来到艰苦的陕北，在生活 方面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

武晖：知青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很难适应。一天二十 四小时，从吃饭、睡觉，到上厕所、洗澡，全都是问题，都不适 应。他们几个大小伙子睡在一个炕上，那个炕不大，六个人将就 能挤下。他们的行李箱子就放在锅台旁边，空间很拥挤，很狭小。

知青没用过柴禾灶，也不会做饭，刚开始是队里派个人 给做饭，做了一段时间，就要他们自己学着做饭，队里就不给做 了。他们要自己砍柴，自己烧火，自己把饭做熟，还要参加队里 的劳动。

打柴对知青来说是个挺大的难题。我们县上就有在山上 砍柴摔坏的知青。陕北的黄土山上，本身就植被稀疏。我们农民 年复一年地砍柴，

近处的、好砍的柴全都被扫荡一空了。好一点 儿的柴禾都在远处和危险的地方长着呢，有些长在崖壁上，有些 长在深沟里，那些地方，羊都吃不到。我们山里长大的孩子就敢 去砍，高的地方我们敢爬上去，砍了柴之后敢跳下来，知青就不 敢。我们村里的孩子，拿着绳子镢头上山去，就能背回来五六十 斤，知青也就能背回来十来斤，还都是那种很细的小灌木或茅草， 填到灶里不耐烧，饭还没熟，柴就烧光了。后来，我就带他们上 山砍柴，领他们到那些柴禾多的地方去。每天都要砍柴、烧火、 做饭，否则就要饿肚子。这就是知青面临的极为现实的问题。

知青刚来的时候，最逗笑的就是挑水。一担水都在五六 十斤以上，知青不会用扁担，不会换肩。他们个子都高，都驼着 背挑水，腰弯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往窑洞赶。有时候走得快了， 水桶来回摇晃，水洒一地，到了窑洞就只剩下半桶水了。见到这 样的情形，社员们都笑他们。

采访组：除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各种不适应，知青每天还 要参加劳动。请您讲一讲，习近平是如何参加艰苦的劳动，并且 逐渐适应农村生活的？

武晖：在当时农村那个环境，包括近平在内的知青，思 想肯定还是有波动的。陕北农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没有电， 农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上山劳动，太阳落山就回 家，成天都在劳动，但是生产效率却很低下，一年到头累死累活， 一亩地却打不了多少粮食。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均衡，整个延 安都没有什么副业，一切就是靠种庄稼。农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贫 困线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饭，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七 八个娃娃，就吃不上饭，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对我们这些山里长大的娃娃来说，从小就在这小山村里 生活，在窑洞里面住，出了窑洞，面对的就是黄土山，一抬头就 只能看到山中间这么一点蓝天，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不觉得有什 么不适应。但是近平他们从北京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小山沟，在 这里过陕北农民的艰苦生活，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在这里 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们社员一样，用挑子挑着羊粪和牛粪往 山上送。知青不习惯爬山，爬得高了，有时候重心不稳，粪就从 粪筐子里洒出来。送粪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种。 苗长出来了，主要的事

就是锄地、追肥。地种不好，秋天就没有 收成，就没有粮食吃，就会饿肚子，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社员和知青们都是一起锄地。一开始他们把草和苗分不 开，我们是当地的娃娃都懂得。我们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就学会 了。别看他们没干过农活，他们有文化，理解能力强，所以学得 确实快。

锄地都是在春夏，天气很热，队长要求大家加紧时间干 活，不让我们休息。我想偷懒，就以解手为借口，跑到沟里，休 息三四分钟、五六分钟，队长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确实受不了 那种苦，又饿又渴又晒，有时候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 就一直坚持，从来没见过他偷懒。

收获的季节，我们一起去割麦子。我们到山上的耕地有 五里地的距离，回来的时候社员和知青都是一人担一担。我们集 体喂的牛和驴，饲养这些牲灵，需要用铡刀把草铡碎了喂给它们 吃，知青不会铡草，不太容易掌握铡刀的技巧，铡刀压到一半就 压不动了，后来慢慢掌握技巧，一刀就可以铡到底。

虽然我是个农村娃，但是因为我年纪小，个子小，力气 小，这些劳动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一开始挣6分工，后来逐 渐提高，但也没挣到过10分工。近平个子高，力气大，干活越 来越熟练。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近平还是一 个比较稳重的普通知青，一开始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劳动。但是经 过一两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壮劳力，基本上每天都 能挣10分工。他不仅在劳动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渐和社员们 在思想、语言上打成一片。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 助。

我往知青窑洞跑得多，身上总穿得破破烂烂的。近平看 我平时穿的破烂，就经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我。王燕生离开梁家 河的时候，留给近平一件灰毛领的蓝色大衣，那件大衣挺好的， 近平很喜欢，平时常穿。我上师范学校的那年冬天特别冷，近平 就把那件大衣送给我了，他对我说："你把这个大衣拿上，到了 学校又能穿又能当被子盖。"到了师范学校，同学们都啧啧称赞： "你这个大衣质量真好！ "这件大衣陪伴了我很多年，我参加工 作之后还在穿。

我去上师范学校的时候，近平还送给我三十斤粮票，让 我出门在外用。在六七十年代，三十斤粮票就是一个壮劳力一个 月的口粮。其实

那时候近平的粮食也不怎么够吃，这些粮票对他 来说也是很宝贵的。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在梁家河期间看书和学习的

事情。

武晖：我喜欢到知青窑洞去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可以看近平带来的很多书。炕沿上，铺盖上，枕头边上，全 都是书。现在回忆起来，近平他们住的那个窑洞特别温暖，也特 别神奇，就像是知识的宝库。

有时候上山干活，近平也在兜里装一本书，中间休息的 时候，大家在拉话，他就拿出一本书来看。晌午回窑洞歇一会儿， 近平也要抓紧时间看一会儿书。我觉得，一方面是近平对读书有 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是读书也带给近平无限的力量。书里有 更广阔的世界，有更丰富的知识，通过学习，人增长了见识，汲 取了知识，就会变得更坚强，更强大。

我家里很穷，从小到大，身上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更 没有钱买书。所以，我很羡慕近平有那么多书，我在他们窑洞里 的时候，很想看看那些书里写的都是什么，一开始不敢多翻，只 是小心翼翼地翻两页。后来熟悉了，我就拿起来翻翻看看。近平 见我对书有兴趣，就跟我说："铁锁，你喜欢看什么书，就拿去 看。"我连忙点头，心里非常高兴。

我最先看的是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对这本书我有特别 浓厚的兴趣。我想，一个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学会了十万个为什 么该有多了不起。书中有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都深深地吸 引着我。我从小生活在山沟里，对外边的世界根本不了解。出家 门最远，我就到过文安驿，连县城都没去过。《十万个为什么》 是有插图的科普读物，我在书上看到飞机，看到汽车，看到轮船， 就高兴得不得了。

我还从近平那里借过物理、化学课本。此外，他那里还 有很多古典文学和历史名著。我看过《三国志》，因为是文言文， 里面的好多字我都不懂，遇到不懂的，我就问他，无论问什么， 近平都很耐心地教给我。我还看过高尔基的《母亲》和肖洛霍夫 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书都是近平从北京带来的，他都借给我 看。

很快，一两年的时间过去了，知青有的返城，有的招工， 有的当兵，大部分都走了。我晚上跑到近平那里去，他还保持着 看书的习惯，只要有时间，他都捧着一本书看，看到很晚才睡。

采访组：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村里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 离开了。习近平是留在梁家河时间最长的知青，并且成为梁家河 的村支书。请您讲一讲，习近平为什么被选为村支书？

武晖：我们社员之间说到近平，无论男女老少，对他的 印象就是，这个人话不多，平时不说是不说，但是一说就能说到 点子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近平当我们梁家河的支部书记， 并不是偶然的，那时候村里没人对此感到意外。

一方面，当时的农村，有文化的人很少，近平又有文化， 说话办事又稳妥，考虑问题周全，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难得的 人才。而且，近平在当支部书记之前就已经参与村里的管理工作， 和村民关系非常融洽，再加上他在赵家河主持过社教工作，农村 的这些生产生活、大事小情，他都已经很有经验了。

可以说，1972年到1973年这两年，是近平人生的一个转 折点。大部分知青都走了，但是近平因为父亲受到政治迫害，就 是走不了。那个时候，近平的思想有很明显的转变。他渐渐意识 到了，他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我虽然1973 年就去上学了，但是只要一回来，我就到近平的窑洞里去拉话。 我记得近平跟我聊过他那时候的想法："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 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 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了这种思想和意识，再加上 近平自己的思考和努力，确实干了好多事情，而且都是实实在在 的事。可以说，近平那个时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开始奠定了， 他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怎么能做好村里的工作，怎 么能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

后来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额，我看近平都没有报名。他 想的是带领村里人一起脱离苦日子，而不是自己一个人离开农村 一走了之。所以，近平当支书以后，给村里做了大量的实事、好 事，其中他带领社员做的很多事情，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发 挥作用。如果近平没有扎根农村的信念，没有为人民办实事的理 想，根本不可能做这么多好事，也不可能在农村待这么久。他后 来上大学，是为了更好地深造，更好地为人民做事情。

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近平有了在农村生活的经验， 对很多农村的问题有深入思考，才有了这么明确的方向，把工作

做得这么扎实。（未完待续)

“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下）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2017-01-20 06:02:55分享复制打印

采访对象：武晖(小名：铁锁），1954年12月出生，梁家 河村民。1971年成为民办教师，1973年进入延安师范学校学习， 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2015年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宾馆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所做的惠民实事有哪 些？

武晖：陕北的良田不足，是在山上种植粮食，广种薄收， 农民做了很多无用功，受了很多苦，但是一年下来粮食还是很有 限。所以打淤地坝非常重要。淤地坝的位置都在山沟里，山水流 下来，淤地坝能把水分保持住，粮食产量自然就高。所以近平当 时非常重视打坝，重视农田基本建设。

近平解决了当时陕北农村老大难的燃料问题。那个时候， 因为植被稀疏，我们陕北农村砍柴难，做饭、取暖、照明都成了 难题。所以近平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开始近平说 想搞沼气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持。近平到四川去学习 沼气技术，回来以后亲自试验，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并点 火成功，这种情况下，对于办沼气就没有社员反对了。说老实话， 农民是最实际的，他看到了，得到实惠了，他才接受。你讲再多 道理，什么前景，什么展望，他们不一定接受。必须身体力行， 给他们做出样子来。从这以后，沼气得到大面积普及，解决了困 扰我们这个地区多年的燃料不足问题。

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作为肥料施在农田里，比一般的粪 肥肥力要大得

多。我们村曾经试验过，专门选一块地方施沼液， 等到庄稼长起来，明显就比施粪肥的庄稼长得茂盛，到收获的时 候，产量也更高。

近平当支书以后，还给村里办了个代销点，这个也是为 了方便社员生活办的。社员想买点日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 皂，要等到逢集的时候跑到文安驿的供销社去，要提前请一天假， 赶着去，赶着回，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有了代销点，村里把农民 需要的东西备齐，农民走几分钟路就能到代销点，买到需要的东 西，后来就越来越灵活了，社员还可以赊账，或者拿鸡蛋去换。

比如一斤煤油，用四五个鸡蛋就能换到。

铁业社也是近平办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会打铁的社员 组织起来，实施定额管理，比如，每个铁匠一天打三把老镢（陕 北方言，镢头），就给他10个工分。超出了三把，就给予奖励， 完不成任务就要扣除相应的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当时延 川各个大队普遍没有副业，没有副业就没有资金。我们铁业社把 那些锄头、老镢、镰刀生产出来，社员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驿 供销社代销。卖了钱之后，扣除成本，剩下的钱就是村里的集体 收入。村里得实惠，还可以给铁匠分成，比如一件工具卖了三块 钱，就可以奖励铁匠一毛、两毛的。整个铁业社的规划、管理、 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从 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农活的劳动强度很大，对于妇女来说就更是极大的负担。 妇女家务繁忙，不仅要上山干活挣工分，在家还要做饭，还要缝 衣服，还要照看娃娃。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 一个比一个大一两岁，一到吃饭的时候坐一排，都抢着吃，照顾 孩子确实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和孩子都睡觉了，妇女还不能 睡觉，拿起衣服，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缝缝补补。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陕北农民生活的事情，他说：“为 啥农村生活苦？为啥妇女那么劳累？有一个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 多了。”我说：“是啊，我们兄弟姊妹七个，都不算多的。”近平 说：“生的孩子多，农民负担就重，妇女的劳累就更多，农村的 年轻人还是应该少生娃娃，把娃娃养好。”可见，那个时候近平 就有了优生优育，减轻妇女负担的思想。

近平看到农村妇女这么辛苦，他就在这方面动了脑子。 他搞的缝纫社主要是为妇女着想。农民衣服磨损得快，妇女白天 干完活，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近平找了我们后队的一 个叫雷琴的妇女，她的缝纫手艺好，专门在缝纫社缝补衣服、做 衣服，其他的妇女就可以上山劳动，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灯下熬夜 缝补衣服了。近平还制定了一个规则：社员可以用工分来支付裁 缝的报酬，比如，一个社员一天的工分是10分，就可以用这个 工分来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5分，做一件下衣用2分。而裁缝 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这样既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又解 决了村里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还给我们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这之前，前队没有 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非常不便，水质也不好。并且， 当时前队有一块地种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仅靠 挑水来浇菜，劳动量太大。近平跟村里研究，就决定在菜地旁边 打一个井。打井的时候，近平亲自下到井里，站在冰水里面挖泥 土和石头。这口井打成以后，同时解决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 的问题，现在村里安了自来水，也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

近平还给村里办了一个磨坊。为啥要搞这个磨坊？那时 候，毛驴是陕北很重要的运输工具，大多时候要运东西，要驮着 粪上山，那时候毛驴很少，经常不够用，社员经常为争毛驴争吵。 如果用毛驴推，从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粮食。近平办的 这个磨坊置办了一套机械设备：柴油机、磨面机、碾米机，几十 斤粮食，一小会儿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费时间，承担了全村的 磨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驴腾出来用于生产和运输。社员只要 把粮食拿过来，一会儿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费的。

近平做了这么多实事，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面临 的难题，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考。他敢于实践，敢想敢干， 也能干会干，能把想法变成现实。

采访组：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特点？

武晖：近平他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实事，同时也 在积极地融入社员当中。他来到梁家河以后，一直就在学习我们 当地的方百，到了后几年，特别是当支书以后，他可以完全用延 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平时，近平对年纪大的人很尊敬，对小孩 很爱护。近平对同龄人也很亲切，对那些表现不积极的社员，甚 至对那些“管制分子”，他也从来没

有吹胡子暖眼，有话都是好 好说，让大家心里都服气。像我们农村人关系好了之后就爱开玩 笑逗乐，难免有些过头的地方，要么起绰号，要么取笑对方。近 平和大家关系都很好，但是他从来不给社员取绰号，也不取笑别 人。大家在心里对他既亲近又敬重。

他这人做事，有决心，有毅力，轻易不说出口，只要说 出口的话，只要认定了的事，他就坚持到底。用我们农村的话来 说，就是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从来不说过头话。近平打 坝、办沼气、办代销点、办铁业社等等，干一件成一件，没有哪 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

近平还能够很坚决地纠正干部的错误。他当支书的时候， 前队有个年轻后生，是队里开拖拉机的，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 但是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较劳累， 而开拖拉机又风光又轻松，他在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还是想接 着开拖拉机。那个年代农村生产，社员本身没什么自主性，关键 就要靠生产队长带头。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在农业生产上 生产队长必须得是行家，还要能吃苦，负责任。所以，遇到好的 生产队长，农民就过得好一点，生产队长不着调，农民就饿肚子。 近平给他讲："你既然被选上了生产队长，就说明村民信任你， 你就得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队长是一个队的带头人，全队的 人都看着你呢!开拖拉机会影响你当队长，也会影响你们这个队 的收成。"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有些转不过来弯，近平就让他 慢慢想，每天早上来汇报一次思想情况，看看他有没有想通。连 续跑了三四个早上之后，他觉得近平作为村支书，又是外地来的 知青，对村里的事情这么操心，受到了感动，自己作为村里人， 更应该努力搞好生产队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 了，踏踏实实地当上了生产队长，安心组织队里的生产，让其他 人去开拖拉机。后来，这个后生的队长当得可好了。

在农村，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候社员在山上劳动， 两个人一言不合，就骂起来了，说打起来就打起来。当时的农村， 十几岁二十岁普遍都有点文化，但是年纪再大些的基本都是文 盲，没有文化修养不行，处理问题很愚蛮，骂仗、打架，司空见 惯。近平对这种情况见得多了，深感农民打架是严重的问题，所 以他当大队书记以后，就制定了村规民约，禁止打架、骂架，在 会上宣布，村民之间不能打架骂仗，否则就要进行处罚。但是， 这种事情又是难免的。我们后队有两个后生，一个叫"猴儿"， 一个叫"矮矮"，两个人平时就有矛盾，后来又

出现了问题，两 个人打了一架，互相都揍了个鼻青脸肿。生产队长处理不了，就 让近平来解决。近平对他们两个的情况也了解，但是规定就是规 定，两个人都罚了 10个工分。近平当时就说："无论有理没理， 你不能打架。有理的不能打，没理的更不能打。"近平要求他们 在社员大会上做检查，他们觉得在大会上做检查有些丢脸面，不 太乐意。近平就问他们："你们接受不接受处罚？禁止打架是咱们 的村规，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到场了，也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果 你们接受不了扣工分，我就把我的工分给你们，但你们必须做检 查。"两个人听近平这么说，都很惭愧："我们打架是我们犯了错 误，按照规定就应该罚分，叫你给我们填上，说不过去。没啥说 的，我们接受处罚。"近平当书记的时候，梁家河打架斗殴的事 情明显减少了。事隔多年，"矮矮"给我讲起这个故事，还在不 停地叹服：近平真是会做思想工作！

农村矛盾多如牛毛，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特别难，一个 人能当好公社书记，未必能当好大队书记。村里的工作要费好多 脑子，想好多问题。农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给他们做 工作，必须让他们思想上能够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么都 好办，农民就佩服你，支持你工作。农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 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农民是非常实 际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只要做到这两条，什 么问题都好处理。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和他有哪些联系？

武晖：近平在正定工作的时候，我是文安驿公社的教育 专干。正定当地派了两个人到梁家河的党支部搞外调，先到了文 安驿公社的办公室，恰巧我也在场。他们不知道梁家河在什么地 方，我是梁家河的人，就给他们指了路。他们到村里问了很多人， 大家无一例外地都对他交口称赞。那两位外调的同志在村里调查 完了之后，就又回到文安驿公社签署意见。这个时候，正巧又碰 上了我。当时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就问他们吃饭了没有，他们说 没吃，我就把他们带到饭馆吃了一顿陕北的铪铬。在吃饭的过程 中，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着聊着，我向他们打听了近平的情况。

我说："习近平在那边干啥呢？"

其中一位同志说："当县委书记呢。"

我说："干得怎么样？"

“近平干得很不错，群众威信很高，每年开三干会(七十 年代每年都要召开的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的时候，开 到中间，很多干部发言很乏味，好多人听得烦了，就走了，还有 些人听得困了，就睡着了。只有习近平讲话的时候，没有人走， 也没有人睡觉。他讲话讲得有意思，很实际，也很有感染力，干 部们都爱听。”

我说：“近平当村支书的时候，他讲话我们村里人也很爱

听。”

另一位同志又向我透露说：“近平的工作作风，跟其他的 干部不一样。很多领导干部，都是由办公室负责安排，提前通知。 近平主持县里的工作，到乡镇和农村检查，从来不提前打招呼， 都是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到了实地，他去看领导在不在，工作做 得怎么样，实地去看，不给对方提前准备的机会。如果他看到什 么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当时就把相关领导叫到现场，督促他拿出 整改方案。”

我听了这两位同志说的话，得知近平工作做得好，在更 大的平台上发挥了他的才干，心里很高兴。

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一个叫张志林的人，跟 我打听近平的情况，说要给他还钱。原来，近平从梁家河走的时 候，村里还没到年终结算。等到年底结算，会计算账的时候，人 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粮钱（陕北方言，给队里交钱），人 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粮钱（陕北方言，队里给现金）。出 粮钱的家庭把钱给会计，会计再把这个钱发给得粮钱的家庭。近 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没有分粮食，就要得粮钱；张志林家里娃娃 多，工分少，要分的粮食多，就要出粮钱。会计为了账面收支的 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粮钱八十元兑给了张志林家里，而张志林 家里应该把这八十元单独交给近平，但是当时张志林家里非常贫 穷，拿不出来这八十元钱，并且近平上学也离开村里了，就这样， 张志林家里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钱给近平，十分过意不去。现在 张志林有钱了，一直想要把这个钱还给近平，他经常念叨，近平 的这个钱救了我们一家人，欠账就得还钱，不然良心上过意不去。 我就劝张志林说：“你现在还给他，他也不会要。他帮助过的人 太多了，你看看咱们村，哪一家他没有帮过?你放心吧，他肯定 不会有想法的。”七十年代的八十块钱可是不小的一笔钱，按购 买力来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八千块钱。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乡亲们热情地招待他，还杀 了一只羊。我们一起吃饭，近平嘱咐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边 听。近平主要说了，山上要治理，河里要打坝，山上要种经济林， 还要种果树，要把地打平，好提高产量，要解决肚子吃饱的问题，

还要解决文化问题.....方方面面的事情，近平都讲了很多。从始

至终，他最关心的始终是基层群众的生活。

就在那次，近平还向我们打听一个叫灵娃的孩子。这个 孩子的事，还要从头说起。1969年，知青到我们梁家河的时候， 我们村有个十几岁的孩子，小名叫灵娃，但是实际上脑子并不灵 光，智力上有先天缺陷，用我们农村的话叫“半憨憨”。灵娃的 父亲是基建队的队长，主要负责带着知青做打坝、修田等农田基 本建设的事，他就经常把灵娃带到地里去。灵娃虽然脑子有问题， 但是干活很踏实，也能吃苦，近平他们这些知青都很喜欢灵娃， 劳动之余很喜欢和他一起玩，谁也没有嫌弃、取笑过他。近平 1993年回来的时候，灵娃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只有灵娃的母亲 带着他度日，家里的光景不行，生活很艰难。近平为了接济这家 人的生活，当时就给灵娃的母亲留了 500块钱。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又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他到 家家户户都看了看，用延川话和乡亲们交谈，就像回到了久别的 家中，特别亲切。

“近平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2017-01-23 08:06:50分享复制打印

1969年1月，15名北京知青来到梁家河，其中包括习近 平在内的6名知青分在二队。这6名知青，最初全都挤到张青远 和刘金莲夫妇家的一孔窑洞里，在一个铺炕上睡觉。不到一年， 他们又搬到吕侯生家的窑洞里住。后来搬进了新挖的知青窑洞。 一开始，队里派人专门给知青们做饭，灶房设在张卫庞家的窑洞 里。离开梁家河前，北京知青只剩下习近平一人，他又在张卫庞 家搭了将近一年的伙。

这一组访谈，通过张卫庞和两位房东吕侯生、刘金莲的 讲述，我们可

以走进当年，看看习近平是如何与梁家河村民融合 在一起的，他又是怎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采访对象：梁家河村民张卫庞、吕侯生、刘金莲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第一次2016年2月27日，第二次2016年12

月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刘金莲 家

QQ 截图 20170123103935.jpg

“再糙的饭近平也吃得香，再穷的人近平也看得起”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您和他在一 个生产队，平时吃饭、劳动都在一起，请您讲讲您和习近平交往 的事情。

张卫庞：近平到梁家河来，比我到梁家河还早一个多月。 我之前是马家河乡庞家河村的，1969年2月，我成了梁家河的 上门女婿，就到梁家河村来了，见到了已经在梁家河下乡一个多 月的近平。

我当时来的时候，近平他们二队知青一共六个人，都住 在刘金莲家的一孔窑洞里；我也是二队的，他们做饭的灶房设在 我家一孔窑洞里，队里派了人来专门给他们生火做饭，所以我们 每天都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打交道挺多的。

我的老丈人叫张贵林，他是老共产党员，也是梁家河的 老书记，从1935年到1960年一直都是梁家河的村支书，经过的 事情多，在这个村里有威望。近平经常来我们家，找我老丈人聊 天。

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接触多了，我们就熟悉了，彼此交 流也就多了，关系越来越好。我没事就跑到近平的窑洞串门，找 他拉话。我最爱听近平讲故事，我是个大老粗，啥都不懂，也没 看过啥书，就会暖着眼睛听他讲，一听就是大半晌，当时就觉得 他讲的故事太有意思啦!现在我还记得他讲过《红楼梦》等等。 有时候听的时间长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近平就做下饭（陕北方 言，做好饭），让我跟他一起吃。

采访组：习近平在您家里住过吗？

张卫庞：没有。他在我们梁家河总共住过三个地方，第 一个地方是刘金莲家，第二个地方是吕侯生家，第三个地方是村 里的知青窑洞。近平两次搬窑洞的时候，我都过去帮忙了。搬窑 洞的时候，才知道他的书可真多！

近平当我们村的支书时，村里的知青都走光了，就剩下 他一个人了。他每天既要忙村里的事情，又要参加队里的劳动， 根本顾不过来做饭、刷碗，就对我说："我到你家里去吃饭，你 看咋样？"我说："行嘛！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家人口多嘛！"近平主 动提出到我家来吃饭，我当然欢迎了，可心里又有些担心，我家 里当时一共六口人：一个老人，我们夫妻两人，还有三个娃娃，

我怕家里人多吵闹得厉害，怕近平吃不好饭。

近平把他每个月分的40斤粮都交到我家。在我们家吃饭 的时候，我婆姨做什么，他就跟我们一起吃什么。他这个人就是 这样——再糙的饭他也吃得香，再穷的人他也看得起。

就这样，近平在我家里吃了将近一年的饭，一直到他上 大学离开梁家河。

说起来，近平在我家，还调解过我家里的矛盾。

有一次，我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婆姨吵起来了。那次，我 脾气很大，我婆姨也上来了倔劲儿。我俩闹得不可开交，谁也不 服谁，谁也不给谁台阶下，咋也弄不好。这一气儿，我们就别扭 了好几天。

我和我婆姨虽然没当着近平的面吵过，但是他经常在我 家吃饭，看到我们别别扭扭的，话也不说一句，互相之间瞅见对 方都歪脖子暖眼的，近平自然就有所察觉。

他就问我："卫庞，你跟你婆姨闹啥咧？"

我含含糊糊地说："没闹啥……"

近平说："我也不打听具体啥事了。反正你们谁对就是谁 对，谁错就是谁错，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你们不用较劲，该 讲道理讲道理。反正，卫庞你这人有挺多毛病，你该改的毛病你 就要改。你婆姨这人可

是相当不错，干净、利索、勤快，把家务 活儿干得这么好，把家里人照顾得这么好，让你可是省了不少心， 你还跟她吵，这可不行。”

我点点头说：“近平，你说的对，我应该跟她讲和。” 近平说：“讲和行！你主动找她拉拉话，没啥不好解决的。” 我们农村，不像城市里，城里人文明程度高，男人“怕” 老婆，其实那不是怕，是平等，是尊重。但是乡下就不一样，特 别是过去的农村，大男子主义盛行，男的不仅不会让着婆姨，还 总是对婆姨盛气凌人，呼来唤去的，打自己婆姨也是常有的事儿。 本来我琢磨着，我一个大男人，在家里一直是我婆姨她先服软。 可是这回，近平既然找我谈了，我就想：“我俩与其这么僵着、 等着，不如我先放下面子，跟她妥协吧！ ”于是，我找了个机会， 跟我婆姨说话，我婆姨挺聪明，见台阶就下，她也就理我了。我 跟她谈了谈，把话说开了，矛盾就解决了，事情也就过去了。其 实，根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近平说的“没啥不好解决的”， 而且近平也提醒我要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比如脾气不好，比如 爱喝酒。我以后对这些方面更加注意，家庭关系一直很和谐，以 后再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采访组：你们每天都吃什么饭？

张卫庞：每天早上就是做团子，团子是用玉米面和糠做 的。下午就是面，有时候是豆子面，有时候是高粱面。麦子面七

八天才能吃一回，当时就是缺少这东西嘛。

采访组：吃饭的时候有菜吗？

张卫庞：有酸菜嘛，近平那次回来后就说，很久不吃梁 家河的酸菜还很想吃呢。

采访组：酸菜是用什么做的？

张卫庞：就是白菜和黄萝卜，切碎之后腌上它，酸的嘛。 采访组：是一年到头都能吃到酸菜吗？还是有的时候才能

吃上？

张卫庞：酸菜基本能吃半年，从9月份开始一直到第二 年的三四月份都

没有新鲜蔬菜，就吃酸菜嘛。等有新鲜蔬菜的时 候就不吃酸菜了。

采访组：当时能吃到什么蔬菜啊？

张卫庞：就是黄瓜呀，洋柿子（陕北方言，西红柿），茄 子，辣子，都是个人种的，不掏钱。

采访组：当时炒菜有油吗？

张卫庞：那时候油太少了，基本上就没啥油，就把山上 的杏摘下来，把杏核砸开，再把里头的杏仁压碎，锅烧热后倒进 去炒一下，就算有点儿油，炒菜就用这东西。

米访组：您后来和习近平还有联系吗？

张卫庞：近平走的时候，送给我两条棉被，两件大衣， 还有一个针线包。这个针线包是近平来插队时，他妈妈给他做的， 上面绣着三个字“娘的心”。在那个年代，没有钱买新衣服，身 上的衣服都是缝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针线包可以装一些针线用 品，是必不可少的。可不像现在，新衣服都穿不完，没有谁还穿 有补丁的衣服。

近平给我的棉被和大衣，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我都 用旧了。唯独那个针线包，我一直珍藏着。我是个庄家汉，粗枝 大叶，也不懂啥大道理，就觉得近平是我的亲人，就想存着这个 针线包，留个念想。这个针线包，我保存了 38年，直到2013年 才捐给了县里，交给国家保管。

近平走了以后，我们家都说你给近平写个信，我说我没 事我不写，不要去打扰人家。我就是这个想法。

1993年近平回梁家河的时候，我终于见了他一面。当时 我在山上种麦子呢，听说近平回来了，就赶紧从山上跑回来了。 跑到山后腰的时候，正好碰见了近平。近平见了我，也不嫌弃我 一身泥巴，一把就拽住我问长问短，我激动得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他还给家家户户都带了报时钟、紫菜、茶叶，临走的时候给我撂 下了名片，让我有困难就去找他。

2015年2月他回梁家河的时候，我和村里十来个人到村 口等，看见他下

车，我就跑了过去。隔了这么多年，他一下子认 出了我，还像原来那样拍我的肩膀，叫我的名字，问我生活条件 咋样，吃些什么，有多少娃娃。我就说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不是 大米就是白面，肉不断，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

紧接着，近平问我："卫庞，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主要做

什么？"

我说："近平，我现在生活还不错。我有五亩坝地，种点 粮食和蔬菜，自己吃。我还有十亩果园，现在收入全都靠这个果 园。"

近平问："你这果园能挣多少钱？"

我说："都是小树，去年是第一年挂果，卖了两万四千块

钱。"

近平说："你这一年投入的成本是多少？"

我说："很多管理都是镇上免费帮助搞的。除此之外，我 自己投入的农药、化肥、除草剂、人工工资等成本是一万二。" 近平说："刚挂果就有一倍的利润，还不错。"

我说："是。明年会更好，成本不会再增加多少，但是销 量会翻一倍，再过几年到了盛果期，收入就会更高。"

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哎呀，卫庞，那你发了吧？走， 领我到你果园去看看！"

我说："好！"

近平是2015年春节前来的，现在是2016年了，当时我 跟他说的"成本基本不增加，销量翻一倍"已经实现了。2015 年我投入的成本是一万四千块钱，收入是五万多块钱。

过去，近平当我们村支书，我们有干劲，有奔头;现在， 近平当全国人民的主席，当全党的总书记，我们更有拼劲，更敢 闯了。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种果树，还在搞"苹果合作 社"。近平在拼搏，我们也

在拼搏，大家都努力嘛，咱们这国家 肯定越来越富强。

QQ 截图 20170123104128.jpg “近平给我治腿病”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曾在您家里住过 很长时间。请您讲讲您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形。

吕侯生：近平来我们村插队的时候，分在二队。我们这 山沟沟非常闭塞，突然来了知青，大家都觉得新鲜，都过去看看。 刚开始，他们说话，我们都听不太懂；我们说话，他们也听不太 懂。后来，一起劳动，就慢慢熟悉起来了。

近平他们从刘金莲家里搬到我家来住了一段时间。我母 亲去世早，就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家里有富余的窑洞，他们搬过 来住之后，我和近平他们朝夕相处，就更熟悉了。

采访组：在一起住的时候，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吕侯生：近平特别爱看书，他的炕上都是书，一得空闲， 就捧着书看，干了一天活，累得不行，他还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 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

有一次，近平晚上看书到很晚，我就在旁边一边抽烟一 边陪着他。结果看到半夜，近平肚子饿了，当时也没啥吃的，我 们俩就煮玉米吃，把一碗玉米倒进锅里，煮了半晌，以为熟了， 其实还是夹生的，我们就把这碗半生不熟的玉米给吃了。

我是1955年生人，那时候14岁，比近平小2岁。因为 我没上过几天学，不识字，年纪又小，没啥见识。我心里就想， 近平拿这么多书，死沉死沉的，也不能蒸着吃，也不能煮着吃， 成天看这些书，有啥用呢？

乡亲们都知道近平看书多，肚子里的墨水多，就经常到 他住的窑洞来，跟他拉话，让他给我们这些村里人侃大山。近平 给我们讲北京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名胜古迹。我们原先都是从那 些宣传画上看到过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颐和 园，等等。听他一讲，我们印象就更深刻了，还知道了很多宣传 画上没有的地方。

我们问近平，北京的汽车多不多？近平说，北京汽车挺多 的，不但小

轿车多，吉普车、大卡车、面包车也多，还有那种大 公共汽车，定点停靠，买票上车，车上能乘坐几十个人。当时， 我们村里人到过县城的都很少，见过大客车的更是寥寥无几，听 了近平的描述都很吃惊。

近平还跟我们说，咱们国家还不是发达国家，首都北京 的汽车还不算多。有的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路上全都是汽车，因 为车太多，堵得都走不动。我们当时听到近平这样说，简直像做 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外面的世界竟然是这样的。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您和他还有什么联系 吗？

吕侯生：1993年，近平已经到福建工作多年了，他抽空 回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我与他见上面了，他还给我留了 一张名片。

1994年，我修窑洞的时候，被窑洞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 头砸了右腿，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右腿后来就患上了骨髓炎。等 到病情严重，我才到医院去治疗，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是没有治 好。

那时我修窑洞，本来手头就很不宽裕，这治病又花光了 我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很多外债。而且，因为病没治好，腿的病 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来到了严重的时候，走路已经不能受力了， 需要拄拐。

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再不治疗，恐怕就活不久了， 我的妻子儿女可咋办呀？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给 他写了 一封信。让我没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给我寄来了 500块 钱的路费，让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这个汇款啊，心里特别感 动，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是第一次离开梁家河，第一次出这么 远的门，从延安坐火车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见到了近平， 近平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这心里顿时真是百感交集。这次， 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联系医院帮我治疗。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 下基层，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到医院来看 望我。

有时候，我心里觉得不安，我问起他医疗费的事，近平 对我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我都愿意。”其实我心里清楚， 九十年代初，咱们国家普遍工资都挺低，近平的工资也并不高， 他没有多少积蓄。给我看病花的这些医疗费，大多都是彭丽媛老 师的钱。

我在福建治疗，腿当时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但是 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钱，大概有几万块吧，我当时也无力还给 他，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的，我只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过了几年，没想到病情又复发了，

这次更为严重，腿保不住了。1999年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 肢手术，近平知道这个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转 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那时我已经用上 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精神很 好。近平见到我，非常关心地俯下身体，看我的假肢，还用手反 复摸，好像是看看这假肢的质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兴地对 我说："侯生，你的大难过去了，咱们一起合影留个纪念吧！"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儿女也都长大了，他们现在都到外 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说："我的 这条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2015年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时候，还到我家里坐了 一会儿。当时他一进到这间熟悉的窑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很自然地坐在炕边。我也坐在炕边，跟近平拉话，拉这农村的变 化，拉现在的生活。曾经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 是黑的近平，最关心的永远都是大家过得怎么样，吃的、穿的、 住的条件如何。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

QQ 截图 20170123103944.jpg

"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采访组：您好！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您家窑洞门口 的窗台上摆着几双布鞋和鞋垫，做得很好啊。那是您自己做的吗?

刘金莲：对，那都是我做的，谈不上做得多好看，但是 肯定结实，耐用。去年(指2015年)春节前，近平回来，我还送 给他两双布鞋，几副鞋垫，都是我亲手做的。他年轻的时候，在 我们梁家河上山受苦（陕北方言，泛指下力气干农活、体力活）， 和我们农民一样，都是穿这种布鞋，鞋穿坏了，我就给他做新鞋 穿。那时候他和几个北京知青，就住在我家靠南边的一孔窑洞里。 当时我也年轻，做的鞋也算不上好，

我做完了，近平就拿着穿上， 一点儿也不挑。我不光是给近平做过鞋，这边住的几个北京知青， 我都给做过。

采访组：那几孔窑洞，您现在还住吗？

刘金莲：我现在不住了。前年(指2014年)腊月十八，我 就搬到上面（指她家院子里，地势略高的一孔窑洞）来了。那几孔 窑洞，是几十年前打的老土窑，现在潮的不行，我年纪大了，耐 不住，就搬到上面来住了，这里强一点，不潮湿，光线也好。

那几孔窑洞现在没人住了。不过，2015年1月13号，几 个当年的北京知青戴明、王燕生、杨京生等回来看我，看梁家河 的乡亲们，又在那里住了一宿。我跟他们拉着话，一转眼就到下 午了。我说："你们今天还走啥嘛。在我家住下吧。"他们说："好 啊，我们就还住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铺位，找找当年的感觉。" 他们都是在北京住大高楼的人，现在住这个又潮又冷的小土窑， 却非常高兴。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按他们的话说："这个纪念意 义，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住下以后，我给他们拎一壶热水过去， 还跟他们拉了几句。他们中间有个铺位空着，我就说："这个是 近平的铺位，你们还记得吧？"他们说："当然记得了！ 近平现在 可忙了，也不知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来看看。"

说来也巧，这几个北京知青走了整整一个月以后，2月 13号，近平就来了。近平也把我家记得清清楚楚，我去迎接他 到我家来，他一跨进院门，看见熟悉的那几孔窑洞，就指着最靠 外边的那孔说："我刚到梁家河时，就住这间。"然后，他又指着 另外两孔窑洞对我说："你达（陕北方言，指父亲)你妈住这间， 你们两口子住那间。"我说："对呀，这么多年你都没忘。"近平 说："那咋能忘。你们两口子新婚那年，我们这些知青还来闹过 洞房呢。"

采访组：您结婚大概是什么时候？

刘金莲：就是近平他们到梁家河来的两三个月以后。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这些北京的娃娃第一次见到我们 农村办喜事。他们都是年轻人，喜欢热闹，当天他们就来闹洞房 了。不光是二队的这六个知青，一队的北京知青也来了，还有村 里人，人可多了，特别热闹。

我结婚之后，北京知青还是住在我们家。近平这人性格 非常好，对人慈平（陕北方言，意为待人亲切，随和），他说话也 亲切，跟我和我老伴儿关系都很好。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 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 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 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 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 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 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 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 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歇歇。"近平 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 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 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 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 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 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 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采访组：习近平在您家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您对他的 印象是什么？

刘金莲：近平和我们相处得可好了！他管我妈叫"干妈"， 我妈特别喜欢他，觉得这后生知书达理，有文化，家里有啥好吃 的都想着"给近平端去点儿"。

我们有了娃娃之后，知青就不在我家住了。有空的时候， 近平就来我家里转转，看看我家里的老人，抱抱我家里的娃娃。

平时，近平很喜欢小孩，也经常带我家的娃娃一起玩， 我家的几个娃

娃都跟他感情非常好，成天跟着他玩。1975年， 近平走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六岁了，娃娃不懂事，一直哭，拉着 近平的衣服，不让他走。

采访组：习近平后来两次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您 都和他见面了吗？

刘金莲：都见上面了。1993年，近平回来一次。那时候 我老伴儿还在世，他们两个人见面，都很激动。我老伴儿和他拉 话的时候说："近平，你回来了，怎么不把你家里的（陕北方言， 意为妻子）带回来？"近平说："她这次有事误下了，下次我把她 带回来。"

2015年，近平回梁家河来，彭丽媛老师和他一起来的， 近平跟乡亲们介绍说："这就是我婆姨（陕北方言，意为妻子）。" 当时正好是春节前夕，近平给乡亲们采办了很多年货。 给我家里带来了面粉、油、十几斤肉，还有一副春联。

近平到我家来的时候，和我拉话。他说"你住在哪儿了？" 我说："我现在住在上面这个窑洞了。我老伴已经去世

了。"

近平听说我老伴去世了，心里很难过，他说："是得啥病

走的？"

我说："是得了哮喘病，肺气肿。"

近平叹了口气，说："唉，也不是很严重的病，怎么没治

好呢？"

我说："当时家里经济困难，儿子结婚，还有很多事情， 家里没有钱了。我当时也没给你打招呼，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说："你现在生活咋样？"

我说："我现在生活可好了。吃的，穿的，用的，啥都够， 我身体也挺好。"

这时候，我给近平介绍我的大女儿，就是当初拉着近平 衣服，不让他

走的娃娃。

我说：“这就是彩云，你看现在是不是长大了？”

近平看到她，高兴地笑着说：“哎呀!你可真是长大了！”临走之前，近平跟我握手。他说：“等我有空，有时间， 还会来看你们的。”

我说：“好啊，近平，有空就常回来。”

“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等 2017-02-10 08:04:57分享复制打印

QQ 截图 20170210094815.jpg

采访对象：黑荫贵，生于1948年，北京汇文中学学生。 1969年1月与习近平同一批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分配在关庄 公社关庄大队。1973年抽调为拓家川公社团委书记，后供职于 陕西渭南供电局，1989年调回北京工作，2008年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办沼气是习近平当年在梁家河为村民办的一件 大实事。您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去四川学习办沼气，请谈谈你们当 时去四川学习的情况。

黑荫贵：好的。我是1968年12月份转的北京户口，1969

年1月17号人到的延川县。当时我和习近平是在同一趟知青专 列上，但插队好几年，见面认识是一块儿去四川学习办沼气，在 这之前只知道他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但没见过面。

我们北京知青到延川县大概1400多人，从1970年开始 国家就陆陆续续安置了一部分知青就业，家庭比较困难的工农子 弟主要在当地服务行业就业。1970年有一批国家三线工厂招了 一部分，后来征兵又走了 一部分。到了 1972年11到12月份， 百分之八九十的知青离开了农村，很多人安排了工作，基本上都 在陕西，比如航空工业部汉中012系统的一些工厂，还有海虹轴 承厂、供电局、宝鸡自动化铁路，等等。剩下没

走的，一部分像 我们这40多个北京知青被当地县委安排做了干部。剩下没走成 的这一部分，大多是由于家庭出身或政治问题，比如父母还没有 解放，或者父母有一些历史问题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就属于 这种情况。这一类没走的不太多，大概一个队两三人、三四人， 很少了。

我是1973年初被安排在拓家山公社做干部的，一开始是 当文书，两三个月后安排我当了团委书记，前后大概待了两年时 间。那年正赶上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到延安参观视察，他 看到陕北情况时流了泪，说：没想到全国解放这么多年了，陕北 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于是就让北京市从各方面对延安进行支 援，提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目标。总理提出的 这个目标，当时在陕北震动非常大，大家憋着一股劲要解决陕北 穷困落后的面貌和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的状况。在这个背景下，我 们延川县一部分干部就提出要到农村去包队，我也提出到我原来 插队的地方去包队，这样就从拓家山公社回到了我插队的官庄公 社官庄大队。1971年初，北京市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给延安派了 一批干部，一是帮助延安建设，二是帮助知青解决生活困难。延 川县来了一个老干部，是海淀区的，叫张之森，到延川担任县委 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到四川学习办沼气，是习近平提出、张 之森大力支持的结果。

原来，1974年1月8日《人民日报》介绍了四川推广沼 气的报道后，引起习近平的关注和兴趣，他产生了到四川学习办 沼气、解决当地缺煤缺柴问题的想法。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张之 森，没想到张之森也有这个考虑，两人不谋而合。老张把去四川 学习办沼气的事向延川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很重视，县委书记申 易决定抽调三个公社的六个同志去。三个公社就是文安驿公社、 城关公社、官庄公社。官庄公社由我带着我们队一个石匠。文安 驿是习近平带他们队一个农民，那会儿习近平已经是大队书记 了。城关公社也是一个干部、一个工人。再加上张之森，我们七 个人组成了延川县学习沼气的代表团，到四川去学习经验。（据 了解，看到《人民日报》报道后不久，习近平与北京驻延川干部 柏根柱等三人一起到四川遂宁等地学办沼气，回梁家河后在知青 窑旁边挖池子，建成后产出沼气。县里组织七人去四川，应是习 近平第二次入川深入学习沼气，之后有延川大办沼气。）

-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和习近平一起去四川学习的经历。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和习近平一起去四川学习的经历。

黑荫贵：大概是1974年12月份，我们七个人从延安坐 汽车到了铜川，再从铜川坐火车去成都。因为要到四川去学习怎 么办沼气，所以在火车上大家都特别兴奋，期盼之情非常强烈。 这期盼源自什么呢？虽然陕北产煤产油，但是老百姓买不起，还 用煤油灯，有的老百姓甚至连煤油灯的煤油都买不起。四川人民 用上沼气以后，农村解决了烧柴问题、做饭问题、点灯问题，甚 至解决了用沼气发电问题。这些都是陕北最需要的，也是我们在 那儿插队以后感到最需要解决的。习近平又是大队书记，这些问 题也正是他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要解决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困 难，首先就要从这些问题着手，所以大家一路上讨论的特别热烈。

到了成都以后，我们自己找了旅社住下，然后才跟四川 省沼气办打招呼，结果省沼气办就急了。当时四川省里的领导以 及各级领导，不少是从山西南下的干部，他们一听说革命圣地延 安来人，立即安排换到省招待所，并接见了我们，提起习仲勋同 志，更是非常有感情。接见后安排省沼气办给我们派了两辆吉普 车，派了两个同志陪我们学习考察，说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 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是省沼气办的责任。后来我们到各个地区、 各个县观摩考察的时候，他们的一把手都会跟着我们，一路的安 排都非常详细认真。

省沼气办刚开始接待我们时，已经把全国各地来学习办 沼气当作一种惯例了，来了就带着我们去看看、转转，尝尝这儿 的好吃的，住在县上招待所。因为省委提出让我们都看到、都学 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而且带我们去的干部看到我们认真学 习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也有很多转变。当时我们确实是每见一个 沼气池必下去，到每一个地方必问得非常清楚，而且要参观各种 情况的沼气池，有石头做的，有土挖的，有砖做的，有土挖以后 再用水泥抹的，有用石板砌的，还有在什么样的土质上建什么样 的沼气池、怎么建，入料口、出料口以及密封口怎么做，这些东 西我们都学的非常具体。

由于四川各地沼气池建设情况不一样，我们走了 5个地 区17个县，差不多40多天的样子。有的地方的条件是陕北不具 备的，但也有很多条件跟陕北相似的，对这些我们都考察得非常 仔细。比较相似的条件，比如有很多红色的黏土，黏度非常大， 脚踩上去都是黏的，含沙量也不大，挖完沼气池以后稍微涂一点 石灰砂浆就可以用了，也不漏。有些

含沙量比较大，就要抹石灰， 用带沙子的那种石灰包括三合土去抹。当然陕西还有一些与四川 不同的情况，比如土质没有四川那么大的抗劲儿，你就得用砖砌， 用石板的话还要“溜缝儿”当时习近平跟我们经常探讨，提出 我们要学习的关键是如何保证沼气池不漏水，要能承受一定立方 水的压力，而且要一次试水成功。因为要是水进去了，再想弄出 来就费劲了，一漏就等于报废了，所以就不能漏。这也是我们学 习的重点。

四川的沼气池是从5立方、3立方开始建的。一个5立方 的就能解决三口之家的做饭点灯问题;更大一点的一般都建7、8 立方的，一般家庭干什么都能满足了。四川还有集体建的100多 立方的大池子，能发电，还可以把所有的沼气池串联起来，发的 电可以共用。四川还有很多发明，比如塑料小开关、塑料管、沼 气池的水压显示器，还有一些灶具、灯具，都是人工做的，对我 们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天学习之后，张之森都会组织我们一起讨 论，交流学到什么了，还想听什么，还想再看什么，哪些问题还 没有解决，等等。当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怎么保证不漏水， 再一个就是四川农民制作的东西我们回去能不能制作。再就是沼 气池每一步怎么挖，人下去挖有没有危险，怎么能保证不出问题， 挖的时候有多大的弧度，口留多大，出料口和进料口的角度怎么 设计？出料口要留在沼气池的上部，进料口要尽量贴在内池的下 部，口怎么去密封？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我们这些知青既没干过 建筑活儿，也没当过泥瓦匠，所以我们去学的时候都特别认真， 尽量作了详细的记录。至于更细致的一些技术活，我们就让同我 们一起去的石匠们亲自动手去做一做，以便回去后可以操作。

采访组：习近平在考察期间都学习了什么东西？

黑荫贵：习近平那时年龄很小，但是很稳重，做事情很 认真，是个实实在在想问题、爱思考的人，话语很少，比较内秀， 没有一些干部子弟那种张扬。我和他是在延川县集合要出发了才 第一次见面，互相一介绍你是知青我也是知青，就这么认识了。 在陕北插队的知青，不管你是干部子弟还是平民百姓家的孩子， 没什么区别，大家地位是一样的，都是受苦的农民。

我们到四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我和习 近平住一间房。那个时候我年龄比他大一些，我们住在一起，两 个人都抽烟，成为了烟友。

采访组：在四川学习的时候有哪些事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黑荫贵：那次学习确实有很多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首 先，我们在四川无论走到哪儿，到处都写着“热烈欢迎老区人民 来四川考察指导我省沼气工作”的横幅。这些话让我们非常感动。 一方面，四川人民把我们称为老区人民，延安圣地的人，这是给 我们很高的荣誉;另一方面，人家说我们来指导，那是谦虚、是 客气，实际上我们是来学习的。这就让我们更加感到这次学习的 使命和责任重大，不同于一般的参观访问，因此每个人的学习态 度都很端正、很认真。我们学习参观结束最后总结的时候，提出 来回去后要跟县里汇报，第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班子，第二 要把四川的师傅想办法请过去，第三他们的灶具我们能带的尽量 带着，而且回去后要在我们这三个大队做试点，力争三个月全村 实现沼气化。

印象深的再就是途中曾经遇到过危险。那是我们参观完 大邑县，在回成都的路上，下起了大雨，我们的车要从山区进入 成都平原，由于山路陡峭，途中遇到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车子 打滑一下子撞在山边上，我们当时都在车上，万一再刹不住就掉 进悬崖了，特别危险，大家全都吓坏了。

还有，我们去的有些县是血吸虫病比较严重的地方，那 儿的水污染严重。我们到乡下去学习办沼气，要趟河沟，要踩水， 很容易传染到血吸虫病。但是近平、我们都没在意，就是想着一 定要完成好这次学习任务。到了县招待所，人家专门准备干净的 水让我们洗脸，说你们北方来的，抵抗力比他们当地人差，怕我 们传染上。

我们就是这样去学习的。四川省沼气办的人认为，你们 这些老区人真能吃苦，我们还没有接待过你们这样的参观团。以 前那些团就是看一看就完了，走马观花似的，而你们一待就是 40多天，要求参观各式各样的，各种条件下的沼气池怎么建的 都要看到，各种类别的都要学到，你们这是真学。我们这种学习 精神让他们非常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每看到一个沼气 池，不只是外边看看、拿手电照照里面就完了，而且都要搭上梯 子下去的，下到里面去看，真的是很认真的。

那次学习，还有一个小插曲。四川德阳县是我们计划参 观的一个重点，那里有一个机械厂，把柴油机改造以后，不用柴 油而是直接用沼气带动柴油机，发动柴油机以后带动电动机发 电。我们到了他们那

儿，他们的技术员外出学习了，几天后才能 回来。于是我和习近平两个就跟张之森建议，请他们先回去，我 们俩再等两天，到德阳把东西拿上以后就回来。老张同意了。在 工厂等人期间，我俩去了一趟都江堰、峨眉山。有人可能会说是 不是拿公款旅游？实际上我们完全是用自己的钱去的，回去报销 也只报销从成都到陕北的火车票和在德阳办事的住宿费。我们在 峨眉山是住在山上，也没花什么钱。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去峨眉山、都江堰，包括二郎庙的时 候，我发现习近平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那里门上的对联，不 管是峨眉山寺庙里的，还是青城山的，他几乎都很认真地抄写下 来，然后细细品味。我们在峨眉山上住了三夜，还见到了大学生 毕业来当尼姑的，近平还和她们聊，你们为什么不上学而来当尼 姑？原来有的是厌世了，有的是家里逼婚，还有的是想通过这个 考一个宗教学院，也是一个出路。在寺庙借住的时候，我们还遇 到一些僧人，近平也和他们聊：你们在这儿守着这个寺庙怎么解 决生活问题?你们每天想的是什么？等等。

峨眉山海拔3100多米，整个儿上山就没见几个人，就我 们两个爬山。刚开始下雨，后来下雪、下冰雹，路就那么窄，哪 有现在这么宽，我们是揪着树枝和树叶子向上爬，用了两天才爬 上去。在山上除了住寺庙，我们就住在天文站，给人家10块钱， 吃人家一碗米饭，炒上个菜，真是很贵的。我们还看了日出，还 看到所谓“佛光”。峨眉山是佛教圣地，峨眉山普贤菩萨所讲的 佛学思想，就是知和行。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很多东西，他的很多 讲话，也强调知行合一。首先是知，知就是个人的社会实践和体 验，你知透了、知明白了，你才知道该怎么做，要做到什么程度， 怎么做才能达到目标。他的治国理念中，知和行是贯穿始终的。

我讲这些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近平老早就是一 个爱学习、爱思考的人，从他见了好对联就抄下来、遇到新鲜事 就刨根问底，再联系他插队期间如饥似渴地坚持读书学习，都说 明近平是一个崇学尚读的人，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采访组：从峨眉山回来后你们是不是又回到了德阳？

黑荫贵：是的。我们见到德阳那个工厂的技术员之后， 他给了我们一张图纸，介绍了柴油机内燃室扩大的一种方式。当 然，柴油机燃烧室扩大到多大合适，他也没有讲得太具体，只是 告诉我们扩太大不行，扩太小也不合适，因为就那么小一个空间， 沼气池的燃点和柴油燃点

各方面都有很多问题。从四川回来以 后，我们经过反复实践，最后还是成功了。

采访组：你们从四川回来以后就开始办沼气了吗？

黑荫贵：回来以后，县里成立了延川县沼气办公室，张 之森任沼气办公室主任，我们不属于沼气办的成员，但我们所在 的村县里设为了沼气试点村，一共有三个，包括梁家河村、官庄 村、城关村。我们村先修了三个沼气池，都是土池子刷灰浆的， 点火成功了。习近平他们村也做了几个。

采访组：您在修沼气池的时候碰到过什么事？

黑荫贵：我们在试验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并不太大，因为 陕北老百姓有打窑洞的经验，也有做蓄水池的经验。我们选择土 壤最好、土质最好的地方去做，第一个沼气池做的很小，也就3 一5立方米，所以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而且我们是按图纸去做， 确保沼气池不漏，多刷点浆，多抹点灰，水泥标号高一点，沙子 少一点，细一点，就可以了。陕北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用小 镢刮，刮得很光滑，就像他们的窑洞不是抹出来的，而是刮出来 的一样。过了 20多天，终于有一口沼气池点火成功了，引起很 大轰动。因为过去老百姓根本不相信，说沼气怎么可以做饭，还 能点灯?认为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刚开始建的沼气池 特别小，只能见到小的火力，产气量不大。产气量不大的原因是 温度问题，清绦叶子太少了。那时候刚开春，没有那么多叶子， 我们只得弄老玉米秆，当然产生的气就差一些。即便这样，我们 最终还是成功了。

县里领导看过之后，就提出全县大办沼气100天，要求 我们这三个村要实现沼气化，80%的农户都能用上沼气。当时老 百姓积极性都很高，因为他们真真切切看到沼气的作用了，而且 在自己家就可以弄。县里又拿出政策解决水泥问题、白灰问题、 沙子问题。全县那些条件比较好的村还派来大量工人帮着一起建 沼气池，同时也让他们学着怎么办沼气，然后全县进行推广。这 些村的人背着粮食来，在我们这儿起灶，跟着我们一起干，我们 也给他们一些生活补贴。这样，我们三个村用3个月时间就实现 了 85%—90%的沼气化，最差的户都能用沼气点灯了。那时把这 种干法叫作“大干快上”。《延安通讯》当年曾刊登了一篇通讯， 叫《取火记》，介绍了延川办沼气的情况。当年，全县有3000个 沼气池，全省在县城、梁家河召开沼气现场会，参观的重点就是 习

近平所在的梁家河，因为当时他既是知青又是大队书记，带着 大伙一起干起来的，特点最明显，效果最好。推广时，我们官庄 和梁家河都建了两个大的沼气池，都准备用沼气发电。我跟习近 平每人都拿一份图纸，分别去找县农机公司看怎么做这件事，然 后就扩大燃烧室，弄好了以后带动发动机也成功了，可以用沼气 发电带动放电影的机器，就能够看电影了。如果沼气不够，就用 大气包去各家各户收集，然后补充用。

采访组：在学办沼气这件事上，您看到了习近平哪些品 质和特点？

黑荫贵：习近平话不多，爱思考，而且思考的都是实实 在在的事情。比如他看到当地老百姓自己做的炉具、灯具，就提 出要带一些样品回去，还希望四川把师傅派过来，带着我们办沼 气。他还提出把四川的烤烟弄些回来在陕北种，因为产量高，也 适合在陕北大面积种植。还有四川拿石板做的可摇动脱粒机，四 川师傅在我们村和习近平他们村都弄了两个石板脱粒机，陕北不 缺石头，这种机械做好了还不会坏。这些东西都是靠习近平很有 心地观察，很有心地提出来，很执着地认认真真学来的。

采访组：您觉得知青岁月对习近平后来的治国理政有什 么影响？

黑荫贵：我觉得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许多治 国理念，都和他过去的经历有很大联系。比如，现在深入农村基 层的第一书记村官，跟我们那时候的整顿、路线教育以及“三年 变面貌、五年翻一番”蹲点等，在形式上应该是有历史联系的。 把一个干部真正沉下去做一个村的工作，了解情况并处理一些问 题，把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真正落下去，确实能比较实际地、有 针对性地解决问题。那时候就开始沉下去工作，和现在提出精准 扶贫也是有联系的。这几年我总回陕北，每年都去几次，陕北的 问题还是老问题，扶贫资金到不了位，因为有好多项目都是国家 拿一部分，省里拿一部分，地方配套一部分，地方配套就配套不 上来，没有钱，结果就是三万块钱要干成五万块钱的事，质量等 各方面就会有问题。近平在农村待的时间比较长，也当过县委书 记，他关心“三农”方面的事情比较多，对农村情况很清楚。所 以精准扶贫这个国策我觉得现在做到了，也很到位。尤其是强调 干部责任到位，考察一个干部的责任感就是考察一个地方的实际 情况，真是抓到了点子上。

再一个就是贫困县问题。中央一直提出贫困县要摘掉帽 子，实际上好

多贫困县不想摘帽子，即使按标准脱贫了、也不愿 摘去帽子，因为想吃财政补助，所以有很多干部不想从根本上解 决农民脱贫问题。这样，贫困县的精准定位就决定了国家政策和 帮扶力度的精准定位，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抓得非常到位的。

最近人民日报提出，农村进城务工青年回到广大农村大 有作为。如果这一代农村青年的回乡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的 话，跟我们那代知青去插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那时候是要把城 里人变成农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指 导思想下，知青客观上带去了城市文明、带去了文化，产生了很 多意想不到的文化成果。最起码陕北的孩子们对卫生、对知识的 掌握不一样了。现在这些农村青年再回去，他们带去的是互联网， 是全新的操作农业的生产方式方法，全新的种植理念，全新的对 农业市场的认识，所以他们的作用会是非常大的。

采访组：您认为陕北这个地方对习近平后来的成长产生 了什么作用？

黑荫贵：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锻炼，是有多种因素的， 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环境条件等因素。当年延川县涌现了一批 先进人物，除习近平外，还有丁爱笛、孙立哲、艾平、史铁生、 陶正，等等。这一批人的出现跟整个环境是有关系的。首先是当 地的老百姓。陕北老百姓对北京知青那种关怀爱护，是其他不少 地方不能比拟的，因为他们把对中央红军那份感情、对毛主席那 份感情拿来对待北京知青。他们认为，你们是北京的知青，就等 于是毛主席身边的孩子，甚至把你看成是毛主席的孩子，是用这 么一种心态来接待你的。接待我们插队的时候是陕北最艰苦困难 的时候，苦到什么程度?就是解放20多年了，还是原始的刀耕火 种，生活上除了煤油、盐以外，什么酱油啊醋啊都没有。就是有 一点辣椒面，好一点的再有点芝麻，可以压点芝麻盐。一年四季 除了冬天吃点酸菜，夏天也基本没有什么菜吃。一年的粮食，连 六个月都吃不到。那时候公粮任务比较重，购粮任务也比较重。 我当干部深有体会，当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农民把粮食种下 去，让粮食能收到国库，这就是你的任务。这样的情况下，老百 姓觉得“城里人吃什么呀？不就靠我们农民种吗？我们不种粮食城 里人吃什么呀”，就是这么一种朴素的感情支撑他们缴纳公购粮。 当然，他们也有怨气，但他们即使自己吃不上穿不上，仍然是把 自己家里的粮食交了，把任务完成了，明年吃不上的时候再说。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一个大队要接纳三十多个正 能吃饭的北京

知青，这些粮食要从他们分配的粮食里面拿出来， 但没有任何人说“知青抢我们口粮来了”，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待 这些人，包容这些人。可以说，成就这样一批人，很大程度上是 陕北老百姓把对中央红军对毛主席的感情给了他们的后代，而且 觉得城里面的娃娃根本没受过罪没吃过苦，到我们这地方来我们 要把他们当自个儿孩子一样看待。所以知青来到陕北，生活上这 一关是老百姓帮助度过的，是他们的接纳包容才使我们在这个地 方能够待下来，否则很多知青就会跑掉的。

老百姓还手把手教我们劳动，不让我们干重活累活，你 一说累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去干活他也不责怪你，你要是病了 会有好多人来看你，他有一点好吃的或者一点肉会把你请到他家 去吃。这个感情，只有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才感同身受，不管是 待了一年两年还是七年八年，那是刻骨铭心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北京知青在当地组织起来，想办法为 农村做了一些事情，也确实是不可磨灭的贡献。办沼气是一件事 儿，帮助陕北人民种菜也是一件事。记得1978年我离开延安时 还到了延安的桥儿沟，那里有很多从北京四季青抽调来的干部， 已经帮当地人弄上蔬菜大棚了。

当时的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对北京知青很关心。大家可 能看过电影《英雄儿女》，这个老书记很像里面王芳父亲的形象， 戴着呢子帽配一件军大衣，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脸，尖尖的鼻子， 眼睛炯炯有神，就是这种形象的一个干部。我们去的时候他应该 50岁左右，以他多年的革命经验，确实把我们知青当作自己孩 子一样看待。我们县知青入党的不下100人，知青当教师的也将 近七八十人，申书记能够充分调动这些知青做一些事情，而且这 些事情做成以后他会积极地去进行总结推广，孙立哲也好、丁爱 笛也好，好些事情都直接进入县委书记的视野里。像习近平的入 党、上学，当时只有破除“文革”很多错误思想甚至错误路线， 把他真正视为好娃娃、好后生、可信任的人，才可能让他入党， 再让他当大队书记，最后让他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如果没有县委 书记的魄力，没有他对问题的认识以及他对知青的信任，这些事 情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办到的。我出身知识分子家 庭，在当时来说政治背景也不好，我能够在1970年入党，1972 年当上国家干部，中间的1971年还被推荐上北京化工学院，这 在很多地方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县，这些事情没有多大 阻碍，起码在县委书记脑子里没有这个阻碍。所以他能够大胆地 用这些干部，北京干部和北京

知青都能够参与到整顿教育和整顿 领导班子这些事情里。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把你当成一个知青， 也没把你当成一个一般农民去看待，而是把你当成有知识有文化 的青年，认为你的政治觉悟和综合素质可以推动延川县的工作。 我曾经总结过一段话：我们知青夺了陕北老百姓的口粮，夺了他 们的招工指标，夺了他们的招干指标，夺了他们的征兵指标，夺 了他们的教师录取指标，但没有人认为我们把它“夺了”，而是 心甘情愿地让出这些指标。就像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写 的，当地的农村后生们多么渴望有一个指标，哪怕是当兵当老师 呢!但是我们知青去了以后，这些指标几乎让我们占完了，老百 姓没有怨言，而且欢天喜地地把我们送走。

所以说，陕北这个地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正是由于它 的这种包容才培养了一批人，成就了一批人。所以我觉得它是个

福地，自然会给陕北人民带来许多造化。它就像人的胳膊弯儿似 的，形成了一个怀抱，很多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他的成长，他走 的道路，他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这片土地，离不开当 地的人，离不开当地有见识的领导干部。历史上之所以出现很多 大人物，肯定是有土壤、环境的因素，也有他自己的积淀和后天 的努力。习近平后来的成长之路之所以走得那么扎实稳健，我认 为陕北七年的历练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近平立志办大事，不搞形式主义”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2017-02-13

07:46:34分享复制打印

QQ 截图 20170213094611.jpg

采访对象：刘明升，男，汉族，1950年8月生，陕西延 川人，1972年4月入党，1970年3月参加工作，中专文化。历 任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团干、知青专干，公社副主任、副书记，马 家河公社主任，拓家川公社党委书记，冯家坪公社党委书记，县 外贸局党委书记，文安驿镇党委书记。1994一2002年任延川县 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2002年于延川县政协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刘明升家中

采访组：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在延川县文安驿 公社任职。请您讲讲您当年和习近平认识和交往的情况。

刘明升：我是1963年上的初中，1966年初中毕业，1970 年被抽调在贺家湾公社工作。1971年我被县上招为公社团干部， 3月分配到文安驿公社，当时还不是正式干部，是合同干部，1977 年转正。

刚开始一段时间没有分配具体工作，领导有时候派我出 去，干一些具体工作。六七月份的时候，领导把我分到梁家塌村 做包村干部，就是雷榕生下乡的那个队。当时村上没有什么公窑， 村上的书记觉得我们都是年轻人，并且知青窑洞都很干净，就让 我和雷榕生住在一起。有一次，雷榕生约我和他一起去梁家河， 他说梁家河有个亲弟弟叫雷平生，还有一个八一学校的同学叫习 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

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在陕北闹革命，还当过西北 局书记，后来又是国家副总理。我当时的想法是，人家都是大干 部的子弟，怕有距离，也不知道人家欢迎不欢迎咱。后来，耐不 住雷榕生的邀请，我也跟着去了梁家河。

到了梁家河，彼此介绍了一下，他们都很热情，慢慢地 拉起话来，就算是认识了。他们都是大城市来的，见识广，家教 好，待人客气。拉话之后，我说要回去。他们都说不用走了，留 我在他们窑洞住下。窑洞里有一个大土炕，我就跟着他们住下了。 到了晚上，大家彼此说说话，熟悉熟悉。那个时候农村比较困难， 但是家家户户都养几只母鸡，鸡蛋还是有的。油很稀缺，都是小 麻油，过年炸油糕才用，平时有客人来才用一点儿，自己都舍不 得吃。雷平生端个碗，到老乡家里买了半碗小麻油，买了两块钱 的鸡蛋。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雷平生用洋柿子（陕北方言，西红 柿)炒了一盘鸡蛋。之前，我们陕北吃炒鸡蛋，一般就是用油直 接炒，顶多加些葱或者韭菜，从来没有用过洋柿子炒鸡蛋。我当 时还说：“你们大城市来的就是不一样，还能用洋柿子炒鸡蛋。”

我们彼此的身份都清楚了，开始说一些社会方面的事情， 念书方面的事情。年轻人都念过书，我是初中毕业，一般的常识， 历史、地理等都知道一些，这样就有了共同话题。他们也说农村 的事情，从北京来插队已经两年了，都习惯了，和村里人都熟悉 了，家家户户的情况都清楚了。他们从北京来延川确实不容易， 过好几关，不仅要适应农村的生活，而且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干。

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我有时候在村里，有时候在 乡政府，他们三个到文安驿办事、邮信、买东西，就找我见见面， 聊聊天，有时候晚了回不去了，就在公社住一个晚上。我从梁家 塌到文安驿公社开会学习，要经过梁家河，也到近平的窑洞聊聊 天、喝喝水。我们都是年轻人，熟悉得比较快，交往也就多了起 来。

1972年的时候，文安驿公社的知青专干调走了，当时我 们公社还有七八十个知青。公社的书记对我说："县上不派知青 专干了，人手不够，咱们就不再配知青专干了。你是团干，你把 知青专干接上。有什么事，该承担的工作承担起来。"既然领导 安排了，我就把工作任务都承担起来了，负责知青工作，做些开 会、招工、发文件、整理资料之类的事情。

1973年，领导把我分配到梁家河做包村干部。我当时的 想法就是，领导分配到哪里，咱就去哪里，一心一意，尽最大的 努力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到了梁家河村，我对近平的了解就更 多了。

采访组：我们昨天采访杨世忠时，他谈到习近平入党和 担任村支书是在同一个会议上讨论通过的，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 情况。

刘明升：1973年八九月的时候，按照县、公社的统一安 排，组织了工作组到梁家河整顿，我恰巧是这个工作组的成员。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工作组就考虑调整一下村里的 班子，认为对各方面都有好处。首先要考虑谁当支部书记合适。 梁家河的姓比较杂，有十几个姓，选书记一定要选一个威望比较 高的，大家都认可的人，既要考虑到有本事，还要考虑办事公道。 考虑来考虑去，大家都想到了近平。近平是一个外来知青，他和 村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并且他在村里这么多年，一直都处事公 道，能够把一碗水端平。有了这么一个初步的意向之后，接下来 的工作就是走访群众，调查情况。

当时近平在赵家河村搞社教，不在梁家河。但是我们已 经认识近三年了，我对他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我调查情况的时候， 梁家河的村民，无论谁说起近平，都说他遇事沉稳，虽然是个年 轻小伙子，做事情却稳稳妥妥，和村里谁都没有发生过矛盾。村 民还反映，近平做事非常有个性，话不多，做事情很有两下子， 大家心里都佩服他。此外，近平有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 懂得的事情特别多，是个有文化的人。

习近平有时候也到公社开会学习，公社院子里有一个大 桌子，大家都在这一个桌子上吃饭，通常是一边吃饭，一边拉话， 所以公社的干部对近平也比较了解。我听到有的公社干部说：近 平做事有规矩，对人有礼貌，是个好后生。

总的来说，村里、公社都对近平印象好，调查的结果就 是他完全具备当村支书的群众基础。

我们工作组开会讨论了这件事情，互相商量，初步形成 了一个意见：让习近平当村支书，让梁玉明当村主任，这个村子

今后的工作肯定能搞好。

接下来，我们就找习近平做工作。当选村里的书记之后， 生产各方面的担子都会压在身上，并且知青有招工、当兵、上大 学的机会，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村子，主要看近平愿意不愿意，有 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近平说："如果村里需要，组织和群众认可， 我就听从组织的安排。"就这样，近平同意了做梁家河的村支书。 我们也找了梁玉明谈了这件事情。梁玉明思想很开明，不仅同意 组织上对自己工作的安排，而且对近平的工作能力非常赞赏，完 全赞同近平当村支书。

采访组：担任村支书要党员才可以吧？

刘明升：是的，我们工作组通盘考虑了整个事情。近平 来梁家河这么多年，追求进步，一直在写入党申请书。要当村支 书，还要解决入党的问题。

从各方面的考察来看，近平完全符合党员的标准。唯一 的问题是近平父亲的问题。我和近平比较熟悉了，他对我说他父 亲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被定为重大问题，我就知道了他父亲 问题的前前后后的过

程。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习仲勋在陕北闹这 么多年的革命，还当了中央的大官，就因为这么一本小说被打倒 了，家里人都为此受了不少罪，可不能让这个事情再影响近平的 发展了。再说，入党关键还是要看本人的表现，只要本人符合党

员标准，就可以发展嘛！

采访组：习近平在他自己写的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里面讲到他入党是得到您的帮助和支持的，文章里是这样描述 的："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五天，最后成为'死党'，后 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把手把我的'黑材料'付 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 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 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 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这段文字里面描写的团委书记 就是您，对吗？

刘明升：呵呵，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其实，大家心里 都清楚，习近平十几岁就来插队，他的父母很年轻就出来干革命， 社会关系都不存在问题，核心就是怎样看待习仲勋的问题。习仲 勋是国家的副总理，因为《刘志丹》这本小说出了事情，家庭受 到了影响。

采访组：后来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刘明升：后来大家就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形成的基本意 见就是：近平来到我们村这么多年，他的情况大家都了解，他的 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不能让近平再受到影响，可以发展他入党， 所以组织上批准他入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近平当上书记之后，为村里做了哪些事情？ 刘明升：1973年，我在梁家河整完班子。1974年的6月 就调到文安驿的马家沟村蹲点。有时候，我也带着北京支援延安 的干部到各个村子去调查情况，所以对近平当书记之后的工作也 比较熟悉。他给村里办的事情可多了，打坝、挖井，办缝纫社、 代销点、铁业社、磨坊，只要是村民需要的，只要是他能想到的， 他都去办，而且都办得轰轰烈烈。

近平当村支书后，看到报纸上报道四川办沼气的消息。 沼气可是个好东西啊！第一，庄稼全靠粪当家，沼气池里的沼液 可以当肥料，提高粮食产量；第二，沼气可以点灯照明；第三，沼 气还可以烧火做饭。

报纸上登出四川人民大办沼气的消息，介绍 了办沼气的好处。我们陕北农村恰巧就缺这样的好东西呀!春节 过后，近平就和县上的一部分人到四川考察学习。回来之后，首 先在梁家河建沼气池，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办成。

他开始办沼气后，我心里就惦记上了，这可是咱陕西破 天荒的一件事情，之前从来没有人办过，也不知道能不能办成。 所以，我一有时间就到他们村子去看看。有一次到了梁家河，我 看到沼气池挖好了，正往上抹水泥;又过了一段时间，看到池子 建好了，就等产沼气了。我也心急，就往梁家河跑得更勤了。有 一天，我又去梁家河，看到近平正围着沼气池忙活呢。原来沼气

池两边的水位都涨高了，但就是没有见沼气出来，他正急得团团 转，见我来了，就对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沼气还是不能用。" 我就对近平说："别急，你再好好看看，你不是去四川参观过吗？ 是不是里面的料堵住了？"近平看了看情况，就找了一个小棍子 戳了几下，还是不行。我又找了一根粗棍子，和近平一起使劲往 里戳，戳开了一个窟窿，气就哧哧地往外冒开了，用火柴点了一 下，火就"轰"地着了起来，灶上的火很旺，灯也很亮。因为灶 和灯先前都安装好了，就等着产气点火。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 近平对我说："你有自行车，赶紧骑上自行车给公社报告吧。"那 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话、手机，传递信息全靠写信或者人跑。我 骑上自行车，从梁家河到文安驿十来里路，就像风刮的一样，能 骑多快就骑多快，飞奔着去公社报告这个喜讯。这不仅是近平的 事情，还是梁家河的事情，也是文安驿公社的事情呀！

我到了公社，跑到白书记的办公室，大声地喊着："近平 把沼气办成了！产气了！今天点着火了！ "白书记一听，高兴得不 行，赶紧给县沼气办报告。县沼气办听到这个消息，轰隆隆地来 了好多人。终于把沼气搞成功了！近平为我们文安驿公社争了个 第一，这是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紧接着，梁家河实现了沼气化， 省上还来开了现场会。近平来的时候年龄最小，不仅当了村里的 书记，而且待得时间最长，把村里搞得轰轰烈烈。后来，地区开 "积代会"（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习近平就是理 所当然的代表。

从办沼气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近平的开拓精神。

1975年8月，开始了新的招生工作。近平觉得毕竟过去 上学少，还需要继续学习深造。文安驿公社的教育专干因为特殊 事情请假，领导让我

负责当年的招生工作。公社在研究时，虽然 不舍得让近平走，但是也不能耽搁他的学习，就决定推荐他去上 大学。到县上报志愿时，近平填写的志愿清华大学。我觉得近平 学得好、干得好，他应该上这样的好大学。我去找县教育局局长 赵如斌，他当时也是招生办主任，他认为近平表现好，做出了很 大成绩，就应该推荐他去上清华大学。由于近平本人的优秀表现， 他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最终如愿以偿。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有哪些特点？

刘明升：近平当了村里的书记，是整个村子的带头人。 他很有个性，绝不是软弱的人。当领导，性格软弱了可不行，没 有个性，话说不成，肯定领导不了大家。

近平还爱看书，少年老成，遇事不慌，跟村里任何人说 话都稳稳重重的（陕北方言，很稳重），从不和别人乱开玩笑。

近平做事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一旦担起了责任，就 有自己的想法，敢干事，敢干大事。他在梁家河当书记，就能脚 踏实地处理梁家河的事情，带领好村里人，齐心协力搞工作。近 平在中央也是不停地干事情，中国梦啦，一带一路啦，亚投行啦， G20啦，一个接着一个，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他要不停地干事 情，干大事情。

近平不忌生（陕北方言，不害怕陌生人），哪怕是一次面 都没有见过的陌生人，只要坐在一块，他就有话说。有时候，我 们在公社，各个村子里都来人了，互相不认识，一大群人坐在一 起，近平也能和大家拉话。他一个白面书生，说话有气势，有话 敢说，往那里一坐，都能给大家找到话题，让大家都能拉，都能 打开话匣子，气氛一点都不沉闷，很活跃。

他不搞形式主义，不搞那个年代时兴的学习、运动，而 是立志办大事，要给群众做实实在在的事情。这种毅力和决心， 是一般人少有的。他要带着大家多打粮食，让大家都有粮食吃， 还能多交公粮，给国家做贡献。

陕北到处都是山沟沟，良田不多，能多打粮食的地方主 要就是坝地。打坝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要把大家的思想都统一 起来，调动村里集体的力量一起打坝。要调动力量，没有规章制 度可不行。近平把规章制度定得严严的（陕北方言，很严格），大 家一起按规章制度办事，

制度不认人，不管你张三李四，不按制 度办就不行，该罚就要罚，该批评教育就要批评教育。村里要办 什么事情都得提前规划好，一件一件地来。那个时候，农村基本 建设就能够考验村干部的实际能力，你能说动大家打坝、修梯田， 你就是有本事！沟里打几个坝比较难，规划好就开始打。当时规 划了几个地方，靠近梁家塌村的地方打一个坝，村后面规划了一 个，村头规划了一个。通过打坝，就能把河道变成良田，提高粮 食产量。梁家河是文安驿的中等村子，有三百多个人，要打这个 坝可考验领导了。第一，领导能说动大家，一个人能顶一个人， 要是说不动大家，一个人也就顶半个人。第二，领导要统筹好什 么时候出工，怎么分配工作，谁放炮，谁抽水，谁推土，才能把 大家领导起来，齐心协力，提高效率。近平带村民打的坝地，面 积可不小，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打出来这么多的坝地，如果没有 相当的领导能力肯定是不可能做到的。

近平上清华大学走的时候，他们村里的人自愿去送他， 送得很远，一直送到前面的村子，还有一部分人一直把他送到延 川县城，这是真情的流露。可惜当时没有手机，要是有手机录下 来当时的场景，相信大家都心服口服了。

他把七年最珍贵的青春岁月留在我们这个山沟沟里头 了。

米访组：您后来和习近平有联系吗？

刘明升：1993年的时候，近平回梁家河看望村里的父老

乡亲。我当时是文安驿镇党委书记，听说近平回来的消息，村里 都沸腾起来了。我赶紧找人把村里的卫生打扫干净，支起一口大 锅，杀了两只羊，炖羊肉，炸油糕。近平进村子之后，男女老少 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都拉着他的手，拉话的拉话，照相的照相， 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

1989年冬天，近平当宁德地委书记的时候，我去他那里 住了几天。

1994年，我有事去了福州。近平把我请到他的家中，我 见到了彭丽媛老师，也见到了他们的女儿。

2007年，我患有冠心病，身体不好，近平听说后，就把 我和我老伴儿都接到杭州，给我看病。

2009年，近平回延安，也见了我们，十分亲切。

入党提干上大学都是近平奋斗的结果”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2017-02-17

07:23:00分享复制打印

采访对象：白光兴，男，1936年9月出生，陕西省清涧 县人，陕西绥德师范毕业，中共党员，1956年参加工作。先后

任共青团延川县委副书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永坪公 社党委书记、县教育局局长、林业局局长等职务。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9日

采访组：您好!您于1972年5月调任文安驿公社党委书 记。那个时候，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已有4个年头。您作为文安 驿公社党委书记，亲历了习近平入党全过程。入党是当年对一个 人政治上的认可。习近平当时由于家庭问题，入党过程可以想见 是很困难的。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白光兴：1972年5月，我由延川县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 兼整党建党办公室主任岗位，调到文安驿公社任党委书记。在任 期间，亲历和经历了习近平入党、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推荐上大 学的过程。

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包括我在内，经历了公社三 届领导。对前两届关于习近平的入党申请和审批情况，我不清楚。 1972年秋冬，公社搞政工的同志向我谈了习近平插队以来入党 申请问题。过去因各种原因他的入党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从这时 起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按照习近平在之前写的入党申请 书中所提供的情况发调函。因当时还处于“文革”动乱期间，公 社对外省函调有限，搞政工的同志就和县委组织部门经办人员商

定，以县委组织部名义发调函，先把主要亲属的情况搞清楚。

到1973年，主要亲属已函调清楚。1973年8月，公社接 到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上报的习近平新的入党申请书，公社党委 在讨论他入党问题时，与会同志列举事实，说明习近平从千里之 外的北京来到艰难困苦的陕北农村安心插队锻炼，在这四五年时 间里和村里农民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建立了深厚感情，在 生产劳动中有苦干实干精神；还能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政治上 积极要求进步，已具备入党条件，但在入党材料中缺少其父亲的 旁证材料。因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不清楚，但 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习近平父亲的问题而拖住他本人入党。会 后，公社党委直接向习仲勋当时所在单位发函外调，只询问他的 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很快，习仲勋所在单位党组织回函称， 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入党、升学。这一 旁证材料解决了问题，为习近平入党、任大队书记和推荐上大学 提供了重要依据。公社收到旁证材料时，梁家河路线教育已进入 中期，我和公社副书记交换意见，认为习近平表现好，直系亲属 的情况已清楚，入党问题待路线教育后期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和发 展新党员时一起研究解决。

采访组：那么后来情况怎么样呢？

白光兴：1973年，正处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农业学 大寨，关键在领导。当时，在各大队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有的大队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有的大队领导班 子年龄偏大，思想保守，迈不开大步。针对存在的问题，公社党 委认为要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首先要逐步解决各大队领导 班子的问题，把一些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提拔到大队领导岗位， 带领群众大干快上。公社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开展路线教育，第 一批路线教育就确定为梁家河等两个大队。由公社领导负责组成 路线教育工作组，进驻大队。时间大体定为5个月，从1973年 8月开始到12月基本结束。在路线教育过程中，公社领导就开 始考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在梁家河大队第一个考虑的 就是习近平。因为公社干部和群众对习近平的评价很好，而且他 经过农村社教工作的实践锻炼，当大队主要领导是个合适人选。 当时的大队书记梁玉明也到公社提出让贤，推荐习近平担任党支 部书记，和我们公社党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路线教育后期，梁家河大队路线教育工作组和党支部 将发展新党员的名单呈报公社。公社党委及时召开党委会研究批 准习近平等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因为当时的新党章规定，对申 请入党的人，有的人可

以没有预备期，直接接纳为正式党员。公 社党委的批复函到了大队后，大队党支部召开新老党员大会选举 产生了新的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举习近平为支部书记，上 报公社。与此同时，下文安驿大队将支部主要领导的调整意见上 报公社。于是，公社召开党委会，研究同意两个大队党支部的意 见，批准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曹和平任下文安驿大 队党支部书记。

近年来，关于习近平当年入党一事在社会上有一些误传 和不实之词。比如，不久前出版的《北京知青在延川》一书，收 入一位北京知青写的文章《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其中说 道："1974年刚过完年，我到县里顺便到他那里，在门外听申易 书记说：'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 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 来给我说理由？（见该书第38页）作为当事人，我敢肯定地说 此回忆文章所说的这个情节纯属无中生有，凭空虚构。其一，关 于习近平入党一事，县上领导从未和我谈论过，公社按照自己的 安排部署，有条不紊地开展相关工作。其二，文安驿公社党委 1974年1月10日（阴历1973年12月18日）就批准了习近平入 党，同时任命他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怎么会出现1974年春节后 申易书记和我的这段谈话?其三，1972年5月我到文安驿公社任 职，1974年1月就批准了习近平入党。前后不到两年时间，怎 么会有我几年拦住不让习近平入党之说？我当时不仅没有阻挡， 还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地促成知青的进步和成长。

采访组：习近平担任梁家河支部书记后，与您有更多的 直接接触。您怎样评价他的工作？

白光兴：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后，新的领导 班子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974年春天就出现了生产热气腾腾的 新局面。习近平能够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面对贫困山区农 民缺柴少炭现象，思考着群众生活迫切需要的做饭照明问题。当 他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省绵阳一些农村搞沼气用来做饭照明的消 息后，就积极建议县里派人到四川实地考察沼气池建造技术，并 参加了县里组织的赴四川考察学习办沼气的工作。回到大队后， 他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村。公社为了 把梁家河大队办沼气的经验推开，组织各大队的石匠到梁家河大 队举办沼气学习班，学习后回到各自的大队建沼气池，因此在全 公社也出现了大办沼气的热潮。梁家河大队办沼气的消息很快就 传到县上、地区和省上，陕西省科技局于1975年7月下旬，在 延川

县召开全省沼气利用推广现场会议，到梁家河大队参观沼 气，习近平个人也被评选为县、地区先进知青和学大寨典型。

采访组：推荐习近平上大学，也是您任公社党委书记时 完成的。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白光兴：公社在整顿大队领导班子的同时，也着手对公 社领导班子进行充实调整。首先，在公社干部和蹲点干部中先后 选拔了年轻有为、成绩显著的三名同志报上级批准任公社副职领 导。再拟选拔一两名年轻有为、在生产第一线有突出成绩的大队 书记充实到公社领导班子中，当时公社看中选拔的第一人选就是 习近平。准备呈报上级批准后，任公社副书记一职。就在这个时 候，1975年秋，县上给文安驿公社分配了两名上大学的推荐名 额。当时公社有几十名知青，有些知青当着公社干部提出要求把 自己推荐上去。公社经过对比分析，认为习近平有理论、有能力， 成绩显著，贡献大，决定优先推荐他上大学，并上报县教育部门。 公社还派干部到县上协助习近平填报志愿书。1975年9月16日 延川县招生领导组织会议决定，推荐北京知青习近平到清华大学 读书。这样，我们这届公社党委完成了习近平入党、提干、推荐 上大学三件事。

采访组：习近平1975年上大学离开梁家河之后，你们还 有联系吗？

白光兴：习近平在文安驿公社插队期间，是一名普通知 青，他能够入党是因为他符合党员标准，表现好，具备入党条件; 他当支部书记是因为他能力强；公社推荐他上大学是因为他贡献 大。这些都是他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不需要、也没有任何人给 予特殊的关照。我们只是履行了基层党委、政府应尽的职责。但 习近平本人对此念念不忘，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他多次询问、 关照我的生活。2009年，他来延安的时候，还专门托人代问我 好，并赠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册一本，首 日封珍藏一套。

2011年11月，我的表弟从美国回到北京，在习近平家做 客时，习近平谈到了他在延川时对他的有恩之人，我就是其中之 一。我的表弟把这件事情转述给我的时候，我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一方面，我被习近平的人格魅力折服，当年小事，他以恩对待， 念念不忘，涌泉相报，真使人感动；另一方面，这些事情都是我 应尽的工作职责，得此厚报，实有不敢当之感。

“近平当村支书就是因为大家都拥护他”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2017-02-20

07:14:00分享复制打印

QQ 截图 20170220091446.jpg

采访对象：杨世忠，1951年4月出生。1969年12月入 党，1971年4月至1978年10月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工作，任 武装专干、党委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历任延川县团 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延长县法院院长、延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正处级调研员。2011年4月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安市杨世忠办公室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在文安驿公 社和他有过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请您介绍一下，您 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况。

杨世忠：我是延川县贾家坪人，现在叫贾家坪镇，以前 叫贾家坪人民公社。1971年4月，我调到文安驿公社任党委委 员、武装专干。当时，公社的书记、主任是五个人，我是党委委 员，排在他们后面，是“六把手”，也算是个小小的公社领导。 刘明升同志时任公社团干，在梁家河大队蹲点，我是通过他的介 绍认识的近平。

我调到文安驿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知青都已经出去工 作了。我的印象中，当时梁家河的知青差不多就只剩下近平和雷 平生了。我对近平最初的印象，就是感觉到这个十七八岁的后生 显得很成熟、稳重，言谈举止、做事为人就像个大人一样，根本 不像同龄的有些娃娃那么浮躁、不懂事。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很好。

我比近平大两岁，作为同龄人，我们一见面就很有亲切 感，平时也能

聊到一块，也有共同语言。那时，我们年轻干部下 乡，工作任务完成后，就想找他们知青一起聊天，不然的话队干 部要么就把我们安排到村里的单身老汉家里住，要么就是去队上 饲养员住的地方去睡。所以每次我到梁家河大队下乡，都要和近 平、雷平生聊天。那个时候他们在村里很孤单，也常来公社谈工 作、拉闲话，遇到饭时一起吃个便饭。我们公社干部每月三十斤 粮、四两油，每天两顿饭，早上玉米团子炒洋芋丝，下午一般情 况吃一顿白面，只要他们一到公社，明升和我谁看见就先给他们 报一份面，大家一起边吃饭，边聊天，这样一来一往，慢慢从相 互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熟悉到成为朋友，一起相处了五年。对他 那时在梁家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概况起来就 是：一是刻苦学习，二是踏实劳动，三是要求进步，四是心系百 姓。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一谈习近平学习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一方面是受革命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自 己有学习兴趣和上进心，所以他特别热衷于读书和学习。我第一 次到梁家河下乡时，近平已经住到国家拨专款修的知青窑洞里 了。我发现他的书非常多，桌子上、土炕上摆得到处都是，跟他 聊起来，觉得近平还就是有学问，知识面广，对我启发很大。

近平有很多书。据村里人说，他从北京来的时候，就带 来沉甸甸的两大箱子书。另外，其他知青去取家里寄来的包裹， 里面一般装的是衣服、糖之类的东西，但是近平收到的包裹，除

了一些衣服就是书。

书的种类很多，内容也很丰富，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 方面的，还有哲学、中外的文学作品、大部头的古典名著，各种 书都有。还有一些工具书。有一次我去他那儿，翻他的汉语辞典， 那本辞典很厚，是绿皮的。我说："哎，这本书好，很实用啊！" 近平说："你觉得好，就拿去用。"就这样，近平送给我一本汉语 辞典。这本辞典我一直用了很多年，可惜的是，后来延川搬家的 时候弄丢了。

当时近平能保持这种学习状态，很不容易。每天要参加 劳动，后来当了村支书就更忙了，但他劳动再苦再累，每天也要 抽时间看书，上山劳动的时候也总是带着书，利用生产劳动的间 隙时间看；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嘴里吃着饭， 眼睛盯着书本。一般的同

龄人，很少有他这种刻苦学习精神。我 也一样，虽然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各方面学习生活条件比他好得 多，却没有近平这么可贵的学习精神。

采访组：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当时年纪不大，但是劳动却很吃苦。当他 还是普通知青的时候，我们到梁家河去下乡，村里的社员普遍反 映："近平这后生可好了，劳动能吃苦，很忠厚，很踏实，从不 溜奸耍滑。他话也少，从来不会跟人乱开玩笑，也从不骂骂咧咧、 打打闹闹。"他人品好，村里老少社员都喜欢到他住的窑里，谈 工作、拉家常。

近平无论是当普通知青，还是抽调出去搞社教工作，以 及后来当村支书，他不仅对工作认真负责，并能积极参加集体生 产劳动。那时候，有些村支书凭着自己手中有点权力，经常借口 到这里那里办事的机会，逃避劳动。但近平从来不这么做，在村 上没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他都是按时出工和社员一起劳动。并 能带头完成自己每月的劳动任务，从不误工。

采访组：您当时在文安驿公社任党委委员，对习近平入 党过程一定了解的多，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1973年入了团， 1974年1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没有预备期， 一批准就正式成为党员。

近平入党的过程，现在社会上流传很多说法，有些是不 严谨的，有些是不真实的。因为我是亲历者之一，整个过程我都 比较清楚，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把我知道的一些实际情况讲一下。

当时，我们公社党委书记白光兴思想比较解放。一度， 梁家河大队很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年轻人来当党支部书记，带领社 员好好干一些事。那时，原大队书记梁玉明当干部时间也有点长， 年龄也有些大，且他主动让贤，多次向公社党委推荐习近平入党，

当大队书记。可以说，梁玉明的想法与我们不谋而合。但当时近 平还不是党员，对此，公社党委就把习近平入党问题纳入视野， 重点培养。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公社党委就已经准备接纳近平入 党了。

我们公社党委第一次讨论研究近平入党时，虽然大家都 认为近平表现好，群众威信高，符合入党条件，一致同意批准他 为党员。但为慎重起见，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在洛阳“下放”问 题，还需搞个外调比较好。这样我们就落实公社组织干事王学礼 联系有关部门发函外调。没多久，洛阳方面就回了个函，公社党 委班子成员都传着看了。函上说：习仲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子女升学、就业不受影响。有了这个函，公社就及时召开党委会 议，研究决定习近平入党，并任命他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近平入党和当支部书记是一个会上研究的。我记得当时会上梁家 河大队一起还研究批准了两名党员。

那个时候入党，没有人情关系一说。近平入党，当村支 书，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工作、受到群众拥护 的结果。近平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情和关系可以依靠。他就是个 普通的北京知青，千里迢迢到这穷乡僻壤来插队落户。加之，他 父亲习仲勋当时还在受政治迫害，没有“解放”，这个情况只会 阻碍他入党，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近平当时能入党就是因 为他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并且多次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 要求进步；他能当村支部书记，就是因为他劳动吃苦，群众基础 又好，大家都拥护他。

近平上任以后，不仅自己积极劳动，还带领广大社员治 沟打坝、植树造林、大办沼气，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 公社的一致好评，公社党委对梁家河大队的工作充分肯定，很满

意、。

我当时在上文安驿大队蹲点，按公社统一安排，带领广 大社员大办沼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所以对近平办沼气的事情 了解得比较多。近平确实善于思考，也敢想敢干，并自己花钱到 四川绵阳考察学习，回来后就在村子里搞了第一个沼气池，也是 全县第一口沼气池，引起县沼气办的重视，同时也得到省、地的 关注和支持，专门到梁家河大队召开现场会。近平带领梁家河村 民大办沼气，一方面解决了社员的照明、做饭、取暖等问题，同 时沼气废料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一举多得，有力促进了梁家河 大队的经济发展，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深受各级领导一致好评 和表扬。

采访组：习近平“心系百姓”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世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仍然一直关心这里的父 老乡亲，今天

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下。

1986年8月，我从地委党校毕业后，又被分配到文安驿 镇当党委书记，当时近平在厦门市当常务副市长。1987年元月， 我给近平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想到沿海经济发达的厦门市去考察 学习，开拓眼见，解放思想。同时也想通过近平把延川的红枣， 甘泉的红小豆和我们镇上鹿厂的鹿茸，看能不能通过外贸渠道， 寻找一些销路，帮助解决一些资金，促进我镇经济发展。特别是 通过考察学习借鉴一些发展思路，学习一些工作经验，为改变我 镇面貌作出新贡献。

近平很快就给我回信说：你说要来厦门，感情上我很盼 望见到你们，非常欢迎你们来。但有些事应让你们搞清楚：一个 地县的力量到厦门来搞联合，一般来说是不足的，尤其是大跨度 的经济合作，难度更大。至今陕西省还没有哪个地市在厦门谈成 项目，这涉及到审批权、外汇、资金、交通等等问题……

收到回信后，我们对近平恳切邀请非常感激，对他直言 相告、有啥说啥的朋友感情表示十分理解。同时我们也作了充分 准备，把他在村里带领社员办的沼气池、打的水井、打的坝拍成 照片。当年7月，我带领村支部书记梁玉明、供销社主任乔生辉， 专门去厦门考察学习。

我们已经多年不见了，到厦门以后，近平见到我们很亲 切、非常热情，特别看到那些照片非常高兴和感谢。具体谈到红 枣问题。在当时条件下把红枣运到厦门，确实不太现实，保鲜、 运输等成本很高，这种大跨度的经济联合还没有先例。近平说的 很实在。

另外就是鹿茸的事情，近平还是很支持的。他联系了几 位老板来看，但是一听我们只有三四十只鹿的养殖规模，合作前 景不大，都不愿投资，对我启发很大，使我深深认识到“没有规 模就没有效益”。

当时我们去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那个时候梁家河村还没 有通电，照明煤油灯，发展没动力，想通过近平帮我们解决一些 拉电资金。后来近平专门给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白崇贵写了封信， 引起县委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并拨出十万元专款解决了梁家河的 拉电问题，对此，梁家河沟的父老乡亲十分感激、念念不忘。

我们在厦门期间，近平白天在单位工作，晚上多次陪我 们一起吃饭。我们走的时候，他自己花钱，给我们三个买了飞机 票，上飞机那天正

下着暴雨，近平冒着大雨把我们送到机场，直 到亲眼看着我们上了飞机他才回去，这让我们心里非常感动。

2009年11月13日，近平到延安调研，我也参加了会议。 市、县、镇、村四级书记分别汇报工作后，直接点名，“世忠， 你讲”，当时我是延长县法院院长，我即兴就延安市、县两级人 民法院基本情况、工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讲了三个问题。特别是

当时人民法院普遍存在的法官队伍青黄不接，办案经费严重不 足，以及执行难等问题讲了后，近平非常关注，做了笔记。不久 后，最高法院就发来了调研摸底表，存在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落实 和解决。

在那次调研会上，近平当着与会人员的面，回顾说：1973 年他在文安驿申请入党期间，从北京寄来了一些“黑材料”，当 时“就是明升和世忠把那些材料撕了”，让他顺利入了党。

会议结束后，近平在门口一个一个和大家握手道别，合 影留念，我是最后走出会议室的，近平对我说：“世忠，现在就 你一个在职，好好干！ ”我说：“好！ ”

“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上）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2017-02-24 07:40:24分享复制打印

采访对象：雷榕生，1949年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 8月出生。兄弟二人与习近平同为北京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1 月13日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雷榕生分在 梁家塌村，1973年9月上大学，先后在延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

局、北京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工作，2010年6月退休。雷 平生分在梁家河村，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1974年10月上延 安大学。1977年毕业后在北京市科委营养源研究所工作，1983 年至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学习和工作，获得 法国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7年1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

组：榕生老师，平生老师，你们好！我们明白你们选 择今天接受采访的用意，因为48年前的今天，是你们与习近平 一起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的日子。

雷平生：的确是这样。这是一个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 不仅是我们，还有坐同一列火车出发的北京知青，我相信这个日 子铭刻在他们记忆中了，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

时间如白驹过隙。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曾经感慨 赋诗：“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已经是“四十八年过 去”，不敢说“弹指一挥间”，但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采访组：请先讲讲你们上山下乡插队最初的缘由和出发 时的大致情况吧。

雷平生：1969年1月13日，我们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

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 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 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 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 委会发给我们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 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 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那时按规定，知青可以凭票购买 一只木箱子用来装生活用品与衣物。当时国内各种物资都比较匮 乏，但木箱子在北京市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大概18元到22元 一个。箱子上印有毛泽东头像，还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等口号。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 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们初67届的同学，大多 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 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 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 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 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

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 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 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 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 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齐 老师很关心近平，因为近平上学期间一直是个好学生，而齐老师 又是他的班主任，非常了解近平和他家里的情况，希望近平能有 个更好的去处。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齐老师就对 我说：“雷平生，你办完手续就可以出去了。”她把近平留下，要 继续做他的工作，劝他留下。

我在办公室外面，大约过了10多分钟近平出来了，他对 我说齐老师还是希望他留下，但他执意要去延川县插队。近平对 我说：“到了陕西延川，咱们在一个生产队好不好？”我说：“好 呀！”就这样，我们一句口头约定，就有了共同在延川县梁家河 大队下乡插队多年的经历。

我哥雷榕生原来也希望与我们分在同一个生产队。但当 时送我们去延川县的军代表研究了知青分配名单，觉得这样不 妥。他认为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凑在一个生产队太集中了， 还是分散开比较好，于是就把雷榕生调整到另一个生产大队了。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 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 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 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 ”我们一看，是近平 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 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 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 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 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 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 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 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坐火车到了陕西铜川，住了一夜，又换乘卡车向延 安进发。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师范住了一晚。我们住在教室里， 用课桌拼成大铺，把被褥打开，睡在上面。

1月16日一早，我们又乘车从延安出发途经延川，中午 时分到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外的空场上，各村来接知青的贫下 中农为我们开了一个

简短的欢迎会，招待吃了一顿饭。那天拿来 招待我们的是陕北人民最好的饭菜，有洋芋、胡萝卜、粉条和猪 肉，还有小米饭。知青各自散开吃饭，村民们远远围观我们，狗 在吃饭人群中窜来窜去，捡拾掉在地上的肥肉片子。吃完饭后， 我们按名单各自分队奔赴插队地点。我和近平被分在梁家河大 队，距离公社有15里路。队伍在进沟的时候，老乡很照顾我们， 帮我们背着行李，我们只提着自己的挎包与提包。

到了梁家河以后，雷榕生他们需要继续前行，就与我们 分开了，不过好在我们是在一条沟里，再继续往前走几里路就到 了，隔得不远。

雷榕生：我插队的村叫梁家塌，“文革”前与梁家河同属 于一个生产大队，两个自然村落。这个村在梁家河的后面，比较 偏僻。

雷平生：我和近平分在梁家河大队后队，同队的还有王 燕生、杨京生、佟达宁和戴明。从那时起，近平在这里度过了七 年，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年。当年，生活各方面都是很艰苦的。我 们一起劳动、学习，经常交流，彼此关系始终处得非常融洽。

采访组：当时你们都是高干子弟，突然从大城市到小村 庄，心理落差一定很大吧?2002年，习近平发表一篇回忆文章《我 是黄土地的儿子》，里面讲到几年中过了“四大关”，就是“跳蚤 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请你们谈谈是怎么过这“四 关”的。

雷平生：你说的这篇文章我后来读了。其中提到过“四 大关”，有些滑稽的情景今天想起来还捧腹不已。

确实，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 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六十年代初期 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 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 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 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 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 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 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 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 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 ”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 位在陕北插过队的

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 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 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 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 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解 决所谓“水土不服”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 六”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 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 挠破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 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 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 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 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 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近 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圪蹴”（陕西方言，意为蹲)在各 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 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 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 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 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游动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 得到了提高。

至于“饮食关”，主要是粗粮多，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 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 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其他蔬菜种的很少。土 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 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 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青西红柿)等。这些腌菜缸放 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 借口 “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系较好的 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 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菜。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 们喉咙中都“燥的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 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 的婆姨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 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 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 由于没有油

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 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 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 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 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 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 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 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 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我们过 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 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 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 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 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 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 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两人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 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 油膏吃。也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 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 的饺子也在二十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 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 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 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 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除早），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 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一角一分。换句 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分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 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 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随着时间延长，近平 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 耐劳的精神，工分也长到10分了。

采访组：习近平曾提到，初到梁家河时年龄小，又是被 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老 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后来经过姨姨、姨父教育，他努力跟群众 打成一片，一年以后“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这 一段经历，对习近平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请你们谈谈这方面的 情况。

雷平生：说实话，我并没有感觉到梁家河的老百姓对近 平印象怎么不

好。倒是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那也是刚到农村 的头一个月，我和近平到文安驿公社另一个大队去玩，那个队也 有我们八一学校的同学。谁知刚到那里不久，就接到公社紧急通 知，要求文安驿公社全体知青和基干民兵到公社开会。由于通知 规定的时间很急，我们就与那个大队的知青与基干民兵一起步行 向公社进发，队伍由那个大队党支部的宋书记扛着红旗前行。走 了一段快到公社会场时，隔河相望，看到梁家河的队伍从沟里出 来迎面走来，于是我们就离开原来的队伍越过干涸的河床与梁家 河队伍会合。没想到，到了公社会场便有“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 旗走”的喧嚣。这使人意识到，近平由于家庭原因目标大，早已 经被一些人注意上了。这件事情不大，但传播得挺快挺广。其他 村子不了解情况的农民纷纷向梁家河群众了解情况，就连公社干 部也注意到并向梁家河群众询问习近平这个知青怎么样？不成想 梁家河的乡亲们异口同声说近平是“好后生”，“好的啦！ ”这样 才使得一场风波消散于无形，最终没有造成后果。后来近平谈到 陕北的人民收留了他，爱护他也保护了他，是有事实根据的。

以后类似的事情还多次发生过，但凡遇到有招工招生、 入团入党之类的事情，就常会有人向上面“反映情况”，所反映 的情况无非是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关。这些无端的非议与 “特殊对待”，在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正如一位朋友说的那样: “别人是从零开始，习近平要从负数开始。”

采访组：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时间，正是从少年到青 年成长、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你们看来，习 近平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明显的思想变化？

雷平生：近平插队七年中，前后是有一些思想变化，但 不好说有明显的阶段。我个人的感觉是，从1969年1月到这年 的秋天，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从1970年初到1972年回京， 经中央专案办公室批准允许探望正在隔离审查中的父亲习老，他 的情绪和思想处于稳定向上、刻苦磨炼的时期，处事已然沉稳自 信，也开朗多了。大约应该从1973年后半年，特别是去延川县 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参加“整队”工作后，他的思想处于明显 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段，他不负众望勇挑重担，积极参加农村的 生产，带领农民为改变自己生产生活面貌努力工作。这一段如果 一定要讲有“转变”，我认为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对这个“转

变”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再就是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兴、 公社干部刘明升，梁家河大队支书梁玉明，也都起了各自的作用。

1973年后半年，近平受延川县团委书记、北京知青陶海 粟的鼓励，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的 “整队”。近平珍惜这个机会，真心实意努力工作，得到赵家河 群众的交口称赞，也引起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的注意。据近平 回队与我闲聊时讲，赵书记曾几次与他促膝谈心，态度热情和蔼， 鼓励他解放思想、放手工作。我认为这位赵书记极善于做思想工 作，重视人才。为了使近平放下思想包袱，在交谈中，赵书记特 别谈到了自己所知道的习老当年在陕北的革命经历和业绩，谈到 了陕北老百姓对习老的怀念和尊敬，当然也谈到了群众与组织对 近平的期望。这些谈话，从政治上给近平以信任和鼓励。那几天， 我感到近平已经彻底从几年来的忧虑和苦闷中解脱出来。赵庭壁 书记不仅与近平沟通交谈，而且付诸行动。当听说近平在文安驿 公社申请入党几次都得不到县里批准，赵书记就到县里找文安驿 公社的白光兴书记商量，要求将近平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 来落户，培养入党。文安驿公社白书记坚决不肯放人，说这是文 安驿公社“自己的人才，自己会用”，“近平的组织关系，文安驿 自己会考虑培养解决”。

从这时起，近平不再犹豫、仿徨，充满信心全身心投身 到为群众奉献的工作中去。此时他的思想，已经逐渐有了新的人 生目标。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采访组：对基层群众感情至深，是习近平的显著特点。 请你们结合当时的经历，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雷平生：好的。先说一件我们刚到梁家河后队时的事。 一开始我们住在农民张马有及其子张清远家的窑洞，吃饭在30 米外邻近坡上的张贵林家窑洞。张贵林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党 员，他从1936年到1960年间一直是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我 们到村里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为了腾出一孔窑洞给 我们知青做饭吃饭，和他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我们叫她高老 婆儿，还有女儿，以及老母亲，全家都搬到旁的窑洞去住。我们 在他们家吃了几天饭以后，张贵林的老母亲由于年迈就过世了。 家里要办丧事，遗体没处停，只能暂时停在我们做饭的那孔窑洞， 所以我们就必须搬到别的地方去做饭了。

那个时候快过春节了，北京知青刚来，还没有正式开始 劳动，所以也比较清闲。早晨我们二人从住的窑洞里出来，近平 就对我说：“咱们到上面去看看。”我俩信步走到张贵林家的院子 里。

刚好高老婆儿从窑里出来，对我们的到来有些诧异。近 平也顾忌当地有什么忌讳，慢慢地对她说：“听说您家里的老人 过世了，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高老婆儿很爽快地说“可以看。” 这位过世的老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陕北“闹红”时 就支持她儿子参加共产党干革命，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革命母亲。 这些情况，我们是不久前刚刚听村里后队队长张贵刘讲的，他是 张贵林的堂弟。近平进到窑洞以后，面向炕上老人的遗体恭恭敬 敬地鞠了几个躬。我在旁看到这一幕，体会到近平对革命前辈的 真情实感，心中十分感动。后来张贵林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对 面的知青是当年陕甘根据地主席习仲勋的儿子时，惊讶而喃喃说 道：“习仲勋，当年那是要上伟人像的呀！”

采访组：这是你们去梁家河后多久发生的事情？

雷平生：是我们刚到梁家河，才只有几天的时间。近平 能够对农村一位过世的老人、一位老党员的母亲，恭敬地吊唁祭 奠鞠躬，这个做法是当时普通人想不到的，做不到的。那时正是 “文革”进行的第四个年头，很多传统都作为“四旧”或“封建 落后”的东西破坏掉了。但近平不那么认为，他完全是出于对 1930年代老共产党员母亲的尊重去做这件事的。这是一种真情 的流露。从这件事上，我感到近平对群众和党员是有真感情的。

另一件小事，是在我们到梁家河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的。 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大队基建队劳动了。基建队的工作，包括 修建淤地坝等农田基本建设，队长叫武玉华，是个典型的陕北男

子汉，刚强、能干。那时候，他的婆姨、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 队劳动。他的孩子叫“灵娃”，名字好听，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 灵娃干活挺好，能顶半个劳力，他家里带他来劳动，挣个半工， 五分六分。但他说话做事都不十分明白，当地话就叫“半憨憨”。 灵娃还喜欢惹事，有时候经常乱来，在别人身上抓一把，拧一把， 推一下，乱开玩笑。经常说出话来不知深浅惹出麻烦。村里很多 人也经常拿他开心，逗他出丑。也有人被灵娃惹得恼了，与他发 生冲突，轻则骂上两句，重则发生肢体冲突，尤其是灵娃妈不在 场的时候，个别人趁机拧他几下，打他几下，骂他几句，这个情 况都是有的。灵娃妈每次发现灵娃被欺负了，既难过又气愤，问 他：“谁欺负你了？”有时他说得清楚，有时说不清楚，灵娃妈气 得不行，为灵娃经常与别人发生纠纷和不愉快。

我们这些知青到基建队以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有些担 心，生怕灵娃

和知青们发生冲突。因为知青都是大城市来的小伙 子，万一灵娃惹到知青发生冲突，伤了谁都担待不起。尤其是当 他们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孩子，就更担心了。当我们来到劳动现 场的时候，灵娃妈就紧紧地拉着灵娃，不让他乱说乱动，怕他惹 出事来。让武玉华和灵娃妈没想到的是，近平在基建队劳动过程 中，一直对灵娃都很和气，不仅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而且始终 都是笑眯眯地对待这个孩子。

那时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近 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大炮”，灵娃经常是上去一把就给抢走 了，近平对此从来都一笑置之，对灵娃从没有过疾言厉色。我们 知青和基建队老乡把这些事看在眼里，武玉华和灵娃妈对此也非 常感动，大概之前还没有谁对他们孩子这么宽容、和蔼。近平这 个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基建队，原以为灵娃会惹到他，闹出点事 情，闯出点祸来。但没想到，有近平在这儿，灵娃反而不受欺负 了，愉快自如多了。

几年以后，近平经群众推荐、组织选派要去北京上大学， 临行前与大家告别。武玉华和灵娃妈哭得最伤心。他们和近平一 起劳动，互相帮助，近平对他们的孩子灵娃也很亲切。这对陕北 夫妇非常重感情，此时就好像自己一位亲人要远行一样难过。 1993年，近平第一次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武 玉华和灵娃妈都已经去世了，灵娃也已经被送到地方办的养育院 了。近平那次还专门问到灵娃：“灵娃做啥去了？灵娃怎么样了？” 据我们的朋友武晖（也是武玉华的侄子)跟我转述：当近平知道灵 娃的下落后唏嘘不已，最后还留了一些钱，托乡亲们带给他。

近平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陕北人的说法，很“仁 义”。他在梁家河，对贫下中农，对老人、儿童、残疾孩子，都 是一片爱心，真诚相待。作为一名外来的北京知青，他给乡亲们

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采访组：我们前不久采访张卫庞，他当时讲到，他和你 们住得很近，而且给你们搬过两次家？

雷平生：是的，我们到梁家河几个月后，张贵林的女儿 “红儿”迎来了一位上门女婿，叫张卫庞，因为离得很近，近平 跟他的关系处得非常好。近平从张清远、刘金莲家搬到知青窑时， 要把行李和一些家什一点一点儿搬到新窑洞去。我在搬家过程 中，看到张卫庞坐在一块石头

上笑。我问他："张卫庞，你笑甚？" 张卫庞喜滋滋地说："你看！近平把这个送给我了！"我一看，张 卫庞手里拿着一个针线包，上面绣着"娘的心"三个字，我知道， 这是近平的妈妈齐心阿姨在他插队离京时送给他的针线包。后 来，张卫庞把这个有特殊意义的针线包上交给档案局了。

后来，近平回到村里看望乡亲，见到张卫庞，总是跟他 打趣两句。现在，张卫庞在种植苹果，苹果质量很不错。2015 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遇到 张卫庞，问他种苹果每年收入能有多少？当时村里还是一家一户 分散种苹果，没什么规模效应。头一年结苹果，张卫庞就挣了几 万块钱。这在陕北这样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农村，已经是不错的一 笔收入了。所以那次近平就高兴地说："张卫庞，你可发了！"那 次，近平还坚持亲自上到塬上果园地头看了张卫庞的果园。

在总书记关心的感召下，2016年，年近70岁的张卫庞将 附近27户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苹果合作社，还搞了一个苹果品 牌"梁家河塬上苹果"。这些绿色、环保、不上化肥、不打农药 的纯天然优质苹果，2016年产量有200—300吨。张卫庞自己也 收了差不多5万斤优质苹果，这一年他收入了 20多万元人民币。 由此可以看到，梁家河的老百姓，通过他们的勤劳和努力，正一 步一步地富裕起来。其实，让人民过上好生活，也正是近平工作 和奋斗的目标。

我们知青的劳动，除基建队的打坝、修梯田外，更多的 是在农忙时上山干农活，生产粮食，那就更辛苦了，每天一早四 五点钟，天还黑着呢，我们就得起床出发。还得留下一个人，把 一天的饭做出来。做的饭就是蒸玉米团子、高粱米团子，再熬点 米粥，盛在一个罐子里，把饭送到山上去，供劳动的知青早上和 中午吃。

我们知青当时的粮食比农村社员要宽裕一些，这是因为 周恩来总理听说陕北知青饿肚子、吃不饱时，就和陕西省、延安 地区商量，决定对每一名知青分"一个半人"的口粮。再有，插 队下乡的前半年，国家还给我们供应了 6个月的国库粮，所以我 们知青的粮食基本够吃，吃得也要好一点。我们能吃到蒸玉米团 子、高粱米团子，老百姓当时只能吃糠窝窝。这种糠窝窝，当地 老百姓也叫"糠团子"，就是推磨剩下的麸子或玉米皮之类的。 团子是棕红色的，有些粗糙的捏在一起都很困难。

在山上吃饭的时候，我们知青吃的玉米团子是黄澄澄的， 老乡一看，

就说：你们知青吃的这是真粮食。近平拿起老百姓的 糠团子一看，确实就差了很多，于是他就用他的玉米团子和老乡 换饭吃。一起劳动的老乡就夸奖说“‘近平肯吃苦，嘴一没不细（一 没，陕北方言，完全、根本的意思）。”这话的意思是说人不挑食、 能吃苦，“嘴不细”就是吃东西不挑肥拣瘦的意思。他们都知道 近平的情况，但看到他并不娇生惯养，而且把好一点儿的粮食分 给老乡吃，自己主动吃糠咽菜，十分钦佩。那个糠团子，确实难 以下咽，而且热量很少，不顶饿，吃完再干活，没一会儿就又饿 了。有时候，近平感到饿得顶不住了，又打开老乡的那个饭包， 想再拿块糠团子吃两口。结果发现，他换给老乡的玉米团子他们 都放着没吃，近平就问春妈的（村民巩万发的婆姨，他们家的孩 子叫“春”，陕北方言称“春的妈妈”为“春妈的”）：“你们咋 都不吃玉米团子？”春妈的就坦白地回答说：“你们给的这玉米团 子是‘真粮食’的，窑里男人与孩子受苦更重（受苦，陕北方言， 意为劳动），要给他们留着吃。”这件事给近平非常大的触动，老 乡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当时，城里有些人家，生活好一点儿的， 平时吃细粮习惯了，不爱吃粗粮。但是在这里，普通粗粮都舍不

得吃，还要留给壮劳力。

近平到梁家河以后，在生活或劳动中与老乡接触，越来 越多地了解到当时农村的落后与老乡生活的艰苦，对他们很同 情，激发出为他们做实事的志愿。我回想起那时我们曾在另外一 个队里的知青那里读到一本“文革”前出版的《诗刊》杂志，有 位诗人这样写道：“待入尘寰，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他 读了之后很受触动，反复吟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党内秀才 胡乔木的诗《采桑子•反“愁”》其三。

梁家河农村插队劳动磨炼学习的经历，是近平思想、觉 悟、感情的出发点。一个共产党的工作者，如果不真切了解基层 群众的疾苦和贫困地区群众生活的艰难，就无法真正站稳群众立 场。现在，我们在电视里经常看到，近平下乡调研，很重视去那 些贫困地区体察民情，比如西南、西北、井冈山等老少边穷地区。 他对这些地方普通群众的生活很熟悉，到老百姓家里去走访的时 候，言谈举止很自然，掀开锅盖看看锅里有什么，嘘寒问暖，与 人民群众谈话都能说到要害处，说到点子上，也能了解到实际情 况。如果下乡是去走过场，说话很有“套路”，也就看不到真实 的感情流露。在电视上每每看到已经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近平，依 然对困难群众自然而然地流露真情，我就有很多感慨，知道这种 真情来自于他当年在梁家河上山下乡的经历，来自于他从知青

时

代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对人民群众的深情。

“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中）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2017-02-27

07:31:53分享复制打印

QQ 截图 20170226214012.jpg

采访对象：雷榕生，1949年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 8月出生。兄弟二人与习近平同为北京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1 月13日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雷榕生分在 梁家塌村，1973年9月上大学，先后在延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 局、北京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工作，2010年6月退休。雷 平生分在梁家河村，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1974年10月上延 安大学。1977年毕业后在北京市科委营养源研究所工作，1983 年至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学习和工作，获得 法国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7年1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习近平被推选为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他在日常 工作中有哪些特点？他平时为人处事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雷平生：梁家河这个村是一个姓氏比较多的自然村，家 族之间、邻里之间、前后生产队之间，甚至兄弟姐妹之间，总有 这样那样的矛盾，有时还挺复杂。在担任村党支书后，近平在处 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时，能够认真细致地给村民做思想工作， 做说服工作，鼓励大家放下分歧往前看，团结起来，把事情做好。

近平刚上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村 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当时请了王栓(梁玉明）的弟弟根栓回 来打铁。他这个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气大，打铁的手 艺很好，性格比较直爽，说话办事粗线条一些。他当时在文安驿 公社集上打铁，近平把他动员回队里来打铁，做农具。这样，村 里在供应本村农具使用的同时，还能有一些创收，有些“活钱”。 但是根栓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在梁

家河打铁的收入不如文安驿高 了，他就不太满意，想走。队里不让他走，他就要待遇，每个月 要给他涨工分。他这个人讲话很直，好像八匹骡子也拉不回来的 样子，还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当时这个铁业社，是村里挺重 要的一个产业，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对村里的损失不小。这件 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里，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我们都知道， 近平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的，讲话也很直率。根栓也是 个很硬的人，两个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我们担心近平去找他 谈，万一谈崩了，闹出点什么问题，铁业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 实际上，没过多久近平就笑眯眯地回来了。他说，把根栓的工作 做通了。原来，近平先是跟他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得差 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来终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思想打动 了，他表示还是留在梁家河，为村里的铁业社继续做事。这种情 况下，近平当梁家河书记“开张”做的几件事里，铁业社这一件 就落到实处了。事实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做成的，需要处理各种矛盾和情况，做各种细致的工作，才 能顺利地把各项工作开展好。近平做群众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 人性化，从不采取强势、高压的做法，总是尽量做思想工作，把 人的思想弄通了，心里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能顺理成章做好了。

还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文安驿公社赶集。近平那个 时候经常熬夜用煤油灯看书，所以他是计划到文安驿去买些煤 油，再买些烟。那时候我们经济上比较窘迫，手里的钱很有限， 只能买最便宜的“经济烟”卷烟，9分钱一包，9毛钱一条。不 成想刚刚到公社院外，我们碰见几个老乡，他们对近平说：“集 上有个讨吃老汉，说是你爸爸原来的卫士。他从绥德、米脂一路 讨饭下来到文安驿，听说你在这儿，要来找你呢！”近平说：“那 我去看一下。”当时我也没在意。结果，过了一会儿，文安驿集 上就轰动了，有从集上过来的人说：“刚才，习近平在街上，碰 见了讨吃老汉，说是他爸爸过去的卫士。近平就把身上的钱、陕 西省粮票、全国粮票，都掏光了，给了那个老汉，还把外套也脱 下来给了人家！”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心头感到很震动，这是他的行为 第二次使我感动。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粮票是很重要的。 你要是有一斤陕西省粮票，买玉米面就9分钱，如果没有粮票， 那就是另外的价钱，会贵很多。当时近平的经济也很拮据，钱和 粮票并不多。我知道那时他家里也没有余力给他更多支持。那时 已是阳历九十月份，陕北已经开始冷下来了，近平竟然把衣服也 脱下来给了那乞食老汉。近平这样

做，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倾囊 相助了。古人赞美慷慨助人仗义疏财的人有“解衣推食”之说， 即：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让出自己的食物给别人吃。而 近平在自己身处困境的时候，仍能够做到对乞食老汉“解衣推 食”，他的人格和胸怀令人感佩。

近平从集上回来在公社外和我们会合的时候，我问他事 情经过，近平说：“那个老汉说他是我爸爸过去的卫士，我看他 很困难，从绥德上面一路乞讨下来，心中不忍，就把钱和粮票都 给他了。”我说：“你都给人家了？”他说：“都给人家了。”我说:“这下，煤油和纸烟也买不成了。”

回到梁家河，我跟近平说起这件事，我问：“你当时有没 有问那个老汉是真的假的呀？”近平跟我说：“他能叫得出我妈妈 的名字，能说得上我姐姐的名字，此外还有一些事情，他说的也 都对得上。”听到近平介绍这些情况，我就多问一句：“近平，他 不会骗你吧？”近平坦然一笑，说：“我现在是个普通农民，他骗 我什么？他不会骗我的。”听到近平这么坦诚地说，我十分感动， 肃然起敬。近平对这位贫穷老人的这种理解、这种信任，这种古 人所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情怀，毫无保留倾囊相赠，真 是常人所不及，也是难能可贵的。

雷榕生：刚才平生讲到的这件事情，当时我就在现场。 我的理解是，不管这位老汉是不是习老的警卫员，只要他是当时 一起闹革命的老红军，近平从内心深处就很尊重他。近平当时倾 囊相赠，一方面是因为近平本人的感情和胸怀，另一方面是因为 这位老汉那么早参加革命，现在却落到沿街乞讨的境地，近平心 里非常难受，也非常不忍。近平当时拿出所有的东西送给老汉， 可以说完全是出于对父辈那一代革命者的尊敬。

采访组：“我现在就是个普通农民”，习近平在和您谈论 文安驿集上的那位老汉时，他很自然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您怎 么理解习近平的这句话？

雷平生：当时我们已经插队几年了，近平说自己“是个 普通农民”，反映出他对农民思想感情的变化。他没有自称“知 青”，而是自称“普通农民”，说明他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农民之 中了。近平对基层群众、对农民的感情非常深厚。近几年，他一 再强调扶贫要攻坚，扶贫要精准，就是因为他曾经就是一名农民， 他很理解，很懂农民。无论是他当知青的时候，还是当大队书记 的时候，他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和一些没有农 村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的想法和

做法是有区别的。 只有在基层受过苦，知道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才能够急 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才能够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才能真 正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

雷榕生：近平不仅经常称自己是农民，也经常说“我们 老陕”如何如何，可以看出当时他已经把自己看成陕北农民中的 一员了。他从内心觉得，自己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是很光荣的 事。

雷平生：有句话叫“人微言轻”，是说身份普通的人说话 没有分量，不被人关注。但在近平这里，根本没有这回事，在他 眼里就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尊重。近平与 人交流、谈话的时候，即使对方是再穷的人，他也全神贯注地听。 凡是和他交谈的人，都会觉得心里很温暖。他不像有些人，见了 穷人就扭过头去，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我们村有位叫王翠玉的 北京知青，被招工后在送别会上就称赞习近平说：“在习近平眼 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 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 ”近平把自己看作 农民，看作是黄土地的一部分，这个认识从他下定决心在梁家河 大队挑重担时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1973年后半年，近平在赵家河当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 到梁家河，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对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 是想上大学。”当我问他的想法时，近平说：“我74年不上大学 了。”我感到很突然，问他说：“74年招考工农兵学员，可是个 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不上了？ ”近平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 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 儿。”

近平当时正在赵家河村参加“整队”工作，地区革委会 要求全区各县农村要“三变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 热火朝天，近平也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当时考虑，离开 赵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为村里做些实事，带领老百姓把粮食产 量搞上去，为这片土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上大学机会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当时已经 到了 “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通过做工作，促使大专院校招生 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可以从基层招收大学生，我们这些知青就有 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未来招生政 策很可能会有反复，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

招生条件和方法就做了好大调整。如果哪天说不招生了，没走的 人也许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劝近平说：“近平，你可要想好了， 74年这是个

机会。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不再允许招生，你可 就上不了大学了。”近平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我本来 就是个农民！”

四十多年以后的一个机会，近平和我谈起当时他思想转 变过程。他说，当年他思想上准备在陕北当一个农民，并非虚言。 当他下决心回梁家河挑重担前，曾长时间躺在土地上，望着蓝天， 下决心像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我现在分析近平当时的心境：一方面，他确实认为陕西 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父兄战斗过的地方，觉得成为一个陕北劳 动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他对陕北这片土地已经产生了 深厚的感情。近平当时家里压力很大，习老无端受迫害，他们兄 弟姐妹几个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视，天各一方。当时很多人都用异 样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 在黄土地上埋头苦干，老百姓对他很认可、很信任。老百姓保护 他、爱护他、让他当家带领大家向前闯。他深刻认识到，是陕北 老百姓养育和培养了自己，应该有所回报，要为梁家河做点事。

雷榕生：近平当时想留在陕北当农民，除了平生所说的 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迫切地想为这块贫穷落后的地方 改变面貌尽一份力。因为1973年5月周总理陪外宾到延安，看 到延安解放多年变化不大，老百姓生活还这么苦，周总理很难受 甚至流了泪。这件事对延安的广大干部群众影响很大。改变延安 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非常迫切的要求。近平当时受到 的触动也很大，他觉得应该响应和落实周总理的号召，要对得起 陕北的老百姓。

雷平生：确实是这样。当时生产队也需要敢想敢干、眼 界开阔的年轻人带着社员们闯一闯。当时近平自己又有这个决 心，想要挑这个重担。后来他也确实挑起了重担，给梁家河带来 了巨大的变化。

采访组：习近平成为梁家河村支书以后，都给村里做了 哪些实事？

雷平生：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 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信，希望他们在 粮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农科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一 大包蔬菜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种子后，专 门拨出一块地来试验种

植。那些菜产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 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种子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刚到梁家河的时候， 大队书记梁玉明曾安排他到县里制种站去学习良种培育工作。制 种站把种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队。近平对这项工作 很认真、很投入，积极学习育种知识，还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 他回到窑洞里，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有关制种的知识，父系1号、 子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杂交为什么会有杂交优势，等等。 近平对这些知识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给我讲得很详细，也讲得津 津有味。

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 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陕北地区， 川面上的水浇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量也 比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 少雨，而且雨水一来，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 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经过调查，知 道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 但是泉眼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 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时候刚当 村支书不久，他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当时近平、 武玉华、梁玉明，还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线。我们往下挖，越 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湿，但是因为达到一定深度，铲子就很难施 展开了，于是我们就在外面搭了一个井架，上了滑轮，近平跳下 去继续挖，他挖一阵儿，我们也轮着下去替他。那时候天气很冷， 我们当时都穿着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还不断往下 掉土，弄得我们头上也都是泥。经过努力，水源终于找到了，有 一个胳膊粗细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来之后，我们要把水留起 来，就要在这个位置打一个小坝。那时候天气很冷，冰和土冻在 一起，如果冰压在土底下，过段时间天气转暖后，冰一融化就会 把坝渗穿，所以我们必须用老镆或镐头把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 基建队的婆姨和娃娃比较多，男壮劳力就只有我们几个，那时候 天很冷，基建队社员站在边上，怕踩在冰水里冻脚，就不往下走。 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镆和镐头使劲地一下一下挖。武玉 华是个挺豪爽的人，也善于做动员工作，他朝大家喊：“你们看， 习书记都已经下去了！ 他是外面大地方来的知青，都这么能吃苦! 我们给自己家里修坝，咋能不出力呢丨”武玉华喊罢，也跳了下 去，和近平一起挖。这时候，大家也都被带动了起来，下去用力 挖，把残冰清理出去。

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 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

办沼气的事情，我也比较了解。近平当时是到四川遂宁 县学习沼气技术，还请一位技术员到梁家河来帮忙。这位技术员 是泥瓦匠出身，怎么调水泥，怎么防砂眼，怎么防漏气，沼气池 用什么样的规格，外面的石板怎么箍，他都很在行。但是，这个 师傅干了一段时间，在陕北各方面都很不习惯，就想回四川老家。 他前后经过了几次思想动摇，就是想回家去。近平反复给他做工 作，解决思想上的负担，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这位技术员最终 没有半途而废，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

采访组：在插队这七年中，习近平为人生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系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您认为他系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的原因是什么？

雷平生：在农村的这七年，是近平人生道路中最重要的 阶段，这个阶段对他的整个成长、成熟、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近平能够走好人生的第一步、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这七年努力拼搏，自强不息， 刻苦磨炼，这是他成长的重要内因；另一方面，外部因素也很重 要。展开来讲，我认为，他的成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条，是近平在下乡期间一直坚持劳动，坚持自我磨 炼，坚持学习。我和他在梁家河一起六年，目睹了他在各个方面 的不懈努力，自强不息，见证了他扎根农村的整个过程。

第二条，是党组织的培养。从梁家河大队，文安驿公社 直到延川县，各级党组织对近平的关心爱护，是他成长的重要基 础。这包括前面我讲过的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等人对他的关

心、爱护、培养，对他的激励和帮助。

第三条，是陕北老乡的关怀教育。近平自己也曾经讲过， 他在最困难的时候，陕北老乡收留了他，养育了他，教育了他。 群众对近平的关爱，使他对农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

第四条，是家庭与环境的影响。习老和齐心阿姨对近平 的言传身教、不懈督促，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

对他影响较大的还有一个人，在农村时经常听他提起来， 就是近平的大姨齐云阿姨。近平几次给我讲，他得到大姨齐云阿 姨的关照，聆听到大姨的教诲。近平最初会对大姨讲陕北生活的 艰苦，那里的条件多么恶劣。齐云阿姨是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 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对农村生活非常了解。她在抗日战争时期， 战斗在抗日最前线晋察冀根据地，那里是日伪和八路军犬牙交错 的地方，斗争形势十分险恶，随时会有牺牲的危险。齐云阿姨对 近平说："那个时候，只有坚决依靠老乡。找到老乡，才能坚持 斗争，坚持生存。哪有嫌弃农村生活艰苦、农民落后的道理?如 果那个时候离开老乡，共产党员一天都活不了。"近平回来以后， 把大姨对他的教诲也转述给我听，由此可见齐云老人对他的影响 非常之大。

近平成长过程中，家风的影响潜移默化，十分深刻。在 1972年他的家庭最困难的时候，近平的姥姥去世。在他们全家 沉痛参加完老人追悼会后，我在新街口他们家中看到了心情沉痛 的齐心阿姨、桥桥大姐与近平。桥桥大姐见到我后，向我介绍了 追悼会的情况，还充满激情地为我背诵了表哥魏北陵为老人写的 悼词："在抗日烽火燃烧的关头，老人带领全家，毅然走上太行， 投奔革命，参加八路军"，慷慨激昂溢于言表。在这样充满追求 进步的豪情、充满正能量的家庭中，近平所受的熏陶，对他成长 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还应当提到近平在八一学校读书时的两位老师：陈秋影 与齐荣先。这两位老师都先后担任近平初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 师。近平在窑洞里也几次讲给我听过，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 她们都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嘱咐近平：要相信党，要守纪律，不要 对老师做不恰当的事。这些提醒与告诫，在当时十分难得可贵。

"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下）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2017-03-03

07:00:39分享复制打印

采访对象：雷榕生，1949年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 8月出生。兄弟二人与习近平同为北京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1 月13日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雷榕生分在 梁家塌村，1973年9月上大学，先后在延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 局、北京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工

作，2010年6月退休。雷 平生分在梁家河村，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1974年10月上延 安大学。1977年毕业后在北京市科委营养源研究所工作，1983 年至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学习和工作，获得 法国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7年1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习近平酷爱读书，这一点众所周知。您也喜欢 读书学习，和习近平在同一孔窑洞住了大约六年时间，而且和他 在读书学习方面有很多交流。请您讲一讲习近平读书学习的特点 是怎样的？

雷平生：学习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 近平思路宽广，思想活跃，分析问题能力很强，这同他刻苦读书 学习分不开。他在陕北农村劳动期间，数年如一日保持着刻苦学 习的习惯。据我了解，近平读书学习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他勤奋好学，到了夜以继日的程度。正如有些老 乡所讲的一一有个针缝的时间都要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白

天去山上劳动，晚上回家一有空就看书。后来，大部分知青离开 了，窑洞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在炕上有各自的床位，中间 隔着一个炕桌，炕桌上有盏煤油灯。白天干了一天活就已经很累 了，晚上吃过饭，我如果觉得累，就睡觉了。而近平吃过晚饭总 是又拿起书本，开始学习。他怕影响我睡觉，就把灯移到一旁， 用身体挡住光线。他看书常常到非常晚。有时候，我半夜醒来， 发现近平还在看书。就问：“近平，你怎么还不睡呀？ ”他总是说:“再看一会儿。”有一次白天聊起天来，他和我调侃说：“昨晚看 书至深夜，四周寂静，颇有些‘世人皆睡我独醒’的味道。”还 有一次他颇有感慨地说：“农村知青生活可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 劳动高度结合呀！”事实的确如此，白天劳动强度大，人已经很 疲劳，每天吃得也不好。回窑后再长时间阅读，大脑高速运转， 对体力和脑力都有很大的消耗。

第二，读书注重分析对比。一方面，近平会就一个观点、 一个史实找出很多相关的参考书籍来阅读比较，从不同的侧面去 了解和分析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也 会跟别人进行讨论。他看书经常是几本书同时看，有所对比，有 所分析，不但比较几种说法的同异，也推敲作者为什么这么说， 正所谓“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比如，他在学习苏联历史 学家谢缅诺夫《中世纪史》的时候，就参考了不知从哪里搞来的 一本《基督教青年读本》一起看。由于我们

当年接受的教育，对 基督教没有多少了解。近平在学习这方面知识时，比较全面地了 解了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作为基层群众信仰的宗教被罗马当权 者镇压的历史。这就是他在看书时不断扩展参考资料所起到的作 用。

雷榕生：近平这个读书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他经常是 以看一本书为主，同时又寻找相关的书籍作为佐证，不断地扩展 阅读书中的知识。比如他看中国历史，就是先以范文澜的《中国 通史简编》为主要读本来学习，但在学习中发现史学家不同观点 时，就以钱穆、吕振羽等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书籍来互相印证， 互相对比，深入理解。这样学到的历史观点，是一个立体、全面 的观点。既掌握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不同点，也养成了从不同角 度观察分析问题的习惯。

雷平生：确实是这样。近平在了解不同学者的观点后， 非常喜欢自己思考。他经常问我："这本书，你看过没有？"如果 我看过，他会就某一个观点与我进行讨论。他对讨论切磋推敲印 证那些重要的知识点非常有兴趣。虽然我们那个年纪所讨论的问 题未必有多么深奥、多么专业，但确实起到了活跃思想、拓展思 路的作用。

近平曾有一次外出，住在集体宿舍，碰到一位中央党校 党史专业的年轻教师，他们讨论起了五四运动。近平那次与这位 年轻教师交流，就注意学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回来以后，他把自 己的心得讲给我听。

他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 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对其爆发原因 有很多成型的论述。但那次和党校老师的讨论中，他又搞明白了 一个关键点，就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是国内矛盾集合与爆 发的产物，也是国际矛盾集合与"催化"的产物。在一战结束后 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 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是 完全正当的，但巴黎和会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竟然决定将 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哪有什么"公理战胜强权"！ 世界依然是强权政治，中国被"世界所接纳"的希望彻底破灭。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众首先是先进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对西 方阵营极度失望之余，反帝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把视线转向刚刚 进行过"十月革命"的近邻苏俄，希望用激烈手段改造中国、改 造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 个政治事件，都与上述国际大形势以及民间舆情、民众情绪密切 相关。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迫使中国人喊出"打倒列强，打倒军 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救

亡口号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平声情并茂地给我讲了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国 际联盟、巴黎和会、英国和法国的态度等内容。今天我们的历史 知识大大丰富了，这些可能都算是常识了，但在书籍和信息比较 匮乏的年代，对于知识饥渴的我们，听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这 说明近平是多么注意吸收新知识。

采访组：请你们谈谈习近平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

情况。

雷平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些经 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 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是要求和鼓励学习的，也是近平反 复阅读学习过的。他曾就《国家与革命》里阐述的一些问题，与 他认识的朋友探讨。其中一个问题是，共产主义有初级阶段(社 会主义)和高级阶段。高级阶段即进入共产主义阶段。那个时候， 国家将逐渐消亡。那位朋友和近平讨论，国家是如何消亡的？是 阶级斗争逐渐平息，大家都踏踏实实地搞生产呢？还是像现在这 样，斗争时起时伏，七八年来一次，甚至有时候还会很激烈呢? 现在看来，讨论的话题本身并不重要，也不可能深入。但通过这 种讨论，使他活跃了思想，也使他对当时很多“左”的做法有了 新的认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家处于动乱之中， 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近平逐渐对这种长期无休止激烈

的阶级斗争有了疑问，引起思考。

近平每次去“五七”干校探亲或外出，总能带回来一些 新书。有一次，他带回来厚厚一本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 论》，躺在炕上专注地阅读。过后，他对我议论起这部著作。他 谈了很多关于《资本论》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识，并说《资本论》 的翻译版本研究很重要，他特别推崇郭大力和王亚南这个译本。 他介绍道，这两位翻译家同时也是社会学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译 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到中国来，他们一生都在做这件事。近平 讲到他们的执着和毅力，即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矢志以恒，一以 贯之，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他对这两位学者非常推崇，不 仅推崇他们的学术造诣，更推崇他们的高尚人格。

近平对马列著作版本沿革是很注意的。有一次他议论起 《共产党宣

言》中译本问题，说到这部著作有从俄、日、德、英、 法不同语言翻译过来的中文本，很多学者对此都有不同贡献，但 又各有侧重。他们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理解不尽相同。他感 慨地说：这么一个小薄本经典，就有这么多名堂，可见认识真理 很不容易。

近平读哲学书籍，主要还是读马列主义哲学。他下了很 大功夫去阅读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前不久，我在 电视上看到近平在一个场合讲解辩证唯物主义，讲到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年在窑洞里近平学习辩证法的时候，也曾谈 起过这个问题，即不要把辩证法简单化。矛盾的不同侧面是不可 分离紧密联系的，互相作为存在的依据。辩证法的精髓固然是对 立统一规律。但实际上，对立统一除了对立还应考虑统一，唯物 辩证法本身就包含事物的互相关联与事物的发展，还包括否定之 否定、质量互变等规律。简单孤立地谈问题一个方面而不顾及其 他方面因素，肯定是有片面性的。如果认为辩证法的内容仅仅就 是一个“斗”字，就把整个问题简单化了。

由于近平较长时间生活在中央党校这个环境中，对六十 年代中期开始的对中央党校杨献珍、侯维煜“合二而一”理论的 批判过程有所了解。他还告诉我，在这次批判运动中惨遭迫害的 党校哲学教师黎明，就是我们八一学校66届学生黎小路同学的 父亲。

采访组：请你们谈谈习近平研读历史著作的情况。

雷平生：我们初到梁家河时，还只有初中生的文化程度。 初中课程里并没有讲过世界史。近平在阅读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的时候，涉及到不少名词和事件，都与欧洲历史相关，看到 以后觉得很生疏。近平就找到苏联出版的《中世纪史》来看。这 部书他好像是从当地一位教员家里借到的。在这本著作中，从东、 西罗马帝国，从查理大帝，到法国、德国、英国的近代雏形，都 有相对完整的讲述，这本著作也讲到了东方各国历史的演进和变 化过程。通过对这部书的学习，近平对欧洲诸国的发展史有了初 步认识。

近平还有一本常用的工具书《新编新知识辞典》，1952 年出版的，这是一本非常厚的工具书。辞典里面收录了大量重要 词条，并有简要清晰的介绍。比如像“神圣罗马帝国”“苏沃洛 夫”“二月革命”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近平在阅读其他著 作时，经常习惯拿这本书作参考。

近平对中国经典古籍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史记选》《汉 书选》《后

汉书选》《三国志》，他都曾花功夫认真研读过。

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作，近平也读过很多。比如评 法批儒运动时流行的一本书，即中山大学杨荣国先生所著的《中 国古代思想史》，近平当时也买了一本，兴致勃勃地阅读。这本 书把儒家、法家介绍得深入全面。当然，抛开当时对中国古代儒 家和法家各个流派哲学思想褒贬不谈，作者介绍了这些学派的基 本观点，以及在古代中国社会如何存在发展、如何推广演变的历 史事实，使近平对相关内容有了清晰的了解和掌握。

采访组：习近平读过大量文学作品，他不仅读书多，而 且对文学有很高的鉴赏力。你们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雷平生：好的。近平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他读过《离 骚》，读过《古诗源》，读过《李白诗选》《三曹诗选》等。他很 喜欢曹孟德作品的悲壮苍凉，喜欢建安乐府感情真挚、朴实无华、 气势雄浑的风格。对于词作，他更喜欢读辛弃疾。有时他读古典 诗词读得兴奋了，就跑到院子里大声朗诵，有时在山上劳动的时 候也会朗诵。他的记忆力很强，读过后喜欢的诗词大多都要背下 来。若前一天晚上读到了他喜欢的诗词，第二天他就会背给我听。 一方面是他确实喜欢诗词的韵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考验自己的 记忆力。我作为听众听他背诵，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总体上看， 他对诗词比较偏爱慷慨激昂、豪放自信的。当然，像李白那种飘 逸浪漫型的，他也很喜欢，李白那首《将进酒》我就听他背诵了 多遍。

这些中国古代优秀作品，让年轻的近平更加深入地认识 了我们这个国家，领略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了解了中国的历 史变迁。这些作品给他带来强大的正能量，培养了他对祖国的热 爱之情。可以说，近平后来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 建立在他对祖国优秀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今天， 近平讲话常常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他 影响之深。

近平读过的外国名著也非常多。近几年他在访问俄罗斯、 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时，都曾提到过他所读过的这些国家的

优秀文学作品。他所列举的，都是他认真读过的作品。我印象中， 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他都很喜欢读。他 来农村时带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个大部头 著作四卷

本，我们几个分开看。你看第一本，我看第二本，有时 候进度不一样，接不上了，我们就互相询问，故事情节是如何发 展的。当然也有一边干活一边谈论小说情节的时候。《九三年》 也是近平很喜欢的一本书，他经常和我们讨论法国大革命狂飙时 期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战争与和平》《一九一八》《悲惨世界》 等，都是近平非常喜欢的人文色彩很浓的名著。通过阅读这些外 国名著，近平的思维和视野得以开阔，心灵得到滋养。

在“文革”中，因为文化思想方面条条框框太多，书籍 匮乏，每个人的心灵都像荒漠。后来随着政治形势变化，逐步有 一些宽松，某些被主流“认可”的作品，如《鲁迅全集》等都可 以出版销售了，但毕竟还是有限制的。近平仔细认真地读了《鲁 迅全集》收录的几乎全部杂文。记得他曾给我介绍鲁迅杂文集《且 介亭杂文》，是“租界”两字各去掉半边，鲁迅当时住在租界地 旁边，就称自己的住所是“半殖民地”的地方。我还清晰记得， 近平有一次谈起鲁迅与胡适、陈西滢“现代评论派”论战中，徐 志摩发出“带住，让我们对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 ”妙论 时的声情并茂。

采访组：习近平在一些场合提到过他读军事和国际政治 著作的情况。这些著作，对于他形成军事知识，了解国际政治和 国际关系，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请你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雷平生：确实，近平读过不少有关军事和国际政治的著 作。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我们下乡时，都带了一些书，其中近 平带了不少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由于家庭背 景的缘故，我带的书主要偏重历史和军事方面，其中值得一提的 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翻印出版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的书籍。 这套书籍的翻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为了拓 展我军高级指挥人员的视野而委托总参组织翻译出版。这套书包 括《罗斯福见闻秘录》《隆美尔战时文件》《太平洋战争：岛屿战 争》等。带到延川农村的书中，还包括当时能得到的国外军事名 家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战争论》等，还有中国 的军事论著，包括《中国古代军事理论选集》《三十六计》等。

对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与作战方法，近平特别注意学习， 有比较广泛涉猎和深入领会。比如《毛泽东军事文选》，这是军 科院编辑的毛泽东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发表的军 事论著。近平对其中的若干重要著作潜心研读，特别对毛泽东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题》《十大军事原则》等关键文章反复 阅读，以求贯通。在学习中，不仅要搞清毛泽东讲了什么问题，

是如何阐述问题的，还要搞清楚为什么要这样提出和阐述问题， 特别留意当时论述问题的时间、地点和针对性。1972年之后， 随着国内批林批孔政治运动的开展，报刊上也发表了众多有关辽 沈战役的文章。他结合这些文章，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有关辽沈 以及淮海、平津战役的指导原则等重要材料，对于三大战役中关 键步骤和过程，如“关门打狗”“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小淮海 和大淮海”“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等战役举措处置心中明 了，耳熟能详。

毛泽东军事思想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积极争取主动。不 是被动地受对方制约，而要发挥己方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充分发挥不对称战争手段，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有人总结出三句 话：对什么对手打什么仗，拿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 什么仗。充分领会这样的博弈思维、战略思维，对近平形成科学 的思维方法，启发应该是很大的。

研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名著《战争论》，给近平留下印象 最深的是作者对于“慧眼”和“军事天才”的描述。《战争论》 是一部举世闻名的战争理论著作。解放军一些著名高级将领如刘 伯承、叶剑英等，都对《战争论》中的精辟论述了如指掌。抗战 时期，毛泽东更是要求全军认真研读，并要求对《战争论》虚心 求教，不得有丝毫懈怠。《战争论》在中国的知名度不亚于《孙 子兵法》。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慧眼”，是指“在茫茫的黑暗中仍 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以及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 进的勇气。前者被称为眼力或慧眼（法语：coup d'oeil)，后者 就是果断”。一个具有“慧眼”素质的军事指挥家，有能力在复 杂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条件下高瞻远瞩看待问题、分析局势， 带领国家与军队取胜。当然，那个时候的近平，还只是一名身在 农村的普通知青。然而，那时涉猎这些著作，对他的启蒙、对他 以后的成长，无疑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1969年 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苏军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 1969年10月，全国进入战备状态。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军事， 注重战争，准备打仗”。我们在带来的书籍中，也有一些反映苏 联卫国战争的军事著作，如《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苏军战术的发展》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役》（上、中、下册和图册）等。出 于熟悉苏联军队的战略战役思想和作

战模式的目的，近平花费了 不少时间仔细阅读了这些书籍的重要部分。他高度赞许反法西斯 战争初期，苏军官兵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以及后续的莫斯科战役中 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意志、高度责任感和大无畏牺牲精神。那句 “祖国虽然辽阔，但我们退无可退，背后就是莫斯科”的豪言壮 语，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库尔斯克战役是1943年苏德战场最重要的战役。苏军由 于这次战役的胜利，掌握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为了详细了解战 役的具体进程，他把《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役》图册摊开 铺在炕上，而他则趴在炕上对照文章仔细寻找一个个不熟悉的俄 国地名。这是一项很吃力的学习，往往很长时间才搞清楚一个过 程，随之而来的是进行简单的“兵棋推演”复盘。当然也会有一 些疑惑和问题，会有一些不解和推测。例如：德军早在1943年 4月就发布了战役训令，为何拖延到7月才开始发动这次战役? 苏军最高统帅部是如何判断德军的进攻方向的？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我们不可能知道诸如英国军情六处菲尔比，或者瑞士红色 管弦乐队等为斯大林最高统帅部提供情报的事实，只能猜测统帅 部判断的情报来源于敌后广泛活跃的游击兵团，以及战场敌方俘 虏的信息。我们很钦佩斯大林、朱可夫等对于苏德战场德方战役 方向的准确判断，以及苏军战术的机动灵活(如在战役发起前率 先发起炮火反准备）。

阅读《罗斯福见闻秘录》一书时，近平饶有兴致地注意 到当时的后起大国美国如何在相当长时间内锋芒内敛，积蓄力 量，最终利用矛盾，因势利导，平稳过渡，从守成大国英国手中 顺利得到世界霸主地位的过程。书中详细记录了在这个过程中， 罗斯福总统深谋远虑，有序有为，外交手腕运用得有声有色。在 一连串的重要国际会议中，他一方面坚决支持同盟国英国、苏联 的反法西斯战争，提供物质和军力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双边与多 边会议场合，宣扬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规则，不为盟友英国恢复旧 制，只为美国开创新篇。外交手腕上，借承认苏联斯大林在东欧 与亚洲的势力范围拉拢“斯老伯伯”使“得道多助”的美国始 终处于对英国外交的主动地位。充分运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 占据道德高地纵横捭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句“同盟者就是竞争 者”，阐明了国际政治和大国博弈的真i帝。

近平还读了《太平洋战争：岛屿战争》。这部书展示的是 1943年后太平洋战争美日双方的苦斗过程。在阅读中，他仔细 推敲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美两国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所做的 战略决策预案，比较与估

量了双方战略决策的得失。应该说，在 太平洋战争中，无论是在决策、战争资源的拥有和战争资源运用 能力诸方面，日方劣势明显。特别是对当时大规模海空战争形式 和战法的认识，日方明显落伍很多。太平洋战争中的海空交战， 不能简单看作是一个运用航空母舰和兵舰进行海战的问题。美军 通过科学的运筹、比较和分析，在战争资源运用能力等方面技高 一筹，正确运用了“蛙跳战术”和攻击日方大规模运输船队等行 之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最终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战果。

还值得提到的是，近平还读了美国著名学者亨利•基辛 格早年论文，如《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选择的必要： 美国外交政策展望》（1961)等。通过研习这些论文，使近平深刻 感觉到：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学习型、研究型国家，美国军队也 是一支学习型、研究型军队，美国的智囊政治家也是密切关注实 际的研究型政治家。在国际政治军事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下，在美 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美国都会有具有世 界眼光的智囊和研究型人物考虑和提出如何应对新形势、提出新 对策，及时转变原有政策。如果低估美国政治外交军事的应变能 力和敏锐思维，依然采用旧的想法做法，凭借“想当然”思维来 考虑问题，就会在变化中的国际斗争中处于下风。

现在想起来也有趣，上世纪七十年代近平在贫瘠的陕北 窑洞中读基辛格的著作时，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知青。时过境 迁，2016年12月基辛格访华。此时的近平已是63岁的中国国 家主席，而基辛格则是93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作为中国的 国家主席，近平和基辛格这位资深睿智的国际政治家进行交流， 探讨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的未来，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回味的事 情。

其实，年轻时期的阅读、年轻时期的苦学所能学到的知 识和信息，很多已经变化了，或者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青年时 期所养成的不倦学习精神和良好学习方法，以及通过学习所养成 的思维能力，则可以伴随人的一生，对后来的各个阶段依然起着 作用、发挥着影响。

2010年的一天，我到近平家做客。晚饭后，他拉我到他 的书房，指着书架说“平生你看，当时你留下的书还都在这里。” 确实，那些有关军事和历史方面的书，依旧静静地保存在他的书 架上，只是陈旧了许多。我下乡所带的那些书，在离开梁家河时 基本都留给了他。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他依然保存着。当时之 所以把这些书留给他，是因为不知道他可能还要在艰苦的陕北农 村坚持奋斗多久。留给他这些精神食粮，可以使他能够在艰苦的 劳动和工作之余继续学习。我还注意到，

这些书架上还有大量新 书，有些还是学术分量很重的书。我确信直到今天，近平依然保 持着40多年前养成的学习习惯，在处理完繁忙政务后继续读书， 不断从书中汲取新的精神养分。

采访组：最后请你们总结一下，习近平能够从一名普通 知青成为梁家河大队的领头人，他有什么样的特点？

雷平生：近平的特点非常明显。我觉得突出的有四个方 面。

第一，强烈的使命感。与近平接触，你能很直接地感受 到这一点。人要成长，要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首先就要有使 命感。在农村七年，近平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要 为老百姓办实事。体现这种使命感的证据，我认为有两条：一是 近平在梁家河经过数年苦难和磨炼，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 看作是黄土地的儿子，并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所 以直到现在，他仍一再提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福 扯。二是强烈的忧患意识。近平喜爱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 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忧患意识，最初 是环境强加的，环境使然。因为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他父亲受 到迫害，使他忧虑自己的家庭，忧虑自己的前途，这些是他肯定 会忧虑的。经过在梁家河艰苦生活的磨炼，得到陕北人民的感召 与信任，他的忧患逐渐过渡到要考虑生产队、考虑大队的事了。 这时的他，忧虑全队的生产与生活，考虑如何解决粮食翻番的问 题，也就是已经由从小我出发的"物喜己悲"，转变为对群众利 益的一种深沉忧患了。

第二，辩证思维方式。近平看问题习惯从多方面考虑， 运用辩证思维方式，针对一个问题进行多角度反复推敲，互相印 证，而不简单只从一个方面刻板地考虑问题，更不自以为是。这 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第三，遇事有定力。不论大事小事，近平遇事沉着淡定， 始终保持情绪冷静。他曾几次与我说过他很喜欢曾国藩的一段 话："愈是军情棘手，众议纷纭，愈要心明力定，从'耐烦'二 字痛下功夫。"做大事者要具备冷静的心态和自控能力，这样即 使事务再紧急，也可以条分缕析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在与 近平接触中，他不止一次对我谈到智商与情商的关系。他认为， 智商是重要的，而情商则是关键，尤其是做大事者。

第四，肯读书善学习。我注意到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 期间，曾多次就读书学习发表讲话，有谈为什么要加强读书学习 的，有谈读书学习方法的，也有谈具体读什么学什么的。他说过: “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 靠学习走向未来。”我知道，他说这个话是由衷的，是从自己读 书学习经历中得出的深刻认识。

“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2017-03-06

08:04:14分享复制打印

采访对象：陶海粟，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 川县段家圪塔大队插队，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县团 委书记和公社书记。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中 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兼中 国公司董事。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7年2月8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您是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请问您和习近 平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陶海粟：我是1971年从插队的村里被招聘为县上干部的。 记得是1972年，我作为县上派驻文安驿公社上文安驿大队的工 作队队员，参加了八九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其间，听人说这个 公社梁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里，有习仲勋的儿子，还有雷英夫的 两个儿子，表现都不错。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 传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结识一下他们的。

虽然当时他们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 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 上山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中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 见得太多了。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人体育场

举行的批判大会，江 青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地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 经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 的主席台上(余当时是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的）。这让我哭笑不得， 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

“反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了。

有一天我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 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他们三个正好都在。当时， 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部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 没走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我进 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 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 党宣言》打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 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的签名。当时我暗自 称奇，心想“共产党的干部里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 ”有这样的 干部，他们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

采访组：当时他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陶海粟：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 习近平当时只有十八岁，比雷氏兄弟俩分别小四岁和两岁，但他 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 咋呼张扬。我认识近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刚下乡时曾有过的 一段迷茫徘徊阶段，心态比较稳定了。

从那以后，尽管交通和电话都很不方便，我和他们还是 尽可能保持着联系。有机会时，我会到梁家河看他们，他们到县 里办事，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那时业余生活非常贫乏，我 和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 多的话题有这么几个：一是听他们讲他们父辈的故事。例如有一 次，习近平对我们讲起解放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 问题的故事。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内地的经 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这 类故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 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 他对父亲深深的爱戴之情。

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 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东 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 要渠道。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 息”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多讲少。那时的 “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他们几个 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 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 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 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三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的很多细节记不 清了，但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的《世界通史》时，议论到 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地大谈“锤子阿炳”这 个人物，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 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 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 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 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 语言。

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 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 也不是怀抱“防修反修”、把自己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 去农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己，没有其他路可走。习近平和雷氏 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 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为当时少管 所人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榕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 里关着，丧失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 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 的解脱。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是军 事院校的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 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 报名参军，当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 我：“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 ”另外还有十几个北 京工厂的招工名额，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 子弟没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 了。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称 自己为“受苦人”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 敞开了心扉。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

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 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 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因此，虽然在那里过着近 乎原始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 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 世，总要干点儿什么，做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革命 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 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们 那些“修齐治平” “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

第三个共同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 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时很 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 此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 脑。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掌控的。1972年时 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 一个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直到 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 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 我也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 情，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 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 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 的事情尽量做好。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 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 部书记，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 部书记。

采访组：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陶海粟：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经不 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1973年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 当时县团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 平。刘云清说：“可不敢！（陕北方言，意为“可不能这样做！ ”） 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

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成分”都 是由过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所以即便父辈没有 务过农，但祖辈的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 样成分的人当县团

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如果县团委干 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 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

1973年下半年，我当了县团委书记。几个月之后，延川 县委开始酝酿筹备，计划继1972年对部分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 线教育活动之后，在来年开展第二批活动，抽调县社干部组成工 作队，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到另一批大队去蹲点整顿。当时的冯 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是县委安排的第二批预定进驻的大队之 一。因为赵家河原来就是我们县团委蹲点的大队，所以县里让我 们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我被任命为队长，还需要一个队 员，这个队员可以是脱产干部，也可以是不脱产干部。这时我又 想到了习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 赵家河大队开展工作。习近平说："我还是团员，不是党员。"我 跟他说："没关系，县上并没要求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党员。"他又 很实在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我说："没问题， 我是队长，出了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 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我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工作方面考 虑，我们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给县团委的整顿大队工作搞得好 一些，我了解习近平的为人和见识，相信他能胜任。第二是从他 个人方面考虑，我非常想给他创造一个"锥处囊中"的机会。因 为创造条件使他发挥才干，才能让县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 推荐上大学或是当干部，机会都会更大些。

到赵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经过县上和公社必 要的会议和培训，1974年春节过后，各个工作队就开始进驻各 自的大队了。我当时因为县上还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习近平就只 身先去了赵家河，那个时候他是二十岁。我过了几天才去。

采访组：从您的角度来看，他在赵家河干得怎么样？

陶海粟：曹谷溪在他的访谈中已讲过习近平在赵家河修 厕所的故事，这确有其事。习近平曾说过知青在农村要过四关， 我看厕所关可以作为第五关。赵家河大队公窑外面的厕所，过去 非常简陋，又脏又臭，难有下脚之地。我比习近平晚几天到赵家 河，一到大队部外就看见他正在修那个厕所。我当时还觉得有些 惭愧，因为我之前经常来村里住这孔公窑，却从没想到要把厕所 修一下。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 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 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 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还讲着一口比我地道的陕北 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 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 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 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 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六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 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 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指导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 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 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不同意，把 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支部书记。

习近平在赵家河带领群众办识字夜校、打坝以及他和群 众的密切关系等等，你们采访的赵家河村民已经说得很多了，我 就不再重复，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另一方面的事情。那时“文革” 正处于“批林批孔”的高潮时期，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路线教 育”，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所谓的“大批促大干”“堵不 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但我和习近平在赵 家河期间，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到什么“阶级敌人”，也看不到什 么“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包括我们共同工作期间和此后习近平 独立负责期间，我们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也没有斗争过任何人。 当时农村各个地方通行的做法是，即便没有明显的“阶级斗争” 迹象，但只要某个时候需要营造斗争气氛了，就会把村里地主富 农成分的人拉出来揉搓一遍，这些人永远是一些人搞“阶级斗争” 的现成靶子。赵家河虽然也有过去的富农，但岁数都很大了，而 且都是老老实实干活的人，我和习近平觉得无故欺负人家是没有 道理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

那一年，按上面的说法，最大的阶级斗争任务就是“批 林批孔”。可是老百姓对那些“抑孔尊法”“抓现代大儒”之类的 东西，说实话根本弄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多 打粮食，吃饱肚子。幸亏当时还有另一句大口号是“抓革命，促 生产”，所以我和习近平在队里的工作，对“批林批孔”之类的 不过是支应一下，主要精力还是花在了“促生产”上。

我现在仍然记得一件事。有一次我和习近平，还有赵家 河的干部及部

分社员，到公社所在地参加一个全社规模的批判大 会，邻近一个生产大队的社教工作队送去的批判对象是几个队干 部，他们的罪名是“不重视妇女工作”。大会上，他们几个低着 头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当时我和习近平都感到很不理解，我们俩 议论说，不重视妇女工作，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用得着 采取这样的办法整人家吗？我当时和习近平说“我真想上台去把 他们的批判会冲了！”习近平跟我说：“不要不要。”当然我也只 是说说气话而已。

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还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差点儿把他 自己搞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那是他熟悉的一个文安驿公社干部 有事到冯家坪公社来，见到了习近平。习近平托他回文安驿时把 一封信捎给雷平生。没想到这个干部私自拆了信，见到里面有议 论江青的内容，威胁要告发。这有可能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因 为在知青内部的圈子里，议论讥讽江青其实是家常便饭，谁也不 会当回事，但是地方上的干部对上层的斗争没有多少概念，也没 有接触这方面信息的渠道，所以会把这种事当成反对“文革”、 反对党中央的了不得的大事来看待。后来通过共同朋友在中间做 工作，给那个干部送了两件在当时比较稀罕的军大衣才算把事件 平息了。这也算是习近平在年轻时代经历的一次惊险的“淮阴之 辱”吧。

习近平从赵家河回到梁家河时，雷氏兄弟都已经先后上 大学走了，他成了村里唯一的北京知青。但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 他的生活更忙碌、更充实。1975年在梁家河开沼气现场会时， 我也随各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去参加了。看了他在村里搞的沼气， 确实有模有样。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沼气这个事是很难搞的， 因为那时燃料稀缺，做沼气所需要的秸秆之类大都被做饭取暖烧

掉了；当地土质疏松，群众又买不起水泥，渗漏问题也很难解决。 在其它公社（包括我当书记的公社)推广沼气的阻力很大，大多是 敷衍应付，虎头蛇尾。而他们村里办的沼气还真的把一些农户家 的灯点亮了。可见习近平在这上面付出了很多心血。

习近平对于他在赵家河整队的这段经历是很珍视的。我 1992年去福州看他和2008年在北京见他时，都是先和他的秘书 聊天等待，这两任秘书都对我说，领导跟他们说起过，在延川赵 家河参加整队工作，是他走入政界的第一步。2009年，到延川 插队四十周年之际，我回访了赵家河，给我们当年住过的窑洞及 现在的村貌、当年一起栽种现已成林的树木、村里老乡等等照了 一些照片。回京后我通过习近平的秘书告

诉他，想把照片及当地 的一些土特产送给他，他答复说：“照片送来吧，土特产就不必 了。” 2012年他请几个清华的同学和我一起吃饭时，很带感情地 向他的大学同学讲述了在赵家河工作的前前后后，还开玩笑地 说：“我当时是个团员，整队结束时却把一个三八年入党的老支 书换下来，让一个年轻人上了。”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前后的事情。

陶海粟：1975年大学招生，习近平填报志愿的时候，三 个志愿填的都是清华大学。当时因为他上大学的事，在推荐过程 中经历了很多曲折，这方面其他人已经讲的不少了。但推荐上去 是一回事，后面还有关口，到底能不能上还是未知之数，谁也不 能给他打保票。在这种抉择的当口，他做出三个志愿都填清华的 选择，表现了独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设计上的理念。他这么做， 加大了能不能上大学的不确定性，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 是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农村继续干下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 的事。他不像很多人那样，把待在农村看得凄凄惨惨戚戚，能有 离开机会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顾得上挑挑拣拣呢。经过七年的 磨练，他在这里已经有情似亲人、贴心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经有 殚精竭虑、日思夜想的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又有什么呢? 在他被批准上大学、梁家河乡亲们依依不舍他离开时，他甚至跟 乡亲们说出过“要不然我不走了，继续留下来干”的话，我相信 那是肺腑之言。

习近平临走之前，我正好在县上开会，和他在县委招待 所里话了别，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出了门目送他穿着洗得发白 的旧军装远去的身影，心里有一丝怅惘，但更多的是为他走上了 人生的新阶段而高兴。不管等待着他的前路是什么，我相信他是 做好了准备的。

采访组：他上大学时你们有联系吗？

陶海粟：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第一 次招生考试，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 校后，不久就去清华大学找习近平。他把我带到学校附近五道口 一个饭馆吃饭聊天。当时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 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布了“文革”的结束，但仍然坚持 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我们俩那天的长谈中， 基本上都是在谈论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大事情，也谈到了他毕业 后的去向问题。他明确表示，他不准备做和化工专业相关的技术 性工作，还是要进入政界，继续在陕北农村就早已立

下的志向， 做一些更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情。

习近平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曾担任过陕西渭南市 长的仵西居，在2012年那次和习近平一起吃饭时和我相识，此 后我们来往很多。他曾经和我说起过习近平和他同学时的一些事 情。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大班，后来大班分成两个小班，习近平 任其中一个小班的党支部宣传委员，他是组织委员。他说习近平 在清华时的生活特别简朴，同学三年多，他从来没见习近平穿过 新衣服，使他感到很惊奇，因为仵西居自己是从农村来的，有时 还会穿新衣服。他还说，习近平在学校时，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 政治经济类书籍。那时候，仵西居从家里带到学校一本亚当•斯 密的《国富论》，近平见到后就跟他借阅，后来仵西居就把这本 书送给他了。他还特别讲到，习近平在政治上也非常稳重成熟。 当时，清华大学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四人帮”对清华管 控很严。1976年发生的纪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 五运动”期间，他们班里有好几个北京同学也参与其中，传抄了 天安门诗词。习近平在北京同学里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给那几个 同学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提醒他们要注意策 略，注意保护自己。仵西居是这次事件之后负责清查工作的，正 是由于习近平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几个同学得到很好的 保护，都没有受到伤害，顺利过关了。这次事件以后，“四人帮” 就开始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一轮折腾。当时清华各 级都成立写作组，有组织地写作批邓文章，仵西居询问习近平的 意思，习近平当即就以自己不善写作为借口，拒绝参加。

采访组：习近平担任耿飚的秘书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 到正定工作。您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去基层吗？

陶海粟：1982年初，我快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一天，习 近平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决定要下基层、回农 村去工作。他还说，他向耿飚谈自己的打算时，耿飚曾经挽留他 说，下基层锻炼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战军去嘛。但他还是坚持要 到地方上去。习近平跟我说，他之所以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 工作，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 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陕北干了七年， 知识和工作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 正处在改革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

说了这些想法之后，他还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 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听他说这番话，我很 感动，但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选择从政道路的人谁都明白，虽 然都希望在这条路上能不断进步，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开创更 大的事业，但能否如愿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有各种外在的 环境因素和机遇因素制约，这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当时由 于十年动乱对干部队伍和大学教育的摧残，干部队伍青黄不接， 有一批高干子弟通过特殊途径得到快速提拔，被称为火箭式的干 部，比起下基层，这似乎是一条不确定性较小、快速占据制高点 的路。但习近平不愿意走捷径，他觉得自己虽然做过大队支部书 记，但积累的到底是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练和视野还不够全面， 从县一级起步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这样做，前面的路不确 定性很大，但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习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择和自我设 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 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只要有这一条垫底，而且 为群众做事又是自己的乐事，那么个人前程的不确定性也就算不 了什么了。

我看他下去的决心已定，就对他说：“那好啊，你既然已 经决定要下去，我给你带一个人来，给你介绍一下农村改革的情 况。”我说的这个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邓英淘，他当时是农 村发展研究组的成员，这个研究组主要由在农村插过队的在校大 学生组成，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农村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给中央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习近平同意后，第二天我就和邓英 淘从学校骑自行车又到了习近平家里。那天，邓英淘跟习近平谈 得很投机，给他分析了农村改革的形势，提了很多建议，习近平 听了觉得很有帮助。三十年之后，2012年习近平和我见面时， 还跟我提起这件事。当时邓英淘刚刚去世，习近平表达了惋惜之 情，并告诉我，他还读过邓英淘写的书。

习近平去正定后不久，我也从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中 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工作。几个月后，我记得是夏秋之际，习 近平有一次从正定回北京办事，又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和我聊他 在正定工作的情况。当时我看他情绪很好，谈起正定的各种事情 带着一种兴奋的语调。虽然去的时间还不算长，但他已经对推进 正定的经济文化建设形成了很多设想，其中之一是在正定建一座 荣国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动这个事情有关。

1992年我去福州看习近平时，他和我说起过他在正定任 职时的一件

事。那是在他担任了正定县委书记之后，有一次中央 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邀请了三个县委书记去他那 里座谈，这三个书记都是从北京下到农村工作的年轻干部。会上 三个人分别汇报了所在县经济改革的情况和各自对农村工作的 看法。会后当天晚上，有熟人就打电话告诉习近平，老杜听了三 个县委书记的汇报后说："还是小习讲得最实在。"我听了这个事 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陕北农村共事时我就知道，习近平 做事总是沉稳务实的，他不喜欢"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 方法，而是讲究吃透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2012年时，他在饭桌上还和我们说起，当时有一个外县 的县委领导带代表团到正定来交流改革经验，所有团员都是西装 革履，并且在和正定的干部交流时鼓动正定干部也应该都穿西 服。习近平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他虽然不反对穿西服，但 这终究是表面的东西，没有必要把这作为改革的措施来强求一 律。他还说起与此相关的一件趣事，他刚到正定的时候是县委副 书记，书记是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干部，习近平对他很尊重。 习近平那时经常穿一件军大衣，戴一顶鸭舌帽，有一次老书记请 他到家里，坐在炕头上喝酒，老书记说："你哪方面都挺好的， 就是那个帽子……"习近平听了后，觉得这不是大原则问题，就 欣然听从了老书记的建议，不再戴那顶帽子了。

我的一个朋友吕日周当时是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时曾到正定搞过调研。他最近告诉我，他当年到正定 调研时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普遍对习近平给以很高评价，有的年 纪大的农民说，近平是我们农民的儿子；年轻人则说，近平待我 们就像兄弟一样。吕日周跟习近平在正定谈了很多，他说习近平 当时曾跟他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 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吕日周至今 对这几句话印象深刻。

今天就先谈这些吧。最后我想说几句的是，我和习近平 的友谊虽然延续了几十年，但近距离接触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 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过就从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确实感受 到，为群众做实事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不 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什么被灌输的教导，而是早在陕北七 年里，在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扎着生存的普通老百姓 牵手共度时艰中，就油然而生的、铸入血液中的信念。对他来说， 这不是自己升迁业绩的筹码，而是没有其他任何兴趣能够替代的 人生乐事。毋庸讳言，习近平在陕北的七年正处于我们国家一个 特殊的时期，一个黑白颠倒、美丑错乱的时期。但

是，在延川这 个全国贫困县的贫瘠土地上，却在同时期中走出了习近平、孙立 哲、路遥、史铁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这并不是“文革”的 成果，不是极左路线和乌托邦理论的成果。中国自古以来，不管 是在盛世还是衰世，不管环境多么荒谬，总是有悬壶济世的良医 出现，总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良吏出现，这是我们的民族 能够生息绵延的脊梁所在。我们现在回忆这些青年人当年的脚 步，不是歌颂什么虚幻的口号和运动，而是认可那些在艰难困苦 之中仍然顽强地寻找和实现人生的意义、“男儿当自强”的精神。

2008年我在北京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曾对他说“我跟你 认识这么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关于你的故事写一写。”他当时 笑着对我说：“我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他的话我完全能够理 解。习近平行事低调，从不愿意过多宣传自己，他在福建接受记 者采访时曾说过此前已经拒绝过大概上百次采访。加之现在他肩 负重担日理万机，讲他的故事这样的事确实算不上什么急务。不 过我觉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让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不仅看 到他们在台上作大报告的样子，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甜酸苦辣和 内心世界，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所以，我觉 得中央党校做这个系列采访实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七年知青经历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起点”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 2017-03-10 07:24:58分享复制打印

采访对象：艾平，生于1953年8月，北京清华附中学生。 1969年1月与习近平坐同一趟知青专列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 1973年9月上大学，1977年6月入党，1977年10月起在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非洲局局长、一局局 长、副部长。2013年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9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艾平同志，您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是坐同一趟 知青专列到延川县插队的知青，你们都经历了那个特殊的时代变 迁和农村生活磨练，请您说说到延川插队的情况。

艾平：我确实也是1969年1月13日离开北京，同习近 平坐一趟知青专列去陕西插队的。我们都在延川县，他插队地点 是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

家河大队，我插队地点是延川县关庄公社 二八甲大队八甲生产队。

我跟习近平同岁。他的父亲习仲勋六十年代初就受到康 生等人的迫害，被下放到洛阳接受审查，“文革”中遭到批斗。 这也使亲属子女受到牵连，家庭四分五裂。

我的家庭状况也是这样。我父亲艾知生“文革”前是清 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当时北大、清华都被认为是执行“资产阶级 教育路线”的代表，清华的所有校党委成员都被打成“黑帮”。 我父亲成了“文革”初期第一批被打倒的人，被扣上“走资派” 的帽子。

那个年代，我们都被认为是“黑帮子弟”，被骂成“狗崽 子”，后来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算是换了个比较婉转的叫 法。

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的“最高指示”后，我们这批中学生一起坐知青专列到陕北去插 队。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学校“停课闹革 命”，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让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实 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们这批知青是从北京站上的知青专列走的。有人回忆 说，站台上送行的家长和车厢里的知青哭成一片。后来，习近平 回顾那天的情景时说，当时大家都在哭，他反而笑了。我对此很 理解，因为我感同身受一一那个时候家里的状况无以复加，离开 北京精神压力反而小了。

采访组：到延川一路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们经过几天 到达的陕北？

艾平：我记得路上走了五天，应该是1月17日到的村里。

当时火车速度很慢，经过一天多时间才到铜川，我们在 铜川住了一夜。这样，两天时间就过去了。第三天，我们又坐军 用卡车，从铜川奔向延安。一共240多公里的路程，现在有高速 公路，可能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但当时全都是砂石路，车开得很 慢，差不多走了一整天时间。到了延安，我们这批知青又住了一 夜。第四天，我们继续坐上卡车，先到冯家坪公社，吃了中午饭， 之后步行翻了一座山，到达关庄公社，又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 也就是离开北京的第五天才到了八甲村。

我插队的关庄公社后来出过一个很有名气的知青作家， 叫史铁生。他写过一部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实际上关庄 公社所在的那条川叫清平川，他插队的那个村叫关家庄，他就把 清平川改成了一个村的名字一一清平湾，以此为背景描述了他在 村里生活的情况。

从北京到陕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关庄之前翻过的 那座山。当时我只有15岁，身高不到一米六，见到那座山，真 是觉得耸入云霄。等爬到山顶，我一看，目力所及是无边无际的 黄土高原一一被沟壑切割得七零八落的荒山秃岭，一直绵延到天 边。当时，回想起几天来路途上的奔波，我觉得自己已经离北京 非常遥远了，简直是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世界，心情非常

复杂。

采访组：现在，15岁的孩子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不必为衣食住行担忧。您去陕北插队时也是15岁，请您讲一讲， 农村的艰苦生活对15岁的少年意味着什么？

艾平：我中学上的是清华附中，我们学校那一批有200 多学生被分配到延川县。一个星期之后又有一批，所以清华附中 共有300多人被分配到延川县。延川县的北京知青约有1300多 人，被分派在永坪、冯家坪、关庄、禹居等六个公社，又分别安 置在生活条件相对好一些的生产大队。分派在延川的北京知青， 都来自海淀区，除了清华附中，还有清河中学、五十七中、二十 中、十九中、八一学校等等，这些学校也多有朋友、同学甚至兄 弟姐妹在一个村里插队的情况，这样可以互相照应。

习近平当时就没那么幸运，他小学、中学都在八一学校， 但“文革”中“四人帮”把八一学校解散了，学生大多数分配到 其他学校。所以习近平插队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同学、朋友可 以互相照应。他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本来就不认识，需要在插队生 活中重新认识、重新相处、互相熟悉，再加上面对艰苦的生活和 繁重的劳动，这些对于他这样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确实很有 挑战性。

我和习近平都属于那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因为我们都

是初中六八届的，小学又少上了一年，所以比其他同届的孩子还 要小一岁，都是15岁插队，与那些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知青 比起来，要

单薄瘦小得多，但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开始陌 生而又艰苦的生活。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一样，都是在劳动之余不懈努力学 习，后来又都回到北京接受高等教育。请您讲讲知青当年都是怎 样读书学习、怎样去上大学的？

艾平：我在村里劳动了两年，后来就调到县里的副食品 公司工作了。工作中，经常下乡到各个村去收猪、收羊、收鸡蛋， 差不多走遍了全县四分之三的村子，对整个延川县的情况了解得 比较多。

在我接触到的知青中，读书的情况大致分为四种：有一 部分人受到“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放弃了读书； 有一部分人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爱看理科方 面的书；有一部分人读当时比较流行的马列、毛选;有一部分人读 文史哲。真正爱读书、会读书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广泛涉猎 各类书籍，大量阅读和学习。

习近平非常爱读书，他去插队的时候就带了很多书，很 多知青都讲过他读书的故事。后来，清华大学在延川招生时他被 推荐录取。习近平在延川插队的时间几乎是知青当中最长的，差

不多七年，到1975年秋天才上了清华大学。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所谓“工农兵学员” 1970年，中 央作出《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的批示》。 后来，其他高校也陆陆续续开始招生。这给我们提供了人生中改 变命运的一个关键机会。

清华大学很多干部在“文革”开始时就被打倒。到1970 年前后，清华大学的老干部基本“解放”，虽然没有完全官复原 职，但不再是“走资派”。比如，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 冰被“解放”了，此外还有一些老干部也都出来工作了。这些人 熟悉教育，懂得教学规律，主张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保持稳定 的教学秩序，注重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

那时候上大学，要经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 准、学校复审”四个环节。在1975年那个时候，习近平能上清 华大学，很不容易，大队、公社、县委以及清华的机关干部都是 冒了风险的。

由此来看，我们知青的命运是和国家发展状况密切联系 在一起的。没有“上山下乡”政策，我们就不会到农村去。没有 “招生”政策，我们也不会那么“幸运”能进入大学。

我是1973年上的大学。当时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延 川县的副食品公司工作，就由所在工作单位推荐。像习近平在农

村，他就由所在大队推荐。

我的感觉是，当时招生时中央对陕北的北京知青很照顾。 我记得1972年、1973年给延川县的大学、中专招生名额都分别 有几十个。每年拨下来这么多名额，是为了照顾北京知青。

许多知青一直没有放下书本，一直在学习。我父亲一解 放，就给我写信，让我坚持学习，说在二十世纪如果没有知识， 就不可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

采访组：您在延川插队时听说过习近平的故事吗？

艾平：虽然我和他是同一批到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但 我和他不在一个公社，也不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在我到县里工 作之前，我的生活圈子就是本村社员和外村清华附中的知青。 1971年3月18日，我被招工到县上的副食品公司，离开了村里。 到了县上，我开始接触其他学校的知青，包括文安驿公社的，就 听说了一些习近平的故事。

在这个阶段我结识的知青中，有两个是文安驿公社文安 驿大队的，一个叫金晶，一个叫舒展。金晶同习近平交往时间更 长。舒展和我是同一年上的大学，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

金晶和舒展插队的地方是文安驿大队，这里是文安驿公 社的所在地，习近平所在的梁家河属于文安驿公社。文安驿有集， 五天一集。当时习近平和梁家河其他知青要赶集，一般就到最近 的文安驿来，买一些生活用品之类的东西。有时候，习近平和其 他知青到外面办事，路途远，交通不方便，天晚了回不了梁家河， 就住在文安驿大队的知青那里。一来二去，金晶和舒展与习近平 接触就多起来、熟悉起来了。同时，金晶同习近平一样，虽然在 村里插队但参加了社教。习近平和陶海粟这一组在赵家河，金晶 在贺家湾公社，相同的经历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习近平的故事，我是从金晶那听说的，印象特别深刻的， 是他入党的事。当时梁家河村里有几大家族户，村民之间有矛盾， 尤其在分粮食问题上。时任大队支书梁玉明看到习近平的素质以 及村民对习近平的信任，就提议他来当大队支书。习近平说“我 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书记呀？”梁玉明说：“不是党员可以发展 嘛！”支部开会表决后就报到公社，费了几次周折之后，就办了 函调和外调。办理外调的时候，习仲勋还没有“解放”，在洛阳 耐火材料厂下放，工厂开了一个证明材料，大意是“习仲勋的问 题不影响子女入党”，就这样完成了外调，习近平入了党。

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可以说，入党过 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如果有一个经手人思想僵化，严 守当时所谓的“政治标准”，都会影响到习近平入党。从这件事 情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习仲勋在洛阳下放，还是习近平在梁家河 插队，他们都具有极好的群众基础。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群众不 支持，不采取一些当时还行得通的这样那样的变通说法和做法， 在那种政治环境下他要入党是不可能的。

后来我从别的知青那里得知他上了清华大学。我在北京 外国语学院上学时，周末一般都回清华父母家。有一次，我还在 清华大学西校门外看见他和同学、老师从外面返回学校。

他在梁家河办沼气是我离开延川之后的事情，我也是从 其他北京知青那里听说的。

采访组：在陕北插队的经历对你们这一代知青有哪些影 响？

艾平：从我个人经历来看，下乡插队让我对中国农村有 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会懂得中国的 国情，也不会懂得中国为什么是这种情况。中国当时在很大程度 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80%以上的人口都生 活在农村。不了解这80%的人口是怎样生活的，就谈不上对国情 有深入了解。

我出生在清华园，这个地方在中国是一个象牙塔。我们 小的时候，清华校长蒋南翔给我们“设计”的人生道路就是：在 清华园里上幼儿园、上附小、上附中、上大学，最后当一个红色 工程师。没有坎坷，也很平淡。如果没有插队的经历，蒋南翔的 设计就是“一条龙”，那会是很顺利但又比较平淡的一生。走那 样的路肯定会很轻松，也没有什么磨难，而且可能有所成就，但 那样就会失去很多了解国家、了解人民、了解

民族从而了解世界 的机会。这就是我对陕北插队这段经历总体上的认识。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的。毛主席要求“知识 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底什么叫“再教育”？ 农民能不能教育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起码不是一般人想象的 那种教育。知识青年确实受到了深刻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了他 们呢？可能不一定是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革委会，而是现实生 活本身、是农村生活本身。

我实际在村里只待了两年多时间，但就是这两年多让我 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养尊处优的人永远都不会了解生活的艰 难，哪怕是人们的衣食住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农村生活的最 基本内容都非常艰难，包括吃饭、喝水、烧火做饭、照明点灯， 等等。在城市里，虽然生活并不像现在这么富裕和方便，但起码 不用为最基本的生活发愁。拧水龙头就会有水，做饭就用蜂窝 煤……在城市里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的事情，在农村却是千难万 难。

我们刚去的时候，国家还是做了一些安排的，给了二百 四十块钱安家费和一年的布票。这二百四十块钱安家费，我们可 以从中用来买个箱子，当时箱子很便宜，余下的还可以买一套外 衣，然后还包括大概有半年多的伙食费。我们去的时候是1月， 从1月到秋粮下来的这段时间，国家供给知青粮食，每个知青每 月四十五斤的定量。这是很高的标准了，原来在北京我的定量大 概也就是三十斤左右。

我们到陕北的第一年据说是一个少有的丰收年，而我的 全年收入只有二百六十斤原粮，还有六块钱。这意味着，我第二 年每个月的原粮不足二十二斤，每个月的现金收入只合五毛钱。 在集体经济的情况下，我的这个数字基本上代表了我们全村甚至 整个延川农民经济收入的情况。这个经历我后来跟很多外国人都 讲过，就是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上开始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陕北的生活很多还停留在自然经济 阶段，老百姓手里没有多少钱。他们靠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线、 自己织布、自己做鞋。我印象当中不得不买的物品就是点灯用的 煤油。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陕北农村生活。

受“文革”影响，那个时期人们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 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等我到了陕北才真正知道，哪 有那么多阶级斗争啊！

当地太穷了，村里没有地主富农，只有两 户中农。我深深感到，当时最大的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这个矛盾， 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第一天到地里干活时，是春天往地 里送粪，那一趟来回差不多五里地，一天就送四趟。到最后，能 干的人早就干完回家了，我真是累得不行了，天又黑下来了，我 又怕又累。这时，我旁边有个老乡，他当时有四五十岁吧，家里 还是个中农。他看我那样，说："算了吧，把你的折到我这筐里， 我给你担上去算了，你就坐这儿等我。"他送完回来说："要不咱 们坐这儿歇会儿？ "于是他又讲，这活儿其实不算什么，夏天收 麦子，种荞麦，那些活儿比挑粪要苦得多。

从第一天这件事我就明白，原来脑子里那些"阶级斗争"， 实际上和陕北的现实不是一码事。人们并不知道社会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道路在农村的体现到底是什么，却要每天面对最现实的 问题：怎样才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 际情况啊!只有深入农村才能看到这个情况，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在陕北插队的经历让我们这一批知青读懂了"生活"这 部大书，读懂了"中国农村"这部大书，读懂了"实际"这部大 书。这些"书"上虽然没有字，却比有字的书要深刻得多，对人 的教育作用要大得多。

采访组：习近平回忆知青岁月时，曾坦言在陕北插队的 生活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做实际"。您如何理解这句话？

艾平：接触实际，才能懂得什么叫"实际"。简单举个例 子，就拿"烧柴"这件事情来说，在南方草木茂盛，烧柴十分方 便;在东北，森林遍布，更不缺柴烧;在陕北，烧柴却是一个巨大 的生活难题，老百姓只能烧草和灌木枝子。所以习近平当年带领 村民办沼气，就是要解决当地农民"烧柴难"的问题。

再比如，吃饭也存在着实际问题。国家给我们供应的国 库粮是原粮，买来之后，我们要把粮食磨成面就得推磨，而我们 很多人之前都没见过石磨。好一点儿的村有牲口，有驴拉磨，但 我们村就三头驴，干农活都排不过来，所以我们就得用人推，推 十斤、二十斤的粮食，就要花费一两个小时。

开始我们村里有十个知青，其中六个男生，四个女生， 我们十个人吃集体灶，大家轮流做饭。第一年，我们吃的是国库 粮，怎么吃都不

够，我们就连麸子一起吃，就这样还填不饱肚子。 我们就跟老百姓学，吃野菜、榆钱、槐花、苦菜。后来女生实在 受不了了，提出要跟我们分灶，因为她们跟我们男生一起吃，就 要吃糠咽菜，她们自己吃国家供应的四十五斤粮食，就够吃了。

当时水土保持差，一下雨就发山洪，河里有一米多高的 水头子，夹杂着泥土枝桠把我们吃水的井填了。河里的水不能喝， 都是黄土泥浆。赶上雨季，十几天阴雨绵绵，山上的柴都是湿的， 打来了也晾不干，没法烧，一直下雨，磨面也成了问题。所以那 些天，吃饭成了天大的问题。

这些插队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对城里长大的知青是很大 的触动。这样的生活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当 然，“实际”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从我个人经历和体 会来看，这些实实在在、真真正正存在的情况就是实际，既不是 主观意志所想象的那样，也不是主观意志随随便便就能改变的。

插队生活既是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也是对中国国情的了 解。插队生活让我深深体会到：不改革，不开放，中国真是没有 出路。当时我们国家的很多政策，很多做法就不符合实际，那时 总是强调抓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我们到陕北一 看，主要矛盾肯定不是阶级斗争，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太落后，不 能满足老百姓生存和生活的需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 后，陕北人民的生活状况很快就得到了改善，最起码不用饿肚子 了。当然，发展起来后又会有新的问题。

所以，习近平讲的“了解实际”，就是我们深入生活所了 解的真实情况。他正是了解实际，了解群众最需要什么，才能脚 踏实地，从实际出发来主持工作。如果不了解这些，恐怕不会有 十八大以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会有“三严三实”学 习教育，不会有反腐倡廉，也就不会产生一系列正确的理解和认 识。

采访组：您认为在农村插队的经历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 理政有什么影响？

艾平：我们都是1953年出生的，同一天从北京出发到延 川插队。对我个人而言，这段插队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虽然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但我相信，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知青，经历过那段岁月的知青，都会对此念 念不忘。

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系列举措以及他自己对知 青岁月的回忆来看，七年知青岁月为他治国理政思想树立了“以 人民为本”的方向。在陕北农村，习近平与农民朝夕共处，建立 起了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树立了为人民办实事的理想。人民是习 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立足点，为民、惠民、富民是治国理 政思想的出发点。这绝非空谈，也绝非易事。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 数次提到“人民”，讲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无独有偶，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回延川县梁 家河村看望父老乡亲时，也深情地说：“当时我离开梁家河，人 虽然走了，但是心还留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今后如果有条件、 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习近平总 书记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梁家河当村支书的时候，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是 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他都不曾忘 记人民。这是因为，在梁家河的时候，习近平就把人民这两个字 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内心。

在陕北插队的知青都知道陕北的特点：这里是农村，也 是革命老区，不同于城市、工厂、兵团和农场，插队知青相对自 由一些，可以和农民之间有更全面、更亲近、更真实的接触。在 这样的环境下，习近平在梁家河看到了真实的农村，和农民建立 了真实的感情。

延川县从1970年就开始招工了。然后从1971、1972年 开始有大批的上学，1972和1973年连大学带中专走了将近一百 人。大概到1973年就基本走得差不多了。习近平是北京知青中 最后一批离开的，他在农村入了党、当了支部书记，带着当地老 百姓改天换地。

梁家河的经历让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根基深深 扎在中国最广阔的土地上，扎在最广阔的人民群众基础上。几千 年来，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让农民留在农村，还是走向城市? 留下的农民怎么留，进城的农民怎么进？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农村 和农民的问题，更关涉整个国家的发展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农 村扎根七年，从来没有忘记当年的农民朋友，他深深了解中国的 实际情况和农村的真实情况。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举 措都非常务实，着眼于解决一系列民生问题和发展问题。

梁家河的经历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的开端。他 曾经讲道：“七

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 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 么叫群众。这是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他最先提到的“实际”“实事求是”都是实践的具体表现。唯有 实践，才能认识到实际；唯有实践，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1979年，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中央军委办公厅 工作，担任当时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耿飚的秘书。对一般 人来讲，给国防部长当秘书是一件多么光荣、多么有前途的事情。 然而，习近平在梁家河树立了 “为人民办好事”的理想，这个理 想始终没有改变，实践的过程也始终没有停止，因此他主动提出 到基层去。1982年3月，他到河北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再 次回到基层，回到群众之中。

从最基层的村支书干起，从为人民办好事的具体实践做 起，不断扩大实践范围，不断深化实践层次，不断在实践中夯实 自信心，并把这种自信心提升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发展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可以说，七年知青经历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起 点。

“陕北七年，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2017-03-13 10:12:49分享复制打印 QQ 截图 20170313101419.jpg

采访对象：孔丹，1947年生，北京四中学生。中国中信 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 事长。1969年2月，到陕北延长县插队，距离习近平插队的延 川县58公里。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5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孔总，您好!1969年2月，您从北京到陕西省延 长县插队，在那里一待就是四年。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上山下乡 的时代背景和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

孔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场政治运动，是那个年代无法回避和逆转的 社会潮流。当年每一个

知青虽然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但都有着共 同的际遇，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对我们那一代 知青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对此有深刻感触和清晰认识，是在2010年退出现职的 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我的一次谈话。 那年的12月24日，我应约到习副主席的办公室谈话，在谈到我 的工作和退出一线岗位时他说："孔丹同志，你从事工作四十余 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工作多年，卓有 成效。"他的这个概括让我非常感动。他对我的情况了解得如此 细致，他所说的"四十余年"，是从我1969年去插队时算起的。 我感动的是他对我插队经历的认可和这些年工作的肯定。

为什么会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主要是"文化大革命" 发动以后，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全国各地学校基本 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这三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 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总数达1000余万人。其中城镇学生400 万人，他们待在城里无所事事，上山下乡成为解决他们就业问题 的一个应急措施。毛泽东看到整个中国的混乱情况，也看到严重 的社会问题，他老人家于1968年12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大 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习近平当年15岁，是老初一学生；我21 岁，是老高三学生。在我们应该读书学习的年龄，就在国家这样 一个部署下一起到了农村。

当年，约有2.6万多北京知青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 从1969年1月7日开始，每隔一天就有一趟运送北京知青的专

列，从北京站出发，开往陕西的铜川，一直持续到1969年春节 前为止。那时延安地区有14个县，这2.6万多名北京知青被分 别安置到志丹、安塞、延安、延川、甘泉、富县、宜川、黄龙、 洛川、黄陵、宜君(现在属于铜川市）、延长12个县124个公社 1602个生产大队3000个生产队，吴旗、子长两县因条件较差没 有安置。延安县安置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知青，安置 人数最多，共6000多人。宜川县、延川县安置海淀区的知青， 其中宜川3200多人，延川1380多人。志丹、富县、延长安置西 城区的知青，志丹530多人，富县2750多人，延长2370多人。 我上学的北京四中在西城区，这样我就到了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 川大队插队。安塞县安置的是东城区的知青，共1850多人。宜 君县安置崇文区的知青，共2190多人。甘泉县安置宣武区的知 青，

共620多人。洛川县安置丰台区的知青，共2150多人。黄 陵县安置朝阳区的知青，共2400多人。黄龙县安置门头沟、石 景山区的知青，共970多人。当时北京知青和延安12个县之所 以实行区、县对口安置，主要是以后便于联系，做好知青工作。

大批外地人进入延安，近代历史上只有过两次，第一次 是中央红军，第二次便是北京知青。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延安， 在这片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奇迹。2.6万多北京 知青到延安，在这个幅员并不广阔而且闭塞贫穷的区域里，经受 了艰苦的人生磨砺，承受了严酷的风霜雨雪，度过了一段难忘的 青春岁月。

我最近研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其中谈到知青上山 下乡是这样表述的："至1981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 1600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 农，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 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 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 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 巨大困难。"我认为，这段话比较客观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 动作出了评价。

采访组：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讲话时曾提到，"每一代青年 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去谋划人 生、创造历史"。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孔丹：我理解，"际遇"就是一个人的遭遇和时运。"机 缘"这个词，指的是因缘里面包含着机会和缘分；当"机缘"来 临时，能够抓住它、能够应对它，就会形成"际遇"。实际上， "机缘"、"际遇"经常连起来用，就是讲人的命运。1965年我 18岁，在北京四中入了党，是当时四中第一名学生党员，也是 当时北京市为数不多的第一批中学生党员，这可以说就是一场机 缘。而"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经历的种种不幸则算是一种际遇， 其中许多事情都是被裹挟进去的，属于被动参与。同样，当年习 近平和我们众多知青到陕北黄土高原上开始一段艰苦、特别的人 生之旅，也是一种际遇，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命运。

说起来，当时我和习近平的境遇确实比较类似，我们都 是高干子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红二代"。但也不完全一样。 那时，我母亲许明（"文革"前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因为受到"文 革"迫害自杀了，我父亲孔原（"文革"前任中央调查部部长) 被关进监狱，我自己也坐了数个月铁

牢。我的弟弟已经去山西插 队了。“上面”不准我到山西跟弟弟在一起插队，因为我们都是 “黑帮子弟”，必须分开。习近平也是“黑帮子弟”，他父亲习仲 勋“文革”中遭受了批斗。这是我们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他 父亲受迫害的时间比我父亲早，从1962年开始。他下乡的时候 才15岁，我当时已经21岁了，那时我身体上应该比他更强健一 些。

我当时有个心态，觉得北京无可留恋，一走了之是很好 的事。所以我离开北京时心情很平静、很淡漠，没有任何难以割 舍的东西。这或许跟许多别的知青的感受不一样。习近平当时的 心情似乎和我差不多。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插队对他来讲 是如释重负，因为他当时那种情况，待在北京反而更危险，甚至 有命没命都不知道。他说当年火车刚刚启动时，车厢里一片哭声， 大家都难舍难分、痛哭流涕，而他这个时候反而在笑。

在这一段人生“际遇”里，我们差不多：父辈受迫害， 家庭被分割破裂，天各一方。社会大浪潮打过来，我们就被浪潮 卷走了，由不得你自己。插队期间，政治条件好的知青可以当兵、 招工，而习近平和我这样的“黑帮子弟”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到 了陕北农村，我没有想过多久能离开，也没有什么和贫下中农结 合扎根农村一辈子那种所谓浪漫主义的追求。我的心态就是：我 就是一个农民，我要生存。

采访组：从您自己角度看，知青生活是什么样的？

孔丹：这些年一直有影视作品讲那个时候知青的故事。 有一种“伤痕文学”，表达了很多那个年代的痛苦经历。还有一 些理想主义作品，把当年知青的生活表现得很浪漫。记得反映北 京知青的电视剧《血色浪漫》播出之后，我们中信有的年轻人就 说：“孔总，我们真羡慕你们啊，你看你们那时的生活多么浪漫 呀！ ”我说：“这有点扯淡吧，那不是我们的生活，少数人可能有 那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就是直接到农村去，马 上适应农村的生活，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既没有某些文艺作 品描绘得那么苦不堪言，也没有一些人说得那么浪漫，我觉得这 才是大多数知青的生活。

我印象很深的是，1969年2月，我们那批北京知青坐在 卡车上，经过延安，一直到延长县城，然后就有农民翻山越岭带 我们到各个大队。其实我们刚到农村时，并不能给当地作贡献， 反而给当地人带来负担一一社员不仅要关照我们，还要教我们学 习劳动技能，带着我们参加整个劳动的各个环节。春天要开始种 秋庄稼，种玉米，种谷子，种糜

子，种荞麦。播种前，我们要用 镆头翻地。镆头是陕北农民的重要劳动工具，是半月形的，面积 比较大，吃土更多。刨了土块，再把它打散。下籽不久，庄稼就 长出来了。庄稼生长过程中，还要定时锄草。牛到了盛夏白天不 肯干活，我们经常夜里一两点钟赶牛上山，到塬上去犁地。吆喝 那个牛下坡，你要用陕北土语，“下（念ha)啰啰”牛才听得懂。

陕北种麦子的办法很特别，我们把羊粪在口袋里装满， 用驴驮到山上的地头，每隔一段距离就放置一袋粪。然后我们在 笸箩里面把麦种和粪均匀地用手搅拌好，前面一个人拿一个镆头 刨坑，后面一个人把粪和麦籽一起撒在坑里，再用脚把土掩好。 播种完成后，麦子就慢慢长起来了。

当时粮食产量很低，麦子长得很稀，一亩地最多也就收 百十来斤麦子。夏收时在塬上割了麦子，用麦秆捆好之后，我们 用那种两头尖的扁担，扎起来一捆麦子，把它举起来，再扎起离 它最近的另一捆，担着两捆麦子，往往要走六七里甚至十里路， 而且中途不能把麦捆放下来歇息，因为一放到地上，麦粒就会脱 落。所以必须一口气担回到川里面的打麦场上，然后再继续上山 担麦子。

很多劳动技能，有的知青同学怎么也学不会，因为他们 有抵触心理，对这些毫无兴趣。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把活干好， 而且要干得潇洒漂亮，从中找到乐趣。

采访组：您提到，习近平曾对常振明说：“你们那个孔丹， 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您能讲讲这件事的由来吗？

孔丹：那时我是中信的董事长，常振明是总经理。有一 次，他去上海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他回来告诉我: “我见到习书记了，习书记对我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 读黑格尔呢！’”

我和习近平当年在陕北没见过面，但互相都有耳闻。这 一则因为我们当时在知青里都是有名的“黑帮子弟”，或许也都 小有名气吧。二则因为我们的父辈是相互熟悉了解的。2009年， 习近平到河南洛阳调研时，视察了他父亲习仲勋落难时下放劳动 过的洛阳矿山机械厂，这个工厂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中信的重机公 司，所以我前往接待。一见面，他就对周围同志说，孔丹的母亲 和我父亲在国务院是同事。我赶忙应答，哪里是同事，习仲勋同 志是副总理兼秘书长，我母亲只是副秘书长，

是下级。他笑言，

那也是同事啊。

插队期间，劳动是艰苦的，生活是艰难的，好在政治上 还是平稳的，书还是可以读的，读书的时间也是有的。傍晚下工 后，吃完了饭，剩下就是自己安排了。特别是冬天除了一些水利 工程类的活儿，基本上没有太多地里的活儿了，如果不回北京， 就有时间好好看点书了。我后来了解到，习近平当年读的书很多， 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学类书籍。我读得书很杂，但凡能找到的 书都读，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因为中学的全部课程我在四中 时已经学完了，就找来大学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教 材学习，这些都是大学理工科一二年级的公共课教材。当时比较 宝贵的内部出版的书，像《托洛茨基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 级》等政治类的书，还有中国古典文学、外国古典文学等等，都 是那时候读的。习近平当年带去两箱子书，读完之后又不断交换， 借书来读，再加上他在一些讲话中提到的读过的作品、引用的作 品，我感觉他读书的数量和种类超出了我的阅读数量和阅读种 类。

我那时候读书，并不是像有些革命家那样有远大理想， 什么去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没有。只是觉得读书是我们一种天 然需要。我们在土窑洞，自己打了一个石板，把两个树干插进土 窑洞，再来一个横的树干，把石板铺上，就可以趴在上面读书了。

现在回忆起来，陕北的黑夜就像一幅永恒的影像，深深印在我的 脑海中。陕北的天似乎黑得特别早，可能是因为在山里吧。夏天 还好一些，秋冬黑得尤其早。天黑得早也好黑得晚也好，冬天也 好夏天也好，我们几个人往窑洞里一坐，大家把各自的书拿出来 就开始读。黑夜中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窑洞里有一盏煤油灯，闪 耀着一丝亮光。我们凑着那个煤油灯，趴在石板上看书。我后来 了解到，习近平当年在窑洞里晚上读书，也是凑在煤油灯前，以 至鼻孔常常都被熏黑了。

那时对我们来说，读书是一种享受，打开书本马上就可 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下子就和现实生活隔离了。你不会再想 白天干什么活儿了，不会再想白天的疲惫和困倦，你会钻到书里 面去。看哲学书、文学书、历史书，你会被它们吸引，马上进入 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在《战争与和平》中，可以看到在拿破仑 战争的宏大背景下俄罗斯贵族的生活，可以看到战争的滚滚硝烟; 在《九三年》中，可以看到法国阶

级斗争激烈而雄伟的场面，可 以看到革命纪律的坚强意志与私人感情的艰难抉择。正如习近平 所说，在陕北插队时我确实读了黑格尔。读没读过黑格尔是不一 样的，受没受过熏陶和训练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后来有人说，如 果一件事情在逻辑上不完整或者不自洽的话，孔丹是不会接受 的。其实，这里面就是理论的力量。1977年恢复高考，我没有 报考大学，而是于1978年直接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经济专业的研 究生并被录取，成为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没有上过任何大学、 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第一届研究生。能有这样的结果，除了在北京 四中打下的扎实基础外，与陕北插队时坚持读书学习是绝对分不 开的。

那时，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我影响很大。 我还受很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格物致知”，“正 心诚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不记得从哪里弄来一本讲 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的书，介绍他们采取的集约式生产方式，效率 很高。我国农村经历了 1958年“大跃进” 1962年人民公社体 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开始下放所有权，应该说已经 没有了原来吃公共食堂那种大锅饭的现象了。但在我们那里，一 个大队里边还是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生 产力极其低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看了讲美国农业生产 方式那本书，我就想怎么发展中国的农业。这种想法当然是初级 的、幼稚的。后来，中央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时，我 就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特别容易接受。但在党内就引起一些争 论，包括一些省委书记都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应当避免集体生产 方式被破坏。而对我来说，因为有四年插队生活的经历，又读过 农业研究方面的书，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容易理解，是大势所趋。 我始终认为农民的积极性是天然的力量。当然，今天发生了很多 新的变化，我们要重新研究怎么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怎么调动农 民积极性问题，以及两亿七千万农民进城后谁来种地和种好地的 问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刻认 识和理解。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您怎么理解？

孔丹：我个人理解，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和阅读习惯， 树立自己的正确人生观，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对于我们那一代 人来说，可以说插队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因为我们 要自己面对社会，社会已不再把我们看成少不更事的孩子，而是 把我们当成一个成人来看待。陕北老乡都是善良的，他们没有因 为我们是“黑帮子弟”而另眼相看。我

记得有一位老大娘，她知 道我家里的遭遇，对我特别关心。有一次，我把被子拆洗了，刚 晾干，老大娘就拿着针线过来给我缝上了，她一直把我当成半个 儿子看待。

我走山路的能力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陕北都是高 高低低的山路，每天一出门就开始爬坡、下坡。老乡告诉我，走 山路可急不得，得走得慢慢的、稳稳的，才能走得远。要是心急， 一会儿就能走出一身汗，还能叫你喘半天!老百姓中间蕴藏着大 智慧，走山路如此，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越是遇到困难，越 不能着急，一定要慢下来，稳下来，才能克服困难，走得更远。

“行稳致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乡对我们很热情。当地老乡都是抽烟袋，刚到农村时， 有位老乡抽完一锅烟后，就把烟嘴在衣服上一蹭，再用烟丝装满 烟锅，递给我抽。一开始我还真不习惯，可是又不能拒绝老乡的 盛情啊！我只好硬塞在嘴里，老乡见我和他们一样抽烟，就觉得 跟我亲近，还高高兴兴帮我把烟给点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第 一口烟就“晕烟”了。那烟太厉害了，就像在嘴巴里面炸了似的， 钻到我的鼻腔里、肺里，呛得我直流泪。看着老乡真诚热情的眼 神，我硬是挺着没咳嗽出来。从那以后，我就跟着老乡一起抽烟 了。我一直抽了 34年的烟，直到2003年“非典”才戒了。仅仅 从抽烟这一件事来看，陕北老乡和农村对我的影响可谓至深，或 者叫“深入骨髓”。

还有一件涉及抽烟的小事，让我至今难忘。为了抽烟， 我跟别人打赌，说我一口气能喝半斤酒。别人不信，我们就走了 五里多路，到公社的供销社用洋瓷缸打了半斤酒，我当场端起来 一口气喝光了。那人当即就服了，输给我3条烟。当时一条烟6 毛钱，6分钱一包的经济烟。这件事既显示了我的男子汉本色， 又赢了 3条烟，让我开心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回忆起这件事

仍让我忍俊不禁。这就是陕北农村带给我的快乐，这种快乐就像 一枚宝石珍藏在我的记忆中。每每想到这些快乐的事情，陕北的 农村、陕北的老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那片土地不仅仅是我劳作 过的土地，而且是我灵魂的故乡；那里的老乡不仅仅是陪伴我的 老乡，而且是我精神的手足。我觉得我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好了。

到陕北插队同样是习近平的人生第一站。当年他年纪那 么小，在黄土

高原一待就是七年，而且扎扎实实干成了那么多很 不容易干成的事。所以说他的人生第一站走得更扎实，他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扣得更好。这也是他以后走好人生其他旅程、系好人 生其他粒扣子的最重要基础。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对知青岁月念念不忘，曾多次提 到知青往事。在您的记忆和感悟中，您认为知青上山下乡在你们 这一代人的生命中意味着什么？

孔丹：在陕北插队那段岁月，我学会了在困难中发现生 活乐趣的本领。家庭的变故、生活的落差，对我造成了很大压力， 但我没有陷入负面情绪，而是学着去适应现实。

第一年，我就快速融入了农村，学会了干各种农活，我 是我们队知青中的干活第一人，每天能拿到10个工分，这对我 来说非常有成就感。但第二年却出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干活 太猛了，得了大叶性肺炎，吐了血，又得不到比较好的治疗，身 体就弱下来了。天热的时候，脚上又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整个 脚都肿起来了。每天拖着肿脚爬山路、干农活，真的快吃不消了。

就在这时，来了一件好事。村里的西瓜快熟了，需要两 个人去看瓜地。可是瓜地恰巧在坟地里，没有人敢去，只有我一 个人报名。我在瓜地的一棵枣树上吊了一个蚊帐，下面铺了一张 床，天天一边看书，一边看瓜。这段时间让我暂时远离了农活和 饥饿，身体得到了调养。黄土高原上碧绿的瓜地，好像沙漠中的 绿洲一般，成熟的西瓜在阳光下泛着油亮油亮的绿莹莹光泽。队 里是允许看瓜人吃瓜的，饿了渴了，我就摘一个西瓜，不用刀， 就用巴掌猛地一拍，西瓜就裂开了，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又甜 又多汁。直到今天，我时常怀念那片碧绿的瓜地，这是我在艰苦 的时候找到的生活乐趣。后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在应对困 难的时候，都不会放弃寻找人生的乐趣和幸福。这或许就是“修 身”吧！

习总书记在北大讲话专门讲了一段“格物致知”和“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他对这段话有着深刻的体会，蕴含 着丰富的道理。

拿我个人来说，我插队时从来没有想过将来做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要在陕北待多久，我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该做什么做 什么，该劳动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我要享受人生，要有生活乐趣。 愁眉苦脸是过日

子，高高兴兴也是过日子！我的一些老伙伴见到 我总说：“你真是一个想得开的人！”后来，我在遭遇中信泰富澳 元期货合约危机时，每天都很忙，压力也非常大，但我都能睡得 着觉。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会想每天的工作、解决的办法，想完 了就问自己：“还有别的办法吗？”自问自答：“没有了。”然后就 睡觉。因为已经想透彻了，不睡觉也没有用了。

面对人生，是可以有不同态度的。高高兴兴也是生活， 愁眉苦脸也是生活，“愁上加愁、苦上加苦”不如“苦中作乐、 以苦为乐”。我刚到农村时，就想着怎么才能跟当地农民一样， 怎么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必须精通全套农活，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融入农村。一年下来，所有农活我都能上手了。这是 我生存和生活的要求。离开农村时，我已经是一个“熟练”农民 了，从外到内，整个生活状态都农村化、农民化了。我说的是陕 北的方言。穿的是土布衣服，因为我来时带的衣服都磨烂了。头 上扎的是白羊肚手巾，这样的手巾一年得两条，在农村生活离不 开它，夏天把毛巾叠成一个长条，系在头上，出汗的时候用它擦 汗;冬天把毛巾展开，从后往前扎，在脑门上面系成一个小结， 用它御寒。穿的鞋是老乡做的鞋子，棉衣也是老乡做的老棉袄。 在那里生活了四年，感觉已经和他们融进去了，没有感到自己与 农民有什么不同。

习近平在梁家河待了七年，他年龄比我小6岁，但比我 在农村待的时间长得多。而且不仅在那里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 支书。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虽然我们在那时并没有什 么交往，但根据我在陕北农村四年的经历，联系他后来的成长轨 迹，他在陕北七年中肯定深深体味了最苦、最难的生活，并在苦 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

采访组：习近平曾经说过：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 我的锻炼很大。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 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您怎么理解他这些收获和 体会？

孔丹：我认为他这些收获和体会是符合逻辑的，是他长 期历练的思想和精神成果。我们不少知青也有这方面不同程度的 感受。

知青上山下乡这件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我们这 一代人独特的经历。有一种理解，说上山下乡对于知青个人来说， 它是属于一种历练，是对人性格的锻炼。日本人曾经把聂卫平的 棋风称为“文革棋”。你照规矩来，他不照规矩走，不按常规出 牌。他就是有这种能力，逼得

整个日本的超一流棋手碰到聂卫平 就头疼，畏惧他坚韧顽强的棋风，出其不意的怪招。这种风格是 不是和聂卫平的“文革”经历、六年上山下乡经历有关呢？我看

多多少少是有的。

就我自己来说，插队对我的性格、意志、品质，还有跟 老百姓沟通的能力都是有锻炼的。以前我们没有这种沟通，太学 生腔了，人家也没法和你沟通。我们这些人后来形成的这种沟通 能力，应该说在下乡历练中得到了实际的提升。还有就是对人民 疾苦的直接感受。特别对一些高层领导来说，他们经过了这种历 练，也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财富，甚至成为从政的一些很正面的影 响因素，包括意志、品质、性格、立场、情操、境界，包括接触 人民、跟群众的沟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了地气了。由此来看， 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表现出来的为 民情怀、求实作风、稳健风格、非凡气魄，他的文韬武略、大智 大勇等等，我认为都可以从他陕北七年的插队历练中找到答案。

习近平和我这样的干部子弟，虽然从小没有什么过于优 越的生活，但客观地讲，和一般干部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相比，生 活环境毕竟还是好一些的。比如，即使在“文革”中，我的家里 人被关的关、死的死，但那时我一个月还有15块钱生活费，还 能隔一段时间改善一下伙食，吃个炒饼什么的。从一生下来到今 天，应该说生活最困苦的一段还是在陕北农村。我想习近平也应 该是这样的。你经年累月直接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能够很直接 地看到中国农民的生活内容，由此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那时候， 陕北一个农民，一辈子就是盼个吃饱饭，盼着娶个媳妇，生个儿 子，挣副棺材板。就这样过来了，这就是他的一生。因为环境艰 苦，他们的寿命也比较短。他们直接跟我们表达的生活理念就是， 受苦人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悲伤，就拴在 这么大的一个天地里。听听他们唱的歌，你就能感觉出来，他们 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活基础上经历着所谓的欢乐啊、痛苦啊。

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包括习近平在内，一下子面对的就 是社会最底层的甚至在中国农民里头最苦的一群人。这个落差是 非常大的，同时也是很难得的，因为这才是对人民真正的了解， 对中国国情真正的了解。

我在村里关系最好的一家人姓高，他家里有三个娃，大 娃、二娃和三

娃。大娃是一脸的苦相，二娃、三娃的形象也还都 在我的脑子里呢。我记得很清楚，后来三娃娶了个米脂婆姨，长 得很俊秀，所谓“米脂婆姨绥德汉”嘛。女方家就嫌这里太穷， 拉着个脸。要不是没饭吃，怎么会嫁到这里来？所以说要跟农民 沟通，先决条件是你和人家要处在一个阶层，那时我们做到了。 今天虽然身处另外一个阶层，但我们的那种感受、那种沟通是不 可磨灭的，而且会带给你动力。所以说，在农村插队的经历不仅 对我们是一种锻炼，还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加深了我们和 人民之间的感情。这对我们后来的生活经历都是起了重大而深远

影响的。

我认为，治国理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 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有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一人民。习 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奠定了基础，让他深刻 地理解了“人民”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与他在 农村插队的经历有关系吗？

孔丹：肯定是有关系的。习总书记在延川插队七年，他 知道什么叫农村，知道中国最苦的农村的生活状态。像陕北、甘 肃等自然条件很差的地方，到处都是黄土坡，地里产粮低，又没 有其他经济来源，农民吃饭都成问题。可以说，在农村的七年时 间，他了解了人民实际的疾苦，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他讲为 人民脱困，讲得非常具体，可见他对这件事情了解得多么细致深 刻。七千万贫困人口、六千万留守儿童、四千万留守妇女、两亿 六七千万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问 题都要解决。如果不解决人民的这些问题，就对不起人民，就不 叫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代表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走了。 不是什么问题都是市场经济能够解决的。收入分配失调、贫富分 化严重，这些问题仅靠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吗？环境污染到了非常 严重的程度，仅靠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 了资本家的本质一一为了利润，可以不顾一切。《资本论》中有 一段入木三分的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 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 会铤而走险；为了 100%的利润，资本就敢

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如果资本的使用不受到约束，就会破坏性地使用资源。我们的党 和政府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府。我们的党是为人 民服务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 的各项治国理政举措，充分说明了一点：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地把 握住了国家和人民前进的方向盘。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在陕北 七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根早已深深地扎在人民中间，他的 心一直连着人民。

我觉得，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就 是脱离群众。有些干部，高高在上，不了解群众疾苦，滋生了各 种脱离群众的现象，有的甚至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严重损害 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 移反对腐败、狠刹“四风”，就是警醒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忘记人 民，不要脱离人民。

我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有着深厚的根基， 其中一个源泉就是他跟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 是靠书本，不是靠间接知识得来的，而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 体会人民的喜怒哀乐，为人民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梦” 的提出，离不开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经历，离不开人民群 众这个基础。习总书记志存高远，中国梦是他的理想和抱负，是 他的责任和担当，也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经历过“文革”带来的冲击，共同 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过程，形成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力量。当然， 新的一代人会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 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只是分享社会的进步和发 展，应该有责任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你的努力和你的贡 献。你可以有不同的背景，可以有不同的原因，可以有不同的追 求，但是不能离开社会进步的要求。”这句话并不是用我们的经 历去要求年轻人，不是要求他们必须重复我们走过的路，而是说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经历，每一代人都应该有每一代人的使 命担当。

采访组：您很喜欢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我们走的路， 我们自己选择。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请具体谈一 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孔丹：习总书记经常讲到这句话。我的理解是，我们应 该坚持我们自

己的道路和特色，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根源、现实环境三个方 面的原因决定的。

中国有一些人盲目推崇西方的理念和价值观，但我们能 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吗？我们曾经 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就好像中医把脉，同样是病人发烧，针对不同的病人却要开出不 同的药方。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到病根，才能药到病除。

习总书记对中国道路有着坚定的方向和坚定的认识，这 就是毫不动摇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会迎来100年诞辰。第一个百年即将 来临，我此生有幸，能看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这不是一般的 小康，而是全面小康；也不是一般的富强，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 新的阶段。

我正在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这部书分为三本，九 十年的时间分成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称为“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第二个历史时期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第三个历史时期截止到2011年，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个人觉得，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第四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全新的时期，可

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四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战略部署上展 现出伟大的志向和抱负。从“中国梦”到“两个一百年”，从推 动发展到深化改革，从经济结构调整到“四个自信”，从外交布 局到军队改革，从反腐到扶贫，无不体现出他的宏韬伟略。作为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他肩负起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任重道远，行稳致远，梦想终能成真。对 此，我深信不疑，充满信心。

“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2017-03-17

07:21:32分享复制打印

采访对象：何毅亭，陕西省汉中一中初中学生，1968年 12月至1971年4月在汉中市铺镇公社姜填大队插队。1971年5 月招工进入汉中通用机械厂工作。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读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 工作。现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7年1月1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对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知青生活，我们已分别 采访了梁家河的村民和一些北京插队知青，了解和掌握了他知青 生活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现在，我们想从宏观上了解当年知青上 山下乡的情况，以便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 岁月。我们了解到您当年也是“老三届”插队知青，请您谈谈那 时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何毅亭：你们这个想法和思路很好，了解了整个知青上 山下乡的情况，确实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 北那七年知青岁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 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66年“文化大 革命”前，差不多10年。这个时期，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是探索 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并把它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 疆和推动偏远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而找到一条符合中 国国情的就业途径。那些时候政策上也比较稳定，就是国家倡导、 本人自愿。整个说来，这一时期上山下乡规模很小，人数不多， 从1955年到1966年全国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约120万人。

另一个时期，就是从1967年到1978年，大概也是10年。 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 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全国共有1600多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 疆。其中，首当其冲的是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三届 城镇初、高中生约400万人。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就属于这400万 “老三届”知青，我就主要说说这个时期的情况。

那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甘肃省会 宁县一些城镇居

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关键是传 达了毛主席一条最新指示，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 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 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 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新闻媒 体突出报道了各地知青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满腔豪情下农村、 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消息，在全国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那时候 毛主席的权威达到他一生的顶点，他的话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 他老人家一声令下，立即在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

毛主席当时为何要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的决策呢？

1966年"文革"兴起之后，大学停止了招生，中学停了 课，工厂不招工。到了 1968年，1966年、1967年、1968年三 届初、高中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实际已成为城镇剩余 劳动力。因为"老三届"中学生没有离开学校，依此类推，1966 年毕业的及以后几年毕业的小学生就进不了中学，到了上学年龄 的孩子也不能及时进入小学。这种状况积累到1968年已经非常 严重。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中、小学生，这么长的时 间，正常的教学秩序却得不到恢复，大、中、小学都是乱糟糟的， 这种现象与"文革"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使整个国家的社会 动乱更加严重。在这种背景下，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成为解决中学 生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手段，也成为毛主席设想的"文革"由"天 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必须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

在毛主席看来，知青上山下乡是改造青年学生、"反修防 修"的有效途径。"文革"兴起的时候，以广大青年学生为主体 的红卫兵成为整个运动冲锋陷阵的先锋，他们得到毛主席的热情 支持。毛主席当时特别指示，不准组织工农反学生，要求劝阻工 农不要干预学生。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到了 1968年 夏天，毛主席对红卫兵的一些行为越来越失望。这年7月27日， 他派军宣队配合北京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制止那里发生的武 斗。7月28日凌晨，毛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同北京红卫 兵"五大领袖"谈了整整5个小时，对他们"现在一不斗、二不 批、三不改"特别是搞派性争斗甚至武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8 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派 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对"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进行改造"。1968年12月，毛主席进一步作出了 "知识青年到 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策。《人民日报》等权威报 刊把这一决策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新的战斗号令”，是“实 现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 径。”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上山下乡全面动员，除去充分 利用宣传系统，还广泛利用单位、学校、街道、邻里、家庭等多 种组织关系，形成了上山下乡光荣、不上山下乡可耻的政治氛围。

我当时是陕西省汉中一中的初中学生。从1966年6月份 开始，学校因为搞文化革命就停课了，从大字报、大批判、大串 联到“全面夺权”和“斗、批、改”，随着运动的发展学校形成 势不两立的两派，派仗打得很凶，最后甚至发展到武斗。大多数 学生包括我在内，后来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派仗，成为逍遥派， 基本上不到学校去了，不少人甚至长期不照面。但毛主席的最新 指示一公布，所有学生闻风而动，不约而同都齐刷刷聚到了学校， 打听和忙乎上山下乡的事。那个时候，地方和学校的革委会安置 学生上山下乡还真是雷厉风行，这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那 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每个学生到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几天 功夫方案全搞定了。这样，我们那里大多数学生在1969年元旦 前就到了各自的生产队，晚一些的也都在1969年元月到了插队 的农村。我是1969年元旦前走的，去的是本市的铺镇公社姜填 大队。后来国家明确，1962年以后插队的城镇知青，工龄从插 队起连续计算，于是我填个人简历表时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就写 “1968 年 12 月”。

现在回想起来，就那么几天、十几天，顶多也就一个月 左右，全国那么多“老三届”城镇中学生，就这么迅速地离开了 长期生活的城市，离开了父母家人，“打起背包就出发”，奔向了 原本陌生的农村。这真是一个奇迹。从那时到现在，48年过去 了，当年青春年少的“老三届”知青，如今年龄最小的也都60 岁开外，基本上退出了工作岗位或淡出了社会生活。当年，他们 在农村度过了人生道路上一段特殊的时光，有艰辛也有欢畅，有 付出也有收获。上山下乡的磨炼使他们由稚嫩趋于老练，由狂热 趋于清醒，由天真烂漫趋于沉稳老成。所有这些，为他们以后的 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上山下乡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涉及 全国众多家庭和亿万人的一桩大事，作为一个年代的历史符号， 永远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采访组：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对“文革”中知青上山下 乡的历史背景增加了了解。您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都属于“老三 届”知青。您能否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总体情况，谈谈对总书

记七年知青岁月的认识。

何毅亭：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放到当年全国 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背景、大格局中来观察，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三 个最”，就是：他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知青;他插队的陕北 是全国插队知青中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他是插队知青中在农 村待的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

为什么说他是“年龄最小”的知青呢?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都知道，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1968 年底上山下乡的时候，年龄最大的老高三即高中66届学生一般 是二十一二岁，年龄最小的老初一即初中68届学生一般是十六 七岁。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属于老初一学生，上山下乡时只有十五 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知青，在当年400万“老三届”知青中， 年龄无疑是最小的，人数自然是相当少的。

之所以说他插队去的是最艰苦的地方，这需要从知青上 山下乡安置地点和安置方式说起。当年“老三届”上山下乡，从 安置地点来说，有跨省安置、本省内跨地区安置、本地区内跨县 安置、本县就地安置四种。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在本省安置，而且 大部分是就地安置。跨省安置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三个 直辖市和浙江、四川、江苏等人口稠密省份，这些地方的知青除 了在本直辖市、本省安置插队外，还被安置到外省、区。北京“老 三届”中学生，绝大多数安置到了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吉林、 云南等地，其中2.6万多人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习近平总书 记就属于到延安插队的这一拨知青。

从知青安置方式来说，那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到生产 建设兵团或国营林场、农场、牧场、草场等单位当农业工人。另 一种是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这是最主要的安置方式。同样是 上山下乡，到兵团等单位的知青和插队知青的境况有明显差别。 兵团知青，身份属于国营企业农工，每月拿固定工资，多的30 多元、少的也20多元，而且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享受部分劳 保福利，物质生活能得到基本保证，所以到兵团成为知青的首选。 但是，兵团接收知青时政审标准比较严格，家庭出身不好或家庭 政治背景不好的知青很难进入兵团。插队知青，要靠自己挣工分 吃饭，多数知青的日工值只有几角钱。因此，一半左右的插队知 青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需要父母接济。我当年插队的地方， 条件算比较好的，一年干下来，扣除口粮钱一般有几十元收入， 马马虎虎能够自食其力。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村，地处黄土高 原，无疑属于全国插队知青中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最艰苦的地方 之一。前几年因为工作原因我去过梁家河，那里山大沟深，交通 落后，土地贫瘠，降雨很少，自然条件很差。知青插队那个年代， 这里没有电，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劳动用的还是世世代代传下来 的老镢头，老百姓吃水、烧柴、照明等都有很多困难。农民们面 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打下的粮食还填不饱肚子。我曾 问过当年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窑洞住了六年的北京知青雷平 生：插队时梁家河一个工日值多少钱？雷平生说，刚下去的头一 年即1968年，每个工日值是一角一分钱，到了1969年是一角二 分钱，涨了一分钱。我们也是插过队的人，可以想到的是，在那 个动乱的年代，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15岁少年，孤身来到那 被群山阻隔、多风少雨的荒僻之地，劳动和生活中有多少困难、 多少问题需要他去面对、去解决！

还有一个“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农村一待就是 七年，属于全国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当年我们 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谁也不知道究竟要在农村待多久。除了 有些知青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外，绝大多数知青在心底里 并不情愿在农村待一辈子。好在到了 1969年冬天，我们那里开 始有知青应征入伍，使广大知青对未来看到了希望。1970年以 后特别是1971年、1972年以后，通过应征入伍、招工进厂、推 荐上大学等多种方式走出农村的知青越来越多，到1972年底基 本上都离开了农村。我在农村待了差不多两年半后，招工进了工 厂。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农村却待了七年，这在“老三 届”知青中绝对是很少的。最近我看了一些有关延安北京知青的 材料，了解到1969年到延安插队的北京“老三届”知青共26200 人，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到1972 年共在北京知青中招工8387人，提干1179人，征兵553人，上 学648人，病退、困退回京1188人，这样共走了 11955人。1973 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征兵、上学11709人。1974年， 招工、招干、招生等769人，回京472人。1975年，招工、招 生250人，回京455人。这样到1975年末，整个延安地区仍待 在农村的北京知青只有590人，占26200名北京知青的2.3%， 而且这590人中不少知青是因为已与当地农民结婚而留下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到1974年 就剩下他和雷平生两人，雷平生1974年10月被推荐录取上了延 安大学后，整个大队就只剩他一个知青了。他不仅是梁家河大队 插队知青中走得最晚的，也是延川县

乃至整个延安地区北京知青 中离开农村最晚的极少数人之一，到1975年10月才被推荐录取 上了清华大学。

对我们插队知青来说，一起插队的同学和校友，或入伍、 或招工、或招干、或上学、或通过其他途径陆陆续续、一个一个 地走了，自己却仍然留在农村，昔日热闹的知青宿舍变成了冰房 冷灶，那个心情的确是挺复杂、挺焦虑的。我们从梁家河的知青 和村民中了解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却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仍 然是该干活干活、该读书读书，仍然是执着地一如既往地申请入 党，不仅入了党还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这种从容，这种坚韧， 这种任随“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的淡定，让我们这些当年插过 队的人由衷地感佩。

采访组：听您这么一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属于“老 三届”中年龄最小、插队地方最苦、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知青 这些结论，听下来确实是这么回事。请您再谈谈，总书记这七年 知青岁月，在哪些方面对他后来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

何毅亭：“年龄最小、地方最苦、时间最长”，这“三个 最”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生涯的鲜明印记。总书记这七年 知青岁月，是他离开学校和家庭走向社会的人生第一站，也是他 人生旅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站，无疑对他后来的成长会产生重大影 响和作用。结合我自己的插队经历和体会，我认为陕北七年在总 书记整个成长经历中的重大意义和重大影响，可能在以下这些方 面是很突出很重要的。

首先，陕北高原那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劳动生活， 锻造了他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和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知青从城 市到农村，从过去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到普遍艰苦的生存环境，

从以往基本没参加过多少体力劳动到长年累月地干各种农活，从 生活等依靠父母家人到生活、工作完全自理，所有这些转变的跨 度还是相当大的，知青们面对的各方面考验也是相当大的。对相 当多的知青来说，特别是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当年只有十五六岁 的知青来说，到农村插队所经受的磨炼从心理到体力都超出了自 身的承受能力。

我插队期间有两件事至今印象深刻。一件是下乡半年左 右即1969年6月，正是“双抢”季节，队里的知青同农民一起 既要抢收小麦等夏粮，又要进行插秧等秋粮的种植，累得都有些 吃不消了。记得我第一次到村外四五里远的麦地担麦捆，那时我 身高只有1.6米多一点，体重才80多

斤，肩膀上没什么肉，那 种两头尖、中间方的“尖担”把肩膀压磨得又红又肿，中途又不 能歇息，我硬是咬着牙一趟一趟地坚持了下来。另一件事是往国 家粮库送缴村里的公粮。我双手从背后托着装了近200斤稻谷的 麻袋，沿着一条宽约50公分、厚约10公分的木板，一步一步向 10米左右高的粮仓挪步，随着木板上下有些晃动，我的双腿不 时地打闪、发软，随时都有摔下木板的可能。像缴公粮这样的重 活，“双抢”这样的苦活，还有像在水利建设工地、铁路建设工 地抡铁锤打炮眼和点雷管爆破这样的险活，插队期间干过不少。

由此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插队，他受过的那些 苦、遇到的那些困难，根本不是我们那里的知青能比的。总书记 当年从首都北京来到陕北，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巨大反差，比我 们这些在当地插队的知青要大得多。陕北把干农活称为“受苦” 把农民叫作“受苦人”，可见农民、农村生存之艰难。明末农民 起义的著名领袖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出生在陕北，都是 陕北人。他们为什么率众造反？最根本的还不是因为这里太苦、 太穷，穷则思变，穷则揭竿而起嘛!知青插队那个时候，也正是 因为陕北自然环境严酷、劳动生活艰苦，有的北京知青刚来不久 就被吓走了。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当时有的北京女知青实在受不 了陕北高强度的劳动，就嫁给了当地农民，这样可以少干一些强 度大的农活。

习近平总书记多年后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回 忆：离开京城到陕北，最初感到很孤独，而且年龄又小，因此没 有长期待下去的观念，别的知青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后 来受到姨姨、姨夫的教育，很快融入了陕北农村新的环境，自觉 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闯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 思想关，成了村里的壮劳力和种地的好把式。梁家河的北京知青 和农民告诉我们，插队那些年，近平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什么 苦活累活脏活险活都干过，而且都抢着干，从来“不撒尖”，意 思是不偷懒。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陕北七年，锤炼了他坚韧不 拔、坚毅刚强的性格，铸造了他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情怀。有 知青“这碗酒垫底”以后人生岁月中遇到的各种风浪和困难又 算得了什么呢?正如总书记回顾插队经历时所说“七年上山下乡 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 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 有难到那个程度。”“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 不了的问题。”

二是，七年知青经历让他真正接了地气，了解了国情， 贴近了人民，

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冷暖和甘苦，培育了他同 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插队知青与兵团、农场、林场知青有所不 同的是，他们一下去就直接到了各个村、各个生产队，同土地结 合在一起，同农民摸爬滚打在一起，这使知青们能够深入了解农 民，了解农村，了解当时中国最底层、最真实的一面。

记得我们那个大队的知青刚到村里时，近一个月时间都 是到农民家轮流吃派饭，生产队几十户农民几乎吃遍了，这倒使 我们直观地了解到一点村情、民情。我们看到了农民住的都是低 矮的茅草房，看到了各家屋子里除了几件破旧家具外再没有什 么，看到了有的农民为了节省一点煤油钱天一黑没什么事就上床 休息，还看到了农村缺医少药、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现状，如此 等等让我们刚到农村就受到某种冲击和教育。接下来，在长年累 月的艰苦生活磨砺中，在与农民群众的朝夕相处中，我们实实在 在体验到了稼穑之苦和衣食之难，读懂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的内涵，切身感受到了农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的不易，也 感受到了他们为生存、为过上好日子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 对我们阅读社会这部无字大书、增加对国情的了解，对我们后来 的成长和发展，都奠定了坚实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历练了七年，黄土地上父老乡 亲们终年劳动却难以温饱的生存现状，留给他的记忆我想一定是 刻骨铭心的，这种体验和感受自然比我们这些在条件比较好的地 方插队的知青要深刻得多、独到得多，也难忘得多。他同样是在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回忆说：刚到农村的时候，一到春 耕时节经常有要饭的来。当时在一些北京知青的概念里，觉得要 饭的都是不好的，甚至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给他们吃的东 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岂不知当地老百姓有“肥正月、瘦二 月、半死不活三四月”的说法，到了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 粮”，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 春耕。这些情况，是知青们在农村生活了一段后才了解到的。对 当地群众贫困状况的这种了解，让总书记那时就知道老百姓最缺 少什么、最需要什么、最期待什么，也催生他、促使他尽力为乡 亲们多办些实事。在梁家河，他组织带领群众修道路、打淤地坝、 办铁业社、建代销点、打大口井、发展沼气，以自己的实干苦干 引领群众向过上好光景奋进。延安时期，习仲勋被毛主席誉为“从 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父辈革命家的 可贵品格，在陕北七年插队生活锻炼中，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 脱胎换骨为群众眼里“吃苦耐劳的好后生”，一心让群众过上好 日子的领路人。多年后他说：陕北七

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 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三是，延安的红色历史文化和陕北人民豁达、包容、厚 道、质朴、奉献的集体人格，滋养了他崇高的政治理念，铸造了 他不变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的延安地区，是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地，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是毛泽东思想的 成熟地，也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地。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 国成立这28年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我们党以延安为中心，在 这块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伟大传奇。延安 如此丰富而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内涵，自然会对北京知青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巨大的正能量，尤其对总书记这 样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弟会产生强烈的感染和滋养作用。

我们大家都知道，总书记的父亲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开 创者之一，他的母亲也是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老干部。他血液里 流淌着红色基因，对共产党有与生俱来的崇敬感和亲近感。上山 下乡到陕北，在父辈们长期战斗过的黄土地上劳动生活，到宝塔 山、延河边流连沉思，瞻仰伟人和革命领袖们当年办公和居住的 土窑洞等革命旧址，聆听当年参加过革命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

老八路讲述父辈们的青春往事 这样的点点滴滴，这样的所见

所闻，使他对父辈们创业的艰难有了实地的了解，对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有了直观的理解，对从小接受的共产主义人 生观、世界观和革命理想教育增强了感性认识，对延安这片养育 了中国革命的黄土地产生了特殊感情。这种精神上的滋养，心灵 上的洗礼，思想上的升华，不仅奠定了他接受插队生活艰苦磨炼 的思想基础，更坚定了他信仰和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他先后 写了八份入团申请书，写了十份入党申请书。执着的追求，艰苦 的磨炼，群众的信服，终于使他入党的愿望得到批准，而且还担 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后来说：十五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茫、 仿徨；二十二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 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 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都 是黄土地的儿子。

我好几次到陕北，登高望远，黄土高原雄浑苍茫，群山 环绕，充满神奇。这块厚重的黄土地，曾经以博大的胸怀接纳过

转战了大半个中国的工农红军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演绎红色 革命传奇的大舞台；三十多年后，这里同样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 两万六千名少小离家的北京知青，成为这批中学生接受青春洗礼 的地方。梁家河的知青告诉我，陕北人民勤劳善良，厚道质朴， 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不会说高深的道理，但他们从心底里感到这 些远离父母的北京知青不容易，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真情关 照、呵护北京知青，手把手地教他们种地、拾柴、做饭，帮助他 们度过插队初期的生活、劳动等关口，知青们从中感受到了陕北 人民的温暖。这么多年过去了，北京知青说起延安，普遍认为延 安人民可亲可爱，他们与延安人民结下的不解之情永远值得怀 念。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是作为“黑帮子弟”到陕北插队的。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父母政治状况等 因素给一些知青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但陕北的父老乡亲评价知 青，更注重知青本人在插队时的表现和作为。正因为这样，他当 年才能入党，才能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才能被推荐上大学。总书 记在谈起这些往事时充满感情地说：延安人民曾经无私地帮助过 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 我的心灵。“当年，我人走了，但是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四是，插队七年他利用农村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

境，坚持读书学习，积淀了丰厚的知识文化理论素养。当年上山 下乡的“老三届”知青，高中生的比例只占很少一部分，大多数 是初中生，其中1967届、1968届初中生因为“文革”中断了学 业，未能受到完整的初中阶段教育。用现在的标准看，把我们这 样的初中生称为“知识青年”，我们是不够格的。当年知青这种 教育和文化知识上的缺失，在当时那样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年代并 不凸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这越来越成 为知青们的一块“硬伤”。正因为如此，“老三届”知青离开农村 返城工作后，从事高科技、高级经贸活动的人员比例极小，大多 数人从事的是普通的熟练劳动。

到农村插队，客观上为知青提供了读书自学的环境。那 个年代，插队知青生活虽然清苦，但同兵团知青相比，政治上比 较宽松，行动上比较自由，参加劳动多少、回家探亲的次数和探 亲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知青本人。客观地说，那时插队知青 读书学习的时间还是充裕的。特别是秋收秋种以后到来年春耕前 这一段“冬闲”时间，农活较少，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可以用来读 书学习。但那时是“文革”时期，把知识分

子说成是“臭老九”，“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甚嚣尘上。受这种社 会思潮的影响，加上今后前途和出路虚无渺茫等原因，而且年龄 大一些的知青还面临婚恋等现实问题，因此不少知青基本放弃了 读书学习。当然，还是有相当一些知青信奉“开卷有益”的古训， 把读书学习作为丰富插队生活、充实精神世界、提高自身素养的 方式和途径，找各种书籍，利用晚上和农闲时间阅读学习。我在 农村两年多，比较感兴趣、也读得比较多的是历史和政治类书籍， 包括一些中外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的传记，还有一些国内外文学 名著。像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 《中国通史》，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黎 澍撰写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胡绳撰写的《帝国主义 与中国政治》，以及反映德国纳粹历史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丘 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等，就是在插队时读的。恢 复高考后，我报考了大学文科，文史、地理和政治基本没花多少 工夫都考出了高分，最后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

习近平总书记酷爱读书学习，这是同他接触过的人都熟 知的。当年到陕北插队，他只带了两个行李箱，里面装的全是书。 陕北七年，他始终坚持苦读深思，经常挑灯夜读到凌晨。关于总 书记当年插队时读书学习的情况，你们已经采访了梁家河的不少 村民和北京知青，他们是亲历者，讲了很多生动鲜活的所见所闻， 《学习时报》都刊发了。看了你们的采访，我感到他插队期间读 过的书，无论数量还是涉及的范围，都远远超过了我们。总书记 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这个要求他在陕北插队时就做到了。古人说，“腹有诗书气 自华”坚持读书学习，积淀了总书记丰厚的文化素养、知识素 养、道德素养和理论素养。这些年，我有幸在不同场合多次聆听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在讲话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谈笑风生， 妙语连珠，充满自信，越听越觉得有味道、有特点、有内容，越 听越爱听、越想听。他这种学识，这种修养，这种格局，是他多 年磨一剑的结果，梁家河七年的学习积累自然是很重要的。

采访组：刚才您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陕北七年在习近平 总书记整个成长经历中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听后很受启发。您是 我们最后一个采访者，在结束这个采访之际，请您最后再总结性 讲讲。

何毅亭：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 拂乱其所为，所以

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这段话所蕴 涵的思想，充满了实践论和辩证法。回过头来观察分析，陕北七 年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身”的人生第一站，是他读懂人生、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 的重要起点。在这里，他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收获到一 部不著一字却可以受用终生的人生宝典。这些对他以后的成长和 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离开梁家河以后，他进入清华大学这个最高学府学习知 识、开阔视野。大学出来后又进入高层领导机关工作，进一步提 升了眼界、增长了才干。紧接着沉到县里直接当县委书记这样的 “一线总指挥”，一直在县、市、省重要领导岗位做实际工作。 陕北七年，清华四年，军委机关三年，正定三年，福建十七年， 浙江五年，上海近一年，中央高层五年，之后在党的十八大当选 党的总书记。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 到国家主席，从下层军官到军委主席。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 沿海地区。中国的西部、中部、东部地区都待过，党和国家各个 领导层级都干过，农民、大学生、军人、干部都当过。这么丰富 的阅历，在这么多重要领导岗位上历练过，有这么长时间的实践 积累，所有这些都是干好领导工作的宝贵财富。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评价说：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浓郁革 命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苦难历史和曲折经历 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新的伟大斗争中确立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 人，是在重大国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人民 群众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这个评价高屋建瓴、精辟准 确，完全符合实际。你们也知道，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重大 政治决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

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重大政治决定， 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实践基础，它的重 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进 一步显现出来。

《学习时报》用采访实录的形式反映习近平总书记的七 年知青岁月，选题很好，形式新颖。你们深入基层一线，同梁家 河那些当年与总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乡亲和知青面对面对话。 受访者讲当年那些真实的故事，娓娓道来，语言生动朴实，内容 真实可信，把总书记青少年时期踏踏实实干事业的感人事迹生动 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了人民领袖确实来自人民， 人民领袖确实是为了人民。我注意到

了，你们的采访实录发表后， 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反响很好，对于干部、群众增强“四 个意识”，发挥了正能量。

再往多里说一点，你们这个系列采访实录，对如何更好 地宣介我们党的领导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个创新尝试。对党 的领导人的宣介，既需要专题著作和理论文章，也需要根据新形 势下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和认可程度，在形式和内容上作一些改 进与创新，让读者真正愿意看你的东西，并且在阅读中不知不觉 受到教育、受到启发、受到感染。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 到的打造新的话语体系的问题。我觉得你们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

是有益的。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们党的领袖人物为党和人民事业 奋斗的非凡经历，以及他们的经历所蕴涵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 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把他们人生中一段 一段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通过多种形式奉献给读者，奉献给 人民，奉献给历史，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我认 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非 凡经历，你们已经讲了他的知青故事，如果有可能你们把后面的 故事接着讲下去。

写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采访实录收笔之际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学习时报》编辑部 2017-03-17

07:19:07分享复制打印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组采访实录，本报今天刊 发最后一篇。这一组访谈，前后共采访了 29人，包括梁家河村 民6人、赵家河村民7人、延川县4人、延安市1人、北京知青 10人、其他地方知青1人，形成19篇访谈文章，从2016年11 月28日开始刊出第一篇，在本报第三版已连续刊载26次。这是 总貌。

中央党校是轮训培训高中级干部的重要阵地，是党员领 导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中央党校的主业主课，是党的理论 教育和党性教育，当前最重要的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引导学员自觉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中央党校又是党的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发挥中央党校在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对社会的思想引领作用，有 必要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研究和

宣传。走进习近平总书记昔 日的知青岁月，深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源头，对共同 经历者、知情者进行访谈，是一种独特新颖又有效的方式。

第一篇米访实录刊出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国内外网站纷纷转载，微博、微信平台上引发网友热议。随着采 访实录后续篇目不断刊出，热度在持续。尤其是今年春节期间， 主要网站把本报刊出的全部采访实录集成推出，有的还作了再加 工，再次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留言和跟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 艰苦环境中磨练了意志和品格，这样的经历令人佩服，纷纷为总 书记点赞，表达对总书记的拥戴之情，表示要以总书记为榜样， 立足岗位踏实工作。还有读者给本报来信来电，表达了读这组文 章的激动心情，有的说读着读着就掉下了感动的泪水，为总书记 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几位老同志建议我们把采访实录结集成册出 版，藏之久远，广为传播。

与读者一样，我们在采访和编辑过程中，也始终被习近 平总书记知青岁月的故事所感染、所打动。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四

十多年前，不管是深入梁家河、赵家河，还是在延川、延安乃至 北京，当村民们、知青们谈起当年的故事，记忆依然那么清晰， 说起来依然那么激动，回味起来依然那么幸福。这说明，珍贵的 记忆虽然沉淀在流年岁月之中，但并不会褪色，更不会消失。在 梁家河村史馆和当年的知青窑前，在陕西第一口沼气池前，在至 今仍发挥效用的淤地坝前，在赵家河的知青林前，在整个采访过 程中，聆听着习近平总书记与人民同甘共苦、水乳交融的故事， 聆听着总书记刻苦读书学习的故事，聆听着总书记“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故事，我们的心灵一次 次受到冲击和震撼，一次次得到洗礼和升华。真诚感激梁家河和 赵家河的村民们，真诚感激接受采访的知青们和各界人士，因为 有了你们的精彩讲述，才留下这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和党史资 料，才使广大读者得以从总书记当年那段艰苦岁月中吸收丰富的 精神营养，感受到领袖人物是如何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

怎么样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领 袖人物的故事，这是个需要研究和探索的课题。采用采访实录这 种形式，原汁原味记录受访者所讲的故事，语言生动朴实，内容 真实可信，广大读者是欢迎的。一位受访者对我们说，应当“让 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不仅看到他们在台上作 大报告的样子，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甜酸苦辣和内心世界”。我

们因此受到鼓舞，希望把故事接着讲下去。这也是《学习时报》 的职责所在。